

目 录

前 言

- 奈曼旗历史上的行政沿革……………希儒博 (1)
- 绥东县始末……………李海晨 (17)
- 奈曼旗建国前革命斗争大事记……………李海晨 (24)
- 周荣久与奈曼“抗日救国军”……………张 斌 (35)
- 忆蒙骑二师十五团……………那德木都口述 马德山整理 (41)
- 旗大队……………布和朝老口述 刘兴华整理 (49)
- 八仙筒突围战……………王 克 (54)
- 石匠沟歼匪记……………涂献庭 那德木都 (62)
- 夜袭“高山”……………那德木都 (66)
- 建国前夕的两期妇女训练班
- 旗妇联供稿 涂献春整理 (70)
- 一次难忘的劳军活动……………臧淑珍 (74)
- 奈曼王府……………张宇 (78)
- 奈曼旗历史文物简介……………张宇 (81)

大沁庙的建筑艺术……宝石柱口述 王占山整理 (94)

大沁庙及其他庙宇概述……希儒博 吴宝林 (103)

癩喇嘛庙与杜贵庙……博彦图 (114)

吉祥寺……王家驥 (117)

胡硕庙佛塔……艾迪之 (120)

二十七卷 光照千秋

——梁东明烈士传记……张斌 (123)

我所知道的布和格什格……王家驥 (131)

骉马王——德木楚克扎布……希儒博 (136)

奈曼旗历史上的行政沿革

希 僑 博

奈曼旗的由来

奈曼旗，古时为鲜卑之地；隋朝属契丹之地；唐朝属营州都督府治；辽、金时为兴中府北境；明初为蒙古所据。

奈曼旗的土著居民，在元朝兴起之前，已经形成一个部落，组成了自治团体。

据有关史书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崛起、征服四方时，奈曼部落降服于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所率的部队。以后，传到成吉思汗第十六代嫡孙图鲁博罗特（系元朝正裔达延车臣汗巴图蒙克之长子）。图鲁博罗特之次子叫纳密克。纳密克之子贝玛图谢图有二子：长子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子额森伟征诺颜奉命率兵驻守奈曼部落，就用“奈曼”做该部之号，隶属于本宗察哈尔管辖。

《清史稿》载：“奈曼部，在喜峰口东北七百里，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喀尔喀左翼，西敖汉，南土默特，北翁牛特。北极高四十三度十五分。京师偏东五度……。”这就是奈曼部当时的地理位置。

额森伟征诺颜去世（时间不详），其子袞楚克继位。他见察哈尔林丹胡图克图汗多行无道，且趋衰弱，就偕同鄂其尔率全部落人民，于天聪元年（1627年）归属后金皇太极。林丹胡图克图汗知道后，立即派兵讨伐奈曼部，被击退。此时明

朝又派人诱降，被衮楚克拒绝，并将诱降书也献给了后金。此举皇太极很赏识，即诏还旧牧地——奈曼部落，赐号衮楚克为“和硕齐”，任颉其尔为边防将军。

天聪二年（1628年）五月，衮楚克与扎鲁特部落的台吉哈巴巴海一同随后金军队出征，讨伐察哈尔及明胡泰塔布囊。衮楚克因作战有功，被封为达尔罕职。

此后，衮楚克率所部随后金军队南征北战，直至天聪九年（1635年）最后征服察哈尔，统一了漠南诸部。翌年，皇太极将国号后金改为“清”。年号为“崇德”。

清朝建立后，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诸蒙古部落施行了“盟、旗”制，重定行政区划。所谓“内四十九旗”之说即是从此开始。当时，“奈曼部落”划为一旗，号曰“奈曼旗”，疆界不变，隶属昭乌达盟建制，这就是建旗的开始。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起，正式沿用奈曼旗之称。

旗扎萨克世系

奈曼正式建旗后，清廷根据衮楚克多年的功勋与忠节，晋封为“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爵职，并世袭罔替。历史上扎萨克多罗郡王制便是从此开始。

衮楚克为奈曼旗首任扎萨克之后，又奉命参与征战。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他参加了远征关内之战，破通州陷北京，完成了辅佐清室统一中原的大业。他任旗扎萨克十七年，于顺治十年（1653年）病故。他的后半生几乎全是在征战中度过的，一直配合清军东讨西伐。自天聪元年（1627年）反击察哈尔林丹胡图克图汗之进攻始，第二年九月远征都尔地区，平定希尔哈、南巴士、张汤头、兴安岭等地，遂

即占领遵化州；天聪五年（1631年），攻破明朝锦州；次年又攻陷归化城及宣化府，继而攻陷幽州，进击秦州府城，占领明朝德宗营所等；天聪八年（1634年）讨伐茂明安部，远征朝鲜；崇德二年（1637年），讨伐哈尔哈扎克土汗，攻陷济南府；顺治元年（1644年）的入关战役等，他都亲自参加作战，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作为奈曼旗扎萨克第一个被载入清廷功劳簿上。

顺治十年（1653年）袞楚克去世后，其次子阿罕继承其职，为第二任旗扎萨克。但为时不久，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被免职。

顺治十七年（1660年）阿罕之三弟扎木三继任旗扎萨克。他虽为第三任扎萨克，但对异族统治甚为不满，总想复辟元朝。遂与义州王溥尔尼（系察哈尔林丹胡图克图汗妻侄也是大清朝廷命官）合谋，拟举旗反清。但事与愿违，溥尔尼与清军交战中失利而败退。为此，康熙十四年（1675年）扎木三之王爵被剥夺，扎萨克职被削。

康熙十四年（1675年）第四任旗扎萨克颞其尔继位。此人为头等台吉，是袞楚克之孙、扎木三之侄。其父叫必力得。颞其尔认为，前任扎萨克扎木三之所为并非善意。因此他没有参与反清行动，而是率其妻子及九箭箭丁暗中逃至喀喇沁旗。康熙皇帝闻此事，认为颞其尔能出于忠义、不从叛逆，嘉其忠诚，遂在清廷功劳簿上记功，并立即任命为奈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命其回旗执政。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颞其尔从皇帝那里领到官印一颗，便组织建立奈曼旗公署。历史上我旗建立旗公署就是从此开始的。

颞其尔故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第五任旗扎萨克是颞其尔之子班第。自康熙二十七年

(1688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执政,卒于康熙四十六年。

第六任旗扎萨克却经,自康熙四十六年其父班第去世后继任。执政十三年。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因罪被削职。

却经被削职后,由其弟阿萨拉继任旗扎萨克之职。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起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任职。

阿萨拉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长子拉旺喇布丹承袭其职,为第八任旗扎萨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钦谕奈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王位,额其尔一系之子孙将永久承袭。额其尔为拉旺喇布丹之曾祖父。

嘉庆八年(1803年),拉旺喇布丹卒。此人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执政,长达四十六年之久,是奈曼历代扎萨克中任期最长者。

第九任旗扎萨克是拉旺喇布丹之次子巴喇楚克。嘉庆八年(1803年)至二十四年(1819年)任职。历任御前行走、兼昭乌达盟付盟长等职。嘉庆二十四年卒。

阿旺都瓦底扎布是巴拉楚克之长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继承其职,为奈曼旗第十任扎萨克。其任职期正是清朝道光年间,道光皇帝很器重阿王,先后赐三眼花翎、貂皮御衣、赤金紫缰轡等特殊奖赏。阿旺都瓦底扎布除任旗扎萨克外,历任昭乌达盟盟务帮办、盟长,又任御前行走、散秩大臣、昭乌达盟备兵扎萨克等要职。阿旺都瓦底扎布病逝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月。

阿旺都瓦底扎布之长子德木楚克扎布,是个聪明英俊的青年,在道光年间入选进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任御前行走,头戴宝石顶柱三眼花翎,身着御衣,享受贝子待遇。特别是道光皇帝将其爱女寿安固伦公主许配给德木楚

克扎布，使其成为赫赫有名的固伦额駙，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

道光二十八年，德木楚克扎布承袭其父职位，为奈曼旗第十一任扎萨克。他是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三朝元老。历任御前大臣、管旗都统、镇抚北部大臣、火器营大臣、管理中正殿奉经事务大臣、管理步魁壮丁院大臣、押马大臣和內务大臣等军政要职。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德木楚克扎布逝世。皇帝下賜优厚的诏恤，派两名专员主持丧礼，并賜与固伦公主合葬（公主卒于1860年），同时追认“亲王”爵位。他是我旗历代郡王中始受亲王王位的扎萨克。

德木楚克扎布，无嗣子，而其继承人经过理藩院审议，定为前郡王阿旺都瓦底扎布二弟之孙子萨噶拉（其父叫达哈苏）继承。遂于同治五年（1866年）承袭扎萨克，为奈曼旗第十二任郡王。历时三年，于同治八年（1869年）去世。

第十三任旗扎萨克是萨噶拉之次子玛什巴图尔。同治八年继承王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发生金丹道起义，教徒万余，辗转扰乱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见到蒙古人“格杀勿论”，所到之处皆成废墟。当时敖汉、奈曼受害最重。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郡王的玛什巴图尔统帅全旗箭丁全力以赴，配合官军，屡战教徒，最后在本旗哈拉海达庙（今衙门营子苏木）附近将其全部歼灭。

第二年，玛什巴图尔因平乱有功，受到清廷嘉奖，晋升为亲王职爵。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病辞去“御前行走”之职，返回奈曼。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玛什巴图尔去世。

玛什巴图尔去世后，其次子苏珠克图巴图尔继任，为奈曼旗第十四任扎萨克，并正式承袭达尔罕亲王爵位，享受亲王俸禄。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任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四盟宣慰使；民国四年（1915年）又任昭乌达盟盟长职；民国五年（1916年），因镇抚巴布扎布党徒有功而授予亲王双俸，一等文虎勋章，并被任命为昭乌达盟备兵扎萨克。后来又历任参议院议员、遐威将军、卓、昭、哲、锡四盟警备总司令等职。苏珠克图巴图尔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病逝。

苏珠克图巴图尔任职期间正是中国社会之动荡年代，政局不稳、变幻莫测。因他常驻北京，对旗内政务不闻不问，加之热河省政府的蚕食、吞并，旗民失去大量土地，以至汉民移入开荒种地占去大量草牧场，官民之间、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全旗财政亏损，入不敷出，经济贫困，民不聊生。对此，官运亨通、身居要职的旗扎萨克是当有其责的。

苏珠克图巴图尔逝世后，在其继承人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根据其遗嘱，全旗官民们一致推举其五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继任旗扎萨克。但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妾派人物），则推举苏珠克图巴图尔之三庶弟阿拉坦胡雅尔继承。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休。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下达了任命阿拉坦胡雅尔为“暂行代理奈曼旗扎萨克职务”的委令，阿拉坦胡雅尔便成为奈曼旗第十五任扎萨克，妾派告胜。但是，正妾派人物及蒙古族民众仍极力推举苏达那木达尔济任旗扎萨克。未等中华民国政府的正式批复下达，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伪满期间，热河省公署（奈曼旗当时隶属于热河省）为慎重处理奈曼问题，便派省府旗务科长吉川（日本人）来旗进行详细调查。其结论为，苏达那木达尔济任旗扎萨克是正

当的。调查材料由省民政科上报民政部待批。对此，妄派人物没有听之任之，而是再度策划，伪造伪满政府民政部委任状，阿拉坦胡雅尔继续任旗扎萨克，迷惑了蒙古民众。这件事被热河省特务机关长所闻，就立即将情况上报伪满政府，要求尽快下达苏达那木达尔济为奈曼旗扎萨克的正式委令。此争执延续数年。到康德二年（1935年）三月，伪满政府决定撤消绥东县，绥东县公署与奈曼旗公署合并，称奈曼旗公署（康德元年，奈曼旗划归兴安西省），并正式任命苏达那木达尔济为奈曼旗公署旗长。近十年的扎萨克人选争执也就宣告结束。苏达那木达尔济虽为旗长，但在历史上仍称之为“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他是一个家族世袭统治奈曼旗三百年中第十六任扎萨克，也是奈曼旗的末代王爷、首任旗长。

他在任职期间，一九三五年七月发生了奈曼“抗日救国军”打八仙筒击毙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指导官中根长一和活捉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等人的事件。此事，伪满政府极为不满。一九三七年，便由当时任旗公署内务科长的哈斯宝接替了他的旗长职务，直到一九四五年伪满政府垮台。

旗之行政机构

奈曼旗历代扎萨克对全旗的统治管辖，是通过以下诸行政机构实施的。

一、旗公署

旗公署从奈曼第四任扎萨克颉其尔执政时期（1686年）正式建立，一直延续到伪满时期。

旗公署的组成人员有：扎萨克一人，为一旗之长，综理旗务，监督所属官吏，系世袭制。

协理，又叫图萨拉克齐。由王族内选择。原则上分为印

务、军务、旗务三职。印务协理为主席协理，是扎萨克综理旗政的公开的最高辅佐者。一般设东、西协理台吉各一人，有的设三个协理。

管旗章京，亦叫加克拉克齐。从旗民中选择有能力懂公事的人担任。承扎萨克、协理台吉之命办理旗务。为一旗中握有实权、责任重大的中坚官吏。

管旗副章京一人。为管旗章京的辅助官员。

梅林，每旗设东、西梅林各一人。承协理台吉、管旗章京之命办理旗务。原则上分为印务、堂官梅林和印务参领三职。其中堂官梅林专管司法。

参领，也叫扎兰、佐领。奉管旗章京和梅林之命直接办理地方事务。各旗数目不等，视佐（箭）之多少而定。我旗是五十个箭设十二个佐领，佐领以下有若干骁骑校，为佐领的辅佐角色。

从颉其尔到苏达那木达尔济，在奈曼历史上共有过十三届公署。伪满到建国之前的奈曼旗公署为末届公署。其人员组成是：协理台吉达力扎布、都德奈那木吉拉、苏庆嘎；管旗章京乌冷嘎；左右梅林努乃、阿民布和；印务梅林宝音都冷；印务参领布仁特吉斯。

二、王府

王府亦叫王仓，是王族家庭之管理机构。其中有：

发丹达，是扎萨克私下的最重要的辅佐人物。但不是扎萨克综理旗民事务的公开角色。

哈藩，是辅佐发丹达的角色。

保伊达，为王府内专管事务的官员。

图勒什古尔齐，亦是王府内的事务员。发丹达、哈藩、保伊达和图勒什古尔齐，在旗公署均无公开职务，仅是王府

内官吏。

福源地局，是王府的征收赋课机构，亦是经济基地。直隶于王府，由一名局长管理。

王府是旗之政权中心，又是王爷起居之地。奈曼旗历代王爷统治奈曼三百年间，先后兴建了五座王府。

崇德元年（1636年），首任旗扎萨克袞楚克，将府第建于今太山木头苏木白音敖包嘎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六任旗扎萨克却经，仿北京皇宫形状，于今新镇乡呼和格尔村兴建了规模较大极为豪华的新王府，被清廷发现，以图谋不轨之嫌削去旗扎萨克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第七任旗扎萨克阿萨拉又将王府迁回白音敖包（历史上称白音敖包为王荫浩齐德，王爷故居之意）；嘉庆八年（1803年），第九任旗扎萨克巴拉楚克在今桥河乡五福堂村新建了第四座王府；六十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年），驸马王德木楚克扎布又将王府兴建于大沁他拉。后经第十三任扎萨克玛什巴图尔续建竣工，正式使用。这就是现在的“奈曼王府”，迄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

三、地方行政

本旗地方组织，在清朝时期是采用箭佐组织。共设五十个箭，管箭参领十二名，管理四个箭的佐领十名，管理五个箭的佐领二名（箭佐的长官，受参政之命直接办理地方事务，有的旗只设参领管箭而无佐领之职）。他们执行旗公署的指令，并轮番负担旗公署之经费，每年各负担一个月，从所管辖之箭佐旗民中征派。骁骑校辅佐他的公事。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热河特别行政区域制公布后，热河都统在辽河以南的管区各蒙旗及各县设置“区”制。奈曼旗则划为五个汉区和七个蒙区，规定蒙七区由旗公署管

辖；汉五区由绥东县管辖。当时，汉区内几乎没有蒙古人居住，蒙古人大都聚居于蒙区。因此，奈曼旗的箭佐人数仍保持原来的五十个，直至伪满时期。

除上述一般箭外，还没有几个特殊的箭。即：

（一）驿箭

清朝时，每个箭出一户，五十户编为一箭。经常备有五十丁、五十匹马。马匹虽说是由旗负担，实际是五十个箭各出一匹马。今我旗苇莲苏乡五十家子（太宾格尔）便是一个驿箭。

驿箭的官员有佐领一名、骁骑校一名、笔贴式（文书）一名。均由喜峰口台站选择箭内的蒙古人中任命，不受旗公署干涉。驿箭官员都没有俸银，所用粮秣均由该箭自给。箭丁耕种土地，由旗内划给。到一九二七年放垦时，这些土地被汉人官吏强制放出。当时虽然规定由旗公署付给百分之六十的地价，但因以往未缴纳土地亩捐为由被扣留，箭丁们则一无所得。

（二）陵寝三箭

陵寝箭是由随从固伦公主回来的人（以后划归于蒙古人）即所谓陪房构成的箭。该箭有三：即二百户（箭丁二百人）的一个；六十户（箭丁六十人）的一个；四十户（箭丁四十人）的一个。他们无一定土地，与旗内蒙古人杂居，其实他们就是“哈利牙图”（意为‘属人’）。

陵寝各箭分别有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以看守王坟为其职守。供墓费用大部分由王府负担，少部分由箭丁负担。其实，寿安固伦公主逝于北京，其坟并不在旗内。

本三箭隶属于王府扎兰管辖。

他们不负担旗公署费用和王府卫队费用。但派警兵、保安队员则与一般箭同样负有义务。

（三）台吉与台吉长

台吉即为王室家族，博尔吉济特氏。伪满时期，我旗台吉已经发展到一千多户五千多口人。清朝时期，规定每三十户台吉设一名台吉长，依册台吉的户数，共设台吉长三十六人。

从清朝道光年间（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台吉被编入所在地之箭下。纳税比例，一般箭丁为百分之七十，而台吉是百分之三十。他们只负担出任警兵和保安队的义务，不负担旗公署经费的征派。同时，台吉因与王各（即扎萨克）同族，形式上台吉长隶属于管箭参领，实际上是直隶于旗扎萨克，此为台吉氏之特殊所在。

台吉分一至四等。伪满初期，奈曼旗有一等台吉一户；二等台吉十三户；三等台吉二十三户；四等台吉一千零四十三户，共一千零八十八户。清朝时就规定，一、二、三等台吉之长子各世袭其台吉爵外，其余一律编入四等台吉。这就是四等台吉户数众多的缘故。

四、保安队与警兵

清朝时，奈曼旗拥有常备兵二千五百人，若有战事即奉调参战。另外，还有预备兵五千人，战则从戎，无战操家，系兵民一体状态。

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原有常备兵几乎全部解甲归田，仅有二十五名常备兵作为王府卫队。地方根据联庄会制度所组织的二百人的保甲，维持旗内治安。

一九一四年，奈曼旗划蒙七汉五之十二区后，决定把王府卫队增至一百名，各蒙区设正式警兵三十名，保甲三十名，用以维持治安。

一九三〇年，根据保安队编成大纲的规定作整编准备。

第二年正式改组原保甲建制，把王府卫队编入新的保安队，兵员为三百一十名，加之警兵二百一十名，共五百二十名。这就是当时全旗的总兵力。

王府卫队、保安队皆由扎萨克命令旗下十二个管箭参领及台吉长进行选派。王府卫队由王府管箭参领指挥。各区的保安队长，由扎萨克从该区内懂公事、有能力的管箭参领的蒙古人中任命。卫队保安队人员均不发薪水，尽义务职。所需给养由王府负担或由旗公署按规定向旗下蒙古人摊派。

王府卫队常驻王府，分两班轮换值班，每班五十名，值勤期为半年。保安队在各区警察所分别有二至三人常驻该区值勤，其余大都住在自家从事家业。

一九三三年，奈曼归回伪满，奈曼旗保安队更名为奈曼旗保安总队，下设二个中队七个分队，每分队三十人。总队长波镜，副总队长金宝，第一中队长布林满都呼，第二中队长额力布格仓。第一中队辖王府卫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为一百六十人；第二中队辖第三至第七分队，为一百五十人。

当时，各蒙区除有保安队外，每区还有警兵三十名。属旗内武装，驻在各区警察所，执行保甲事务，由各区区官（扎萨克任命区内蒙古人中才干的人参领担任）统领。同时各区还设有巡官一名，巡长二名。全旗警兵总数二百一十名，以维持区内、旗内治安为职责。待遇同保安队一样，不发薪水，义务尽职。给养、经费则在旗公署的监督下，按各区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的比例负担。

警兵从各区蒙古人富户中选派。出警兵的人家叫做“马户”。但是，“马户”没有适当的人应征时可雇用其他蒙古人顶替。雇用费一般是每年四十块银元，由雇用者支付。

绥东县时除警察外，各汉区则设有自卫团。

五、旗县合署

绥东县设治局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县公署从小岸伦迁至八仙筒。

大同三年（1934年）十二月，伪满政府改革地方制度，奈曼旗划归兴安西省管辖，原绥东县与奈曼旗合并，重建奈曼旗新的旗公署。康德二年（1935年）二月，正式宣布解散旧奈曼旗公署和旧绥东县公署，组织新奈曼旗公署机构；原旗、县所属卫队与地方武装也随之解散，根据新的行政区划重新组建了警察队和警察署。

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全部整编项目就绪实施，由兴安西省正式接管，完成了县旗合并的新区划。

新的旗公署机构由四科九股组成。即：

旗长——苏达那木达尔济

代理参事官——山守荣治（日本人）

（一）总务科科长山守荣治（兼）。下设：

总务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六名；

经理股：股长一名、科员一名、雇员二名。

（二）内务科科长哈斯宝。下设：

行政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一名；

实业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二名；

教育股：股长一名、科员一名、雇员一名；

名誉顾问二名、顾问二名；

翻译二名、勤杂员八名。

（三）警务科科长刘崇勋（兼）

指导官：藤川郁郎、中根专一（日本人）。

下 设：

保安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二名；

卫生股：股长一名、科员一名、雇员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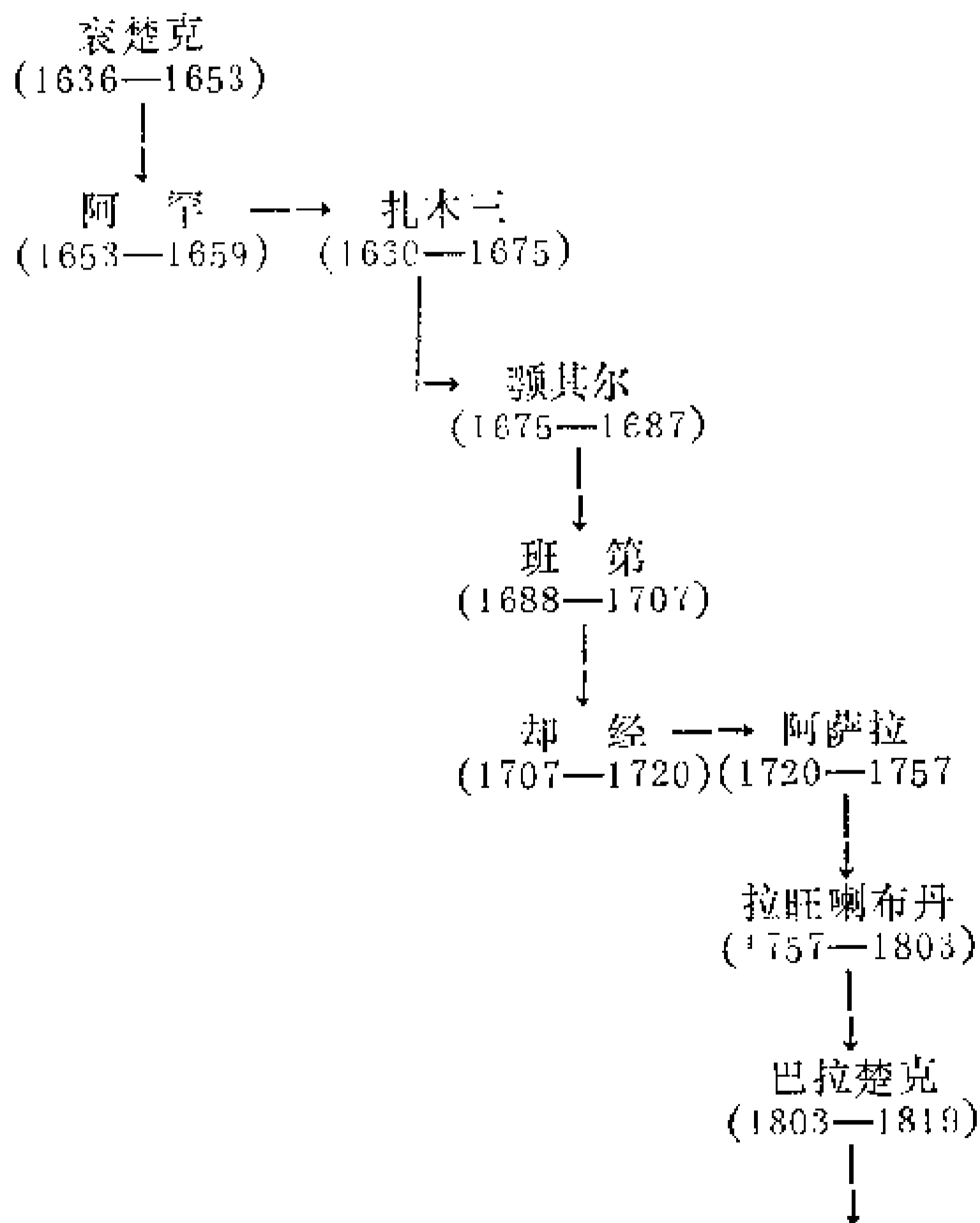
(四) 财务科科长王宪中。下设：

征收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三名；

理财股：股长一名、科员二名、雇员二名。

旗公署设在大沁他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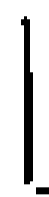
附（一）：奈曼旗扎萨克世系表



阿旺都瓦底扎布
(1819—1848)



德木楚克扎布
(1848—1865)



萨噶拉
(1866—1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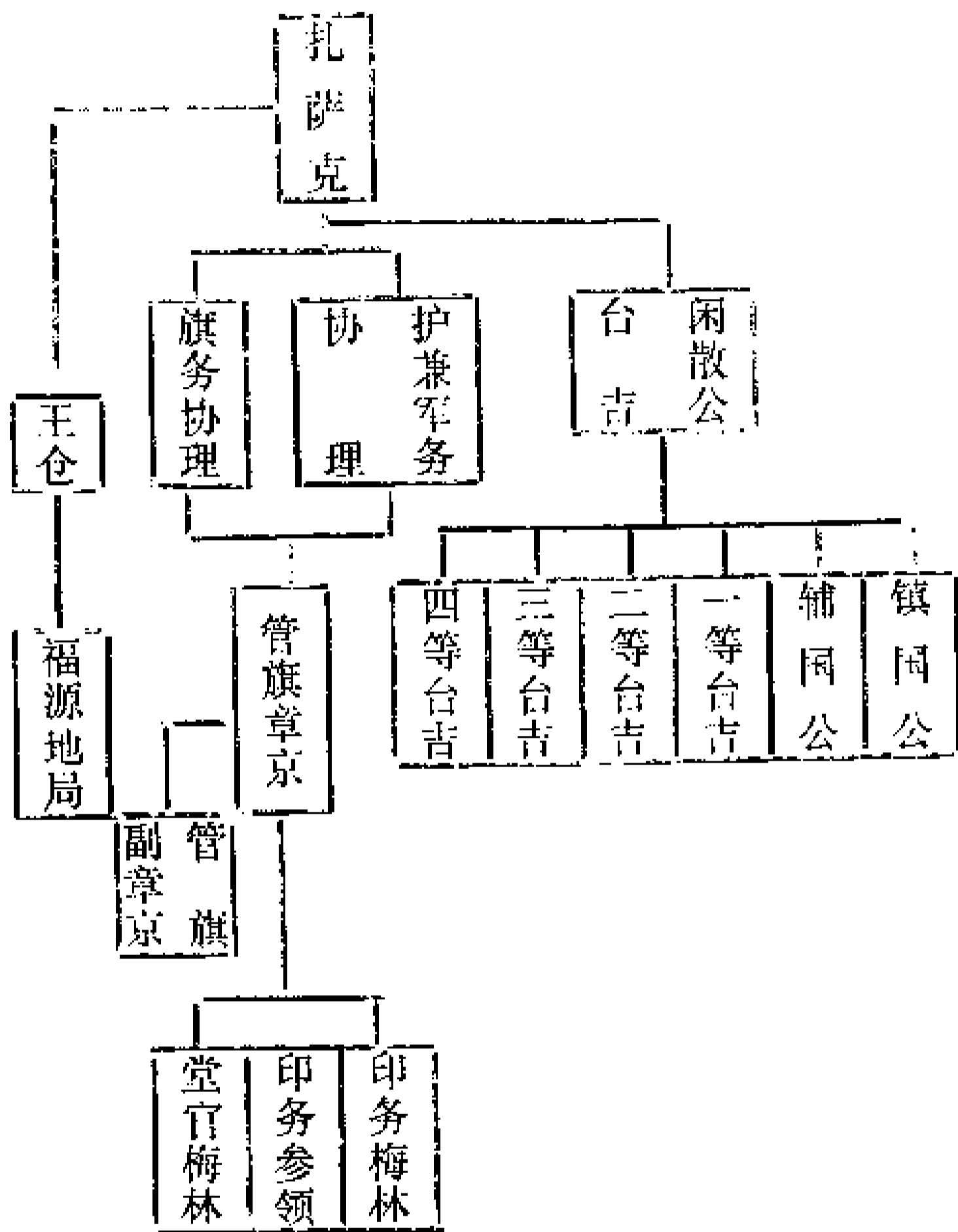
玛什巴图尔
(1869—1905)



苏珠克图巴图尔 → 阿拉坦胡雅尔 → 苏达那木达尔济
(1905—1926) (1926—1934) (1935—1937)

※括号内年限为任职期间。

附（二）：旗公署官员及王室家族的隶属关系



绥东县始末

李海晨

绥东县建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下辖奈曼、库伦和哈拉哈旗一部分。县所在地先设于小库伦，后迁至八仙筒。该县东部和奉天省彰武县及兴安省接界，南接阜新、朝阳两县，西接建平县，北接开鲁县。东西宽约二百五十华里，南北长约三百华里，面积七万多方里。人口约六万六千二百人，蒙古族占百分之六十，汉族占百分之四十（人口分布情况见附表）。

（一）

绥东县自元代以来，系蒙古族聚居地区，为奈曼、库伦和哈拉哈旗领地。自清朝中叶起，汉族逐渐由山东、河北、东北等地迁来，租种蒙旗土地。后来由于王荒（旗王爷土地）的不断出卖，垦殖面积不断增大，土地由过去的佃耕形态转变为复杂多样的土地占有关系，汉族地主和部分自耕农逐步掌握了土地所有权，成为永久住戶。

因垦务日辟，旗务日繁，地域辽阔，蒙汉杂居，为加强
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热河都统廷杰上奏折，奏请朝廷设置开鲁、林西、绥东三县：升赤峰县为赤峰直隶州，兼辖开鲁、林西二县；绥东县则由都统府管轄（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朝廷准奏，在小库伦设绥东县县公署，办理一切行政事务。

当时的小库伦，商业贸易比较发达，有广生、隆盛等四

大店铺，每年沈阳、天津等地来买卖牲畜的很多，是北方比较出名的马市。县公署便借公合玉当的闲房建立起办事机构。

绥东县在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犯以前，共有十三任知县。第一任知县姓黄，任职半年死去。第二任知县孙汝凯，江苏省人，进士出身，任职五年。第三任知县王百川，山东省人，任职三年。第四任知县高鸿飞，吉林省船厂人，他任职期间，因县公署借房办公不便，遂请示府上在小库伦东头路北修建了县公署。第五任知县任良金，任职四年。第六任知县吉人，修建了八仙筒街，任职五年。第七任知县豆茂芳，阜新人，任职四年。第八任知县刘修建，庐陵县人，任职三年。第九任知县刘荣庆，家住北京市西长安街北池子二十二号。第十任知县冯舜生，静海县人，任期一年左右。第十一任知县衣学让，庄河县人。第十二任知县姓王，朝阳人，任期一年。第十三任知县姓夏，头年腊月接任，翌年正月没等到职，听说日本人进了东北，夏便和衣、王（前两任知县）弃官逃走了。

中华民国初年（1912年），县公署设二科三所，即第一科、第二科、理财所、劝学所和警察所。第一科主管行政兼管司法。第二科主管财务。理财所办理县财政业务，凡是能够出钱的事项，就向上申请摊派捐税，如征收地捐、亩捐、饷捐、树捐等，由县里收入；各种税收则上缴国库。劝学所负责管理教育。警察所负责地方治安。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奈曼地区设汉五区，蒙七区。汉五区的区署所在地：一区在鄂尔吐板，二区在大歹，三区在义隆永，四区在大沁他拉，五区在土城子。区设区官、巡长和警士。蒙七区警兵驻地及区官情况如下：一区在乌来苏

套海，区官为满图；二区在沙日浩来，区官是布林满都虎；三区在小大歹，区官是额力布格仓；四区在阿卜达尔台，区官是色勒吉扎布；五区在小大沁，区官是善巴；六区在达布改，区官为朱永顺（汉族）；七区在巴崩台，区官为色沁格勒。其中，第六区是绥东县正式开放地。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起，该区区官改由汉人担任，警兵大部分也是汉人。这时，虽不属绥东县管辖，但仍沿用旗公署制发的区印章。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县公署除继续保留主管行政兼管司法的第一科和主管财物的第二科外，将理财所、劝学所和警察所等三所也改为财政局、教育局、警察局。增设了自治局（仅局长一人，未开展工作）和税务局。其中税务局由省直统。并建立了商务会、农务会和粮秣会。

绥东县是以汉族为中心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华民国期间，汤玉麟接任热河省省长以后，设经界局，以清理蒙地为由，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是民国十年以后，蒙旗势力逐渐增强，县旗之间倾轧加剧。在库伦旗，县的政令只能在小库伦内起作用，其他地方完全听命于王府的支配。加之小库伦又比较偏僻，执行行政事务很不方便，所以在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月，将县公署迁到赤峰至开鲁国道计划线上的八仙筒。县公署的详细编制如下：

第一科：科长一名，科员一名，雇员一名，吏役一名，政务警察八名。掌握印信，收发和地方行政。

第二科：科长一名（吴楚强），科员一名，事务员二名，庶务员一名，雇员二名，吏役二名。主要掌管会计和税务。

承审处：承审员一名（王育麟），书记一名，差发吏一

名，检狱一名。承审处下设监狱，管狱员一名（郭宗骧），录事一名，看守长一名，看守五名，（其中女看守一名）。

公安局：局长（尚为国）。下设：总务兼司法课，设课长一名，课员一名，雇员一名；行政兼司法课，设课长一名，课员一名；警察队设督察员，有队长一名，巡官一名，巡长一名；局还设有稽察员。另外下设八个分局：一区分局，分局长一名，巡官一名，巡长一名，雇员一名。二区分局、三区分局、四区分局、五区分局和中区分局，局里的编制和一区分局相同，除三区分局外，下面都有分所。在各分所，所长、巡长、雇员各一名。库伦分局和城乡分局，设分局长一名，巡长一名，雇员一名。

建设局：局长一名，技术员一名，雇员二名，事务员二名。

财政局：局长一名，会计一名，文牍一名，雇员三名。

教育局：局长一名，督学一名，教育主任一名，雇员二名。

（二）

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三、四月间，由日本松室大佐率领日满军队进入绥东县府八仙筒。此时绥东县县长均已逃亡。县里的治安由曾任过县长的何庆伦维持。松室大佐便命何庆伦为代理县长，后经赤峰办事处总务科长諏访批准，为正式代理县长。并于同年五月重新组建了县公署，下设一科、二科和建设局、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等机构。但何庆伦的势力很弱，全靠自卫团团团长周荣维持治安。办事员大多数没有办事经验，加上事变不久，地方秩序混乱，不能征收租税，伪满政府只是发给行政补助费八百元，警察补助费

四百元，财政十分困难。于是便向商家农户强征暴敛，每月除征收自卫团费八十元外，还征粮食费用达数千元。

一九三四年一月，日本派山守荣治入绥东县为参事官。为了便于控制，山守荣治改组了绥东县政府，设置了总务科（包括庶务股、会计股）、内务局（包括行政股、实业股、教育股）、警务局（包括警务股、司法股）、财务局（包括征收股和理财股）等科局。同时，还设立了绥东县维持会，赤峰日本警备司令部的岗永中佐为委员长，绥东县县长和奈曼、库伦二旗旗长为委员，用以调解县旗关系，维持地方治安，加强日伪统治。

同年一至三月，日伪政权完成了对绥东县全面情况的调查，写出了“绥东县概况”报告书。随后通过维持会大量散发各种宣传品和免费药品，收买人心。同时，在县城小学设置日语课，免费发放教科书。对于县旗公署的上层人物，则通过送其子弟到日本留学，或送到当时的奉天、新京等地进行职业学习，实行奴化教育，拢络上层势力。日伪政权为便于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还用治安维持会费购进汽车，强迫人民挖土方，在沙漠地带铺上柳条席，在叫来河和清河上架设木桥，修通了八仙筒到开鲁的简易公路。同年三月至十一月，又架设了开鲁到八仙筒、八仙筒到奈曼王府和兴隆地之间的电话线路。在八仙筒郊外设置了飞机场，并解散了县内的职业自卫团，收缴民间枪支，为加强日伪统治做了全面部署。

在经济方面，同年六至八月间，日伪政权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经济情况调查，为征收各种捐税作准备。九月至十二月，又在八仙筒修建了县公署；在小库伦、鄂尔吐板、兴隆地、八仙筒、大段等地修建了牲畜屠宰场，掠夺肉食资源，

供日本侵略战争之用。

(一)

绥东县是蒙汉分治的产物。长期以来，奈曼、库伦二旗虽然在形式上处于绥东县的统辖之下，但是对于县的政令从未认真执行。特别是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两旗势力不断增大，独立倾向更加强烈，各王府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独立的保安队和警察局。绥东县的政令在库伦旗只限于小库伦内，其余地方完全听命于王府管辖，甚至连圈税也无法征收上来。同样，在奈曼旗县令也仅限于汉五区。蒙七区的王族势力对县公署根本不屑一顾。

在财政方面，县公署和两旗王府并立，机构臃肿庞大，入不敷出。康德元年（1934年）统计，奈曼旗财政收入为四万九千五百一十七元五角二分，其中四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元五角是警兵费，剩余的七千五百多元难以满足旗里的庞大开支。同年，绥东县的财政预算九万五千四百九十四元，其中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九元没有着落，只有靠国库的补贴过日子。库伦旗的财政已于康德元年七月份分离出去。面对这种情况，日伪统治者为了拢络蒙古族上层势力，直接控制奈曼和库伦两旗政权，精简机构，紧缩开支，于是在五族协和的名义下，上报伪满政府批准，取消了绥东县这个空架子，于康德二年（1935年）二月二十二日，将绥东县和奈曼旗公署合并，按着蒙六、汉四的比例，组成了新的奈曼旗公署。至此，历时二十八年的绥东县便告结束。

附：

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

绥东县人口调查统计表

| 区 别 | 户 数 | 人 口 | | 性 别 | | 区 别 | 户 数 | 人 口 | | 性 别 | |
|--------|--------|--------|-------|--------|---|--------|--------|--------|--------|--------|--|
| | | 男 | 女 | 男 | 女 | | | 男 | 女 | | |
| 汉一区 | 1,100 | 4,400 | 2,400 | 2,000 | | 蒙四区 | 800 | 3,000 | 1,600 | 1,400 | |
| 汉二区 | 980 | 3,600 | 2,000 | 1,600 | | 蒙五区 | 1,700 | 6,800 | 3,700 | 3,100 | |
| 汉三区 | 820 | 3,400 | 1,800 | 1,600 | | 蒙六区 | 2,800 | 11,200 | 6,500 | 4,700 | |
| 汉四区 | 1,200 | 4,600 | 2,400 | 2,200 | | 蒙七区 | 1,500 | 6,000 | 3,500 | 2,500 | |
| 汉五区 | 1,200 | 4,800 | 2,600 | 2,200 | | 库伦镇 | 2,500 | 10,200 | 5,200 | 5,000 | |
| 蒙一区 | 890 | 3,500 | 1,800 | 1,700 | | 合计 | 16,700 | 66,200 | 36,100 | 30,100 | |
| 蒙二区 | 680 | 2,400 | 1,400 | 1,000 | | 八筒 | 418 | 1,631 | | | |
| 蒙三区 | 600 | 2,300 | 1,200 | 1,100 | | 仙镇 | | | | | |
| | | | | | | 库伦镇 | 1,650 | 6,800 | | | |

奈曼旗建国前革命斗争大事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李海晨

一九四五年八月

苏联红军配合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我军尚未进驻奈曼。在奈曼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的策动下，由哈斯通力嘎和里纯生活动，成立了奈曼旗维特会。苏达那木达尔济任会长，包庆丰任付会长，下设十一个分会，口号是维持社会秩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成立了奈曼旗保安司令部，苏达那木达尔济任司令，洛布等任付司令，下辖三个处。参谋处处长是特木尔代(席品三)，付官处处长王锡三，军需处处长马景朝(马最良)。另外还设有纠察队，队长是王车力扎布。司令部下设四个保安大队，人数不足六百。主要活动是把守地方，阻止八路军进入奈曼。

一九四六年初

建立西地区和土城子区，归昭乌达盟新东县领导。西地区区长雷余让。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我潢水部队计划通过奈曼北上，派人和苏达那木达尔济联系过境。苏达那木达尔济拒绝，并派兵到扎拉湾子、西梁等地驻防。潢水部队包围西梁，发生了战斗，打死打伤保安队何文章部三十余人，我军伤亡十二人。战斗结束后，我军北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

国民党部队张念祖部千余人从开鲁进犯奈曼，并恢复了绥东县，任侯勋烈为县长。张部在奈曼盘踞十余日。

一九四六年三月

哈斯通力嘎派人去库伦与新四军驻库伦的三师独立旅联系，由阿斯根率兵与奈曼保安队会师大沁庙。从王窰营子、刘家堡分两路包围了大沁他拉。经过激战，张念祖部从双合村西南沙子逃窜，我军解放了大沁他拉。并在大沁他拉南门外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九团。团长马占峰(旺哈尔)，付团长洛布等，希力巴拉，参谋长宋宝山。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成立了奈曼旗人民政府，旗长哈斯通力嘎，付旗长云戒三；秘密地建立了中共奈曼旗委员会，赵任远为第一任书记。此时地方干部不足三十人，都是从黑山、阜新、彰武等地调来。分布在王府、衙门营子、八仙筒，白音塔拉等区。任务是争取反蒋反美的民主人士和封建上层，组成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政权；组建武装力量；以汉奸、蒙奸和恶霸地主为主要对象，开展清算斗争。

一九四六年三月

建立了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奈曼旗旗大队，共三个连，一个蒙族连，两个汉族连，哈斯通力嘎兼任大队长，赵任远兼任政委。

一九四六年三月

梁东明等五人从辽宁省黑山支队来到奈曼旗北部办事处——八仙筒工作。梁东明任旗委宣传部长，王克任后勤主任，罗云彪任旗大队付大队长。

一九四六年四月

奈曼旗地方武装九团 改为内蒙古自治军第二师第十五团。辽吉分区派进一批军政干部到十五团工作。团长马占峰（旺哈尔），付团长希力巴拉，下设四个连队和警卫连，共五百余人。辽吉分区派进的团政委是陈明山，一连指导员乌力吉，二连指导员赵旭，三连指导员姓吴，四连指导员赵桓，警卫连指导员刘君山。

一九四六年五月

二月份，衙门营子区南部的孙家湾子、三家子等地，已被我军解放，归北票县领导。主要活动是支前，征集军粮、军草和军鞋，并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部分党员。五月份，奈曼旗派王端等人去开辟工作，去后，和北票方面联系，将几个村子划回奈曼，部分地方干部也回到奈曼，并成立了区农会，工作人员有卫青、任国柏、付永安、吴效之等。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哲盟地委成立（即五地委，军队对外称五分区）。奈曼归五地委管辖。

一九四六年五月

衙门营子区中队在曹振帮等人的煽动下叛变。十五团二连奉命驻守衙门营子区。

一九四六年六月

浩沁苏木区委书记于得水被叛徒暗杀。

一九四六年七月

云戒三被调到黑北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哲盟地委召开全盟县委书记会议，集中研究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党的政策，民族斗争同阶级斗争的关系，蒙古族地区的工作问题。奈曼旗委书记赵任远参加会议。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月

首先在王府、衙门营子、八仙筒、白音塔拉等区，以蒙奸、汉奸、恶霸大地主为主要对象，开展了清算斗争。随后转入全旗性的减租减息。要求退租退息三年至五年，粮食、牲畜不足的以土地赔偿。方法是一般采取行政命令，没有真正发动群众。蒙古族地区基本未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

由额尔德木图发起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联合会奈曼分会。开会地点在大沁庙。会长是额尔德木图，付会长是吴志民（吴小喇嘛）、博和温都苏，下面成立了三个工作组。任务是深入蒙古族地区，进行减租减息。

一九四六年七月

提出推平土地的要求。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房，牧者有其畜”。由原有干部和借二十一分区干部三十余人组成工作队，进行汉区工作。由内蒙古青年联合会奈曼分会负责蒙古族地区的工作。一般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哲盟政府命令），普遍拿出土地、牲畜、粮食平均分配，未经斗争。蒙古族地区进展尤快。但实际上是明分暗不分，群众分得东西，情况变化时，多数退回或被要回；农会组织、干部不纯，有的只是形式；群众正统观念仍很浓厚；和蒙族上层分子矛盾尖锐。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伪警察佟森茂、佟玉化、王其嘎、他青嘎等人，勾串阜新、库伦、后旗和中旗的土匪小海山、大海山、野狼、满天红，哈拉哈旗的西力布，库伦旗的敖特根、勿力吉巴图以及海州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十七团、七十七团等，一起向我旗北部办事处八仙筒进攻。梁东明、罗云彪、王克等同志率众予

以坚决抵抗。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罗云彪付大队长等六名同志英勇牺牲，其他同志突围出去，撤出八仙筒。敌人盘踞了二十余日。

一九四六年九月

清算斗争逐步深入，触及了封建反动上层利益，加之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阜新、北票、库伦、赤峰、通辽、开鲁等地相继被占领。奈曼旗十五团在苏达那木达尔济、洛布等等人的策动下，三连、四连、一连一个班和警卫连的一部分人发生叛变。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西满分局决定阜新分委、奈曼、库伦交一地委代管。

一九四六年十月

一分区路东工作队撤退。路西支队、阜（新）彰（武）大队等部队和地方干部共三万多人集结于大沁他拉，并成立了后勤供给处。当时，陶铸同志来到奈曼，在双合村召开了旗县委书记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一九四六年冬

洛布等纠集匪徒一千余人，从大沁庙经付家营子到北老屯，围攻大沁他拉。当时路西支队驻守大沁他拉，土匪未能攻入，在工程庙赶走了一群马逃走。我十五团、旗大队和联合会共三百余人，追到平安地大树营子打了一仗。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土匪仁义、大庄稼人、小庄稼人、路字等流窜到我旗南部山区，抢夺民财，危害治安。我旗地方武装十五团和南部几个区的区中队互相配合，在石匠沟将他们包围并打垮。在一处山坡上就歼敌近三十人。随后，十五团、区中队返回到石碑土打了洛布等叛匪，击毙里巨力合等数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西地区十三个行政村,有几个村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五十人。土城子区十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七十五人。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宣传党的政策,搞减租减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率工作队到浩沁苏木区刘家茶馆筹集过春节的军需物品,被土匪包围。突围中梁东明同志壮烈牺牲。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

奈曼旗党组织在地方武装和干部中发展了少数党员。在王府区也搞了组织发展工作。因为缺乏经验,盲目突击,新发展八十多名党员在统计时只找到三十一个。成份严重不纯。一九四七年区委整顿时,二十四名党员清洗了二十三个。一九四六年末,全旗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九人。

一九四七年春

我军发动春季攻势,开鲁、通辽、库伦相继收复,一分区东进。各县(铁、法、昌、康、新)的地方干部多数暂留奈曼,组织工作队七、八十人在奈曼开展土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土改工作首先在王府区开展,历时五个月。以大地主为主要对象,中地主说服献地,小地主完全不动。由于包办代替,作法不当,“夹生饭”较多,打击面占百分之五至六。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西地区、土城子区划归奈曼。

一九四七年二月

一、五地委合并。吕明仁任地委书记。四月十二日,吕明仁从开鲁检查工作返回奈曼,过老哈河时,为抢救落水的警卫员,不幸牺牲,年仅三十三岁。追悼会在奈曼举行,由

希力卜僧格（李洪范）主持。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月

两地、八仙筒、筒门营子、大歹等区派进土改工作队，对封建势力采取了普遍摧毁的方针，打击面在百分之七、八左右。春耕前后，大部分村屯的土改工作完成。

一九四七年四月

奈曼旗派出十几名代表赴乌兰浩特（王爷庙）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其中有包中乃、敖力玛扎布、王国荣、那木彦道尔济、于宗海、那德那巴拉、达日玛、布和温都苏、钢嘎木仁、图勒根等人。

一九四七年五月

地委召开群工会议。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土改、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为方针，具体政策未变。

这时，蒙古族地区只有少数地方开展工作。政策是只搞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总有地”只分配一部分，私有地减租减息；口号是“反对美蒋，打倒坏蛋，减租减息、生产互助，改善生活，蒙汉团结”。这阶段只触动了个别坏人，工作不够深入，仍有“左”的倾向。

一九四七年八月

路西分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建立“三大思想”的指示，即消灭地主阶级，满足群众要求，团结中农。提出“彻底分地、彻底翻身”的口号，开展全旗性的“砍大树、挖财宝”的群众运动。一个月內全旗大部分汉族地区（除浩沁苏木大部分及苇莲苏等地）普遍开展了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的斗争，特点是猛、快、广，斗争果实较多，打击面约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参加这场斗争的有三万余人。打人较普遍，个别地区死人较多。比较成熟的占三分之一，有些问题的占

三分之一，夹生严重的占三分之一。尚有部分空白区。

蒙古族地区百分之三十的村子进行了工作，打击了一些敌伪残余和坏人。包办代替严重，工作不够深入。这时调正了工作队部分干部，并培养了一批骨干。

一九四七年八月

在八仙筒挖出了国民党绥东县县党部成员贾雨辰、刘廷章、冷占东，尔后，被处以死刑。

一九四七年九月

奈曼开展轰轰烈烈的支前活动，做军鞋、运军粮和各类军需物资，并组织了一千二百人的担架队。分为两个大队，每队六百多人，一百付担架。第一大队队长孙占魁，第二大队队长陈景阳。担架队参加了辽沈战役。

一九四七年十月

正值秋季攻势顺利开展之际，在奈曼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扩兵运动，全旗动员新兵一千五百人左右，实际入伍一千余人。旗大队也有两个连加入主力部队。

一九四七年末

在一九四七年内，经过土改和各项运动的锻炼考验，全旗各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全旗十一个区除明仁区外，都建立了党组织（各区的部分村屯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全旗蒙族干部有八十多人，党员不足十人，全旗共有党员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九四七年秋季攻势后，五分区扩大，奈曼成为巩固的后方，各区相继建立了村政权，出兵、出干部四千余人。根据这年十一月初地委扩大会议指示和十一月下旬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反映的情况，旗委决定：“深入开展复查运动，在阴

历年以前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巩固的贫雇农优势”。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土地，并试行抽出富农的多余土地，填平补齐，调整土地，划分阶级。工作方法是强调贫雇农路线，各区普遍举办贫雇农训练班，受训人员约二千五百人到三千人。组织诉苦、查阶级，定成份，开展全面复查运动。历时两个多月。斗争持久、深入，成果较大。但错误也比较多，主要是对阶级成份的划分界线不够清楚，侵犯了部分中农利益，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打人多，死人多，“左”的倾向有所发展。

蒙古族地区，贫雇农骨干已占优势。由于受汉族地区的影响，也开始平分土地，半农半牧区开始平分牲畜，全旗的庙宇陆续被拆毁。

一九四八年一月

地委召开了土地会议。旗里二月初召开全旗干部会议，进行整编队伍，交权审干，清理阶级异己分子；教育干部当好人民的“牛”；并布置了平分土地的工作任务。政策是“光、平、保”（即光地主，平分土地，保卫胜利果实）。

一九四八年四月

全旗开展平分土地与“扫荡”运动，斗争空前猛烈。十天之内全旗一村不剩全面铺开，并组织了帮翻队、扫荡队，推动群众运动开展。起到了带动落后、突破死角的作用。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二十三。结合平分土地，征收了九百名预备兵。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奈曼旗委书记巩绍英传达了东北局指示。指出东北地区土改成绩是主要的，消灭了封建势力，贫雇农掌了权。但也有原则错误，主要是打击面过宽，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五，损

害了中农利益；打人普遍，杀人过多；侵犯了工商业者利益等。提出要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十，对搞错的中农要补偿，打死的要抚恤。并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支援战争。本着这个精神，全旗开展划补，对划错斗错的中农，在政治上要做好思想工作，加强团结；在经济上利用村委会储存的物资和土地进行补偿。同时，掀起了大生产高潮。

一九四八年八月

办了两期村干部训练班。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

一九四八年八月

奈曼旗开始公开建党。提出建党的三个条件是：有较多的积极分子和对象；群众有相当觉悟；有比较强的领导。首先要抓好试点，取得经验，老区抓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方法步骤是：先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开展思想酝酿；经过自愿报名，群众评议，支部讨论，区委批准，正式履行入党手续，再向群众公布。原来已经有党组织的村子，在建党时首先要抓好整党，整顿思想作风，评功评过，检讨工作，检讨思想，增强党的战斗力。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辽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通知，库伦、奈曼二旗归还哲里木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哲里木盟召开旗委书记联席会议，奈曼旗委书记边亭参加。在会议上，组织部长任志远讲了全盟党员情况和建党问题。当时，奈曼旗有党员一千零二十九名，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二点四。一九四八年全年发展党员六百多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举办奈曼旗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参加党员六十一人。党员训练班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十二月十三日结束。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这年末，全旗共有党员一千二百九十三人。

一九四九年四月

全旗农村共有党支部八十一个，占一百五十个行政村的百分之五十四。农村党员九百九十八名，农村人口十五万九千一百九十三人，党员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六。党在农村的力量大大加强。

一九四九年四月

全旗根据“巩固为主”的建党方针，各党支部进行了组织整顿，选举了支委，建立了组织制度，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举办全旗性的党员训练班，训练党员三百五十七名。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和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提高党员思想，克服自私自利，提高对党的认识水平以及克服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问题。

周荣九与奈曼“抗日救国军”

张 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疯狂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后，我国东北的锦绣河山便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

一九三二年春，日本侵略军入侵内蒙古奈曼旗，占领了当时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镇。日本官吏佐佐木正太郎一伙，为了达到奴役奈曼人民的目的，强化所谓治安，对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在政治上搞“以华治华”，保留了原县公署的体制，利用县长何序武，保安队长李春荣，残酷欺压蒙汉各族人民，到处抓思想犯、经济犯，到处搜索武器弹药，强迫人民学日文、服苦役；在经济上，丈量土地，高额征收农民的租税赋，吞噬人民的血汗。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贫苦农牧民和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的地主、王公贵族，对日本侵略者都充满了无比的仇恨，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周荣九等人代表着奈曼旗蒙汉等各族人民的意愿，拉开了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

周荣九，原名周荣，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屯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十几岁开始，他就给地主扛活。从二十岁开始，他赶着驴驮子跑阜新清河门，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在长期的浪迹生涯中，他染上了一些坏习气，曾跑到承德地区当过几个月土匪。他体壮力大，加之能

双手使枪，枪法过人，为众匪所折服，拥为司令。后来，他被东北军接纳，历任排长、连长。部队改编后，他任阜新县地方保安队大队长。日本侵占东北后，他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拒绝上级调他进关的命令，毅然离开东北军，弃甲还乡。

一九三三年夏，他被绥东县县长何序武请到县公署，任保安队队长，在他担任大队长期间，目睹日本侵略军欺压百姓、惨无人道的罪行，常常愤怒不平。日本侵略军觉察到他心怀不满，不肯忠心效劳，就于一九三四年四月的一天，借宴请之机，缴了他的械。周荣见日本人居心叵测，为保全性命，连夜带上几个亲信，逃出县公署，再次回到老家。

回到家后，周荣抑郁寡欢，气愤难消，抗日情绪愈加强烈。一天，他正在南山牧马，平房村张志跃的孙子前来报信，说有三个日本人正在他家翻抄抢劫。他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持枪前往，直接到鄂尔吐板街。此时，三个日本人正在“益成兴”铺店行凶作恶。一个日本人见势不妙，拔腿逃窜，当即被周荣一枪击毙。另外两个日本人被周荣当场活捉，处死在河南杖子村南的山沟里。百姓听说此事，无不拍手称快。

此事之后，周荣的抗日救国之心更加迫切，决意要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不枉自己英雄一世。他期盼着时机的到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奈曼旗南部山区大地主卜相臣的儿子卜昭鑫闹“老黄”。过后，在他家大门的门栓上发现了一张柬贴，上写：“宋太宗重新出世，投胎于你家大儿子和二儿子的身上，是当今的皇帝。为保一方太平，速调拨人马攻打东京。如违天意，两人性命难保”。落款写着“黄

石公”三个字。

卜昭鑫看毕，大吃一惊，慌忙把柬贴送给父亲看。卜相臣看后犹疑不决，心想：我家虽然是大户，但未必能出皇帝，如果真有这份福气，也必须有人保驾才行。他半信半疑地把一封回书投进炉子里烧了，以告天神。可没过几天，卜家门上又出现了一张柬帖，上写：“有黄石公和‘三九’能够保朝，请不必多虑。”卜相臣知道黄石公是天上的神仙，但不知‘三九’为何许人也。正当他迷惑不解之时，只见周荣风尘仆仆闯进门来。卜相臣向周荣言及此事，不料周荣却说：“我已知晓，‘三九’是三个人，有刘荣九、徐向九……”周荣说到这里，停了停。卜相臣急切地问道：“那一‘九’呢？”周荣指着自已说：“那一‘九’不是别人，就是我。”

从此，周荣的名字便成了周荣九。

卜相臣听周荣九这么一说，心中的疑雾顿时消散了。他想：徐向九在热河省府当过副官，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确是保朝的文官；刘荣九、周荣九都是带兵打仗之人，现在有枪有人，确是保驾之武将。卜相臣遂信以为真。

周荣九见卜相臣不再怀疑，知其中计，心中暗喜，当即把此事张扬出去，很快就众所周知。

周荣九打着保驾皇帝的旗号，拉起了抗日队伍。人们听说老卜家出了皇帝，要打日本鬼子，就纷纷响应，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仅几天的时间，队伍就发展了一百多人。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周荣九又与马老排取得了秘密联系。马老排原名全宝，在王爷府任保安队长，是个私官两相，很有势力的人物。日军入侵后，随着王府的垮台和保安队的解

体，他也成了牌位。出于民族仇恨，他对周荣九的举动非常支持，表示“对日本侵略军要狠狠地整、整他个你死我活”。当即他派亲信部下小敦力布等带领七十多人马投奔周荣九。

在马老排的指点下，周荣九又联络活动在黑城子一带的裴玉卿、兰天林等人，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的旗号。他还规定，不许打骂百姓，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抢夺民财等项纪律，并做出了攻打八仙筒的战斗部署和向开鲁、通辽等地进军的计划。大计已定，周荣九便护拥着卜家的两个儿子，率领“抗日救国军”向八仙筒进发。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抗日救国军”将八仙筒小镇团团围住。他们各有分工，部署严密，一声令下，枪声骤起。镇内爱国的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抗日救国军”，挖墙窟窿，割电话线。八仙筒镇的多数伪军因受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放弃了还击，实际上只有那几个日军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伪军负隅顽抗着。这样，外攻内应，“抗日救国军”仅用了四个小时就攻陷了八仙筒镇。打死了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警长田金座和盐务局长穆村等八人，只有一个名叫徐藤的日本人逃掉了。伪公署卫队和警察除战死和逃跑者外，余下全部投降。

战斗结束后的下午，周荣九下令将活捉的三名日本人悬吊在十字街西南院，召开群众控诉大会。会后，把三名日本人拉到街外南沙坑枪毙。为了维护战后秩序，“抗日救国军”立即张贴安民告示，告诉百姓不必惊慌，农民安心种田，店铺自管营业。一些乘机抢劫的歹徒，当即被“抗日救国军”处死。不到两天，“广升和”等商号都照常开业了。周荣九还下令打开监狱，全部释放了被日军关押的无辜百

姓。

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草原各地，深受日军残酷奴役和统治的蒙汉各族人民，大解心头之恨。奈曼邻县的日军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

“抗日救国军”在八仙筒休整期间，队伍内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周荣九的部下信守原定纪律，安分守己，不抢不夺；而裴玉卿手下的一些人则掠夺民财，调戏妇女，肆意横行。居民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找周荣九申诉。周荣九向裴玉卿提出警告，终未奏效。一天，裴玉卿的部下双红和杨青山到东门外老百姓家翻箱倒柜，强奸妇女，被周荣九发现后，当即拉出去枪毙了。此事触怒了裴玉卿，使他和周荣九的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周荣九权衡利弊，放弃原攻打开鲁和通过的作战计划，把自己的队伍拉出了八仙筒，向南奔往黑山一带。

周荣九的队伍撤出八仙筒不久，日军便反扑回来，八仙筒再度沦陷，奈曼蒙汉各族人民又饱受日军的血腥镇压。

周荣九率领“抗日救国军”在黑山一带，以游击作战的方式，不断袭击日本侵略军，打击着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日救国军”也随之不断壮大，最后达到一千五百多人。

一九三六年九月，周荣九把卜家的两个儿子安排好，率队向羊羔子庙一带撤退，途中被围在一片高粱地里。日军动用了飞机、大炮向救国军疯狂轰炸、扫射。在敌人强大的火力面前，周荣九率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人战死在高粱地里。

周荣九带领几个人冲出包围圈，准备奔往鲁木头山，途经向阳所时，被人发现告密。于是，化吉营子治安队长金宝仓领着一伙人追到鲁木头山，周荣九三人被包围。最后，

由于弹尽粮绝，精疲力尽，周荣九自刎而死，时年四十二岁。从此，这支“抗日救国军”在奈曼大地上永远消失了。

周荣九死后，日军割下他的首级，悬挂在鄂尔吐板街的树上，示众七天。当人们看到嘴里有几颗金牙的周荣九确实死了时，百姓心中都充满了悲愤，更加激起了奈曼蒙汉各族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忆蒙骑二师十五团

那德木都口述

马德山 整理

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五团（以下简称蒙骑二师十五团）是建国前夕活跃在奈曼大地上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尽管在革命的征程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部分人叛变给革命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她在奈曼武装斗争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五团的诞生

一九四五年“九三”光复后，奈曼旗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即五爷）为了保住王位，维护其统治地位，以“保护奈曼安全”为名，组织了一支地方保安队，约五、六百人。

一九四六年初，东北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八路军的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已有所觉悟。一部分蒙汉各族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十分活跃，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选择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东蒙自卫军司令员阿斯根率部第一次从王爷庙（乌兰浩特）南下，解放了库伦，成立了库伦旗政府。然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趁着人心未定，内战频繁之机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其中，开鲁的国民党部队张念祖匪部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出兵八百余人强占了奈曼，建立了所谓的绥东县。当时保安队中一些有识之士和进步力量则主张投靠八路军，接受

共产党的领导。鉴于张念祖匪徒在奈曼的猖獗活动，哈斯通力嘎派米吉僧格、宝连和、那德木都、宝迪胡德嘎等人去库伦联系，赵任远政委接见了他们。赵任远同志详细地询问了奈曼旗敌我双方的情况，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派出了东北独立旅的一个团，由宝连和等人带路，同奈曼旗保安队于大沁庙会合。为消灭敌人，双方商定，兵分两路包围驻扎在大沁他拉的张念祖匪部。经过激战，在双合村和张二围子将张部击溃。毙敌三十余人，俘虏一百二十余人，其余狼狈逃窜，使大沁他拉获得了解放。接着保安队于二月十六日接受了改编，番号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九团。同年四月，又归属于辽吉军区第五分区领导，番号改为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十五团。为了加强十五团的领导力量，第五军分区及时选派了政工干部，团配有政委，连有政治指导员。从此，这支革命部队就活跃在奈曼及其附近旗县的大地上，在剿匪及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十五团的建制

改编后，蒙骑二师十五团为五个连队建制，连下设排，排下有班，皆三三制。每连百余人，全团共五百余人。连队以上的指挥员是：

团长：马占峰（旺哈尔）；
政治委员：陈明山；
付团长：哈力巴拉、希力巴拉；
参谋长：宋宝山；
教育参谋：拉布哈道尔吉；
侦察参谋：德木尔勒；
通讯参谋：梁扎木撒；
供给处主任：王国荣；

副官：东吉；

财会：杜学增；

第一连：连长阿生嘎，指导员勿力吉，副连长斯格木都；

第二连：连长若来，指导员赵旭，副连长旺朝格道尔吉；

第三连：连长巴力吉尼玛，指导员吴××，副连长宝很代；

第四连：连长嘎斯拉，指导员赵桓，副连长旺沁扎布；

警卫连：连长宋宝山（兼），指导员刘君山，副连长胡力巴。

一九四六年九月，东北地区的形势十分复杂。几经整顿的十五团虽然补充了一批觉悟了的蒙汉青年，但伪官吏，伪警察，伪国兵和地（牧）主仍占很大的比例。其中本来就是看风驶舵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拉起一部分人叛变了。当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五军分区派来的政工干部全撤回去了。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内蒙军分区又配备了一批军政干部。

三、四连叛变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在全旗深入展开。这场运动直接触动了封建上层人物和地（牧）主的利益，同时也波及到了十五团。是年秋，与奈曼毗邻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阜新、北票、库伦、赤峰、通辽和开鲁等地被国民党占领。我沈阳地区的第一军分区和阜新一带的第五军分区部队撤离原驻地，来到了奈曼。这时，被十五团在整编中解职回家的原九团副团长洛布等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遂与不甘心失去王位的奈曼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

济串通在一起，他们到处游说，蛊惑人心，声称苏达那木达尔济是天上下来“拯救奈曼人民”、“免遭灾难之苦”的草龙，还扬言什么“八路军要全部解除十五团的武装，把有头有脑的全部杀光”云云。同时，洛布等一方面勾结宾图旗叛变的蒙骑十三团头子高山（尼木德），一方面暗中拉拢他在十五团的老班底，煽动武装叛变，妄图另立山头。

经过洛布等、宝根代（三连副连长）、嘎斯拉（四连连长，与洛布等是朋友之交）等人密谋策划，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十五团三连、四连分别在哈图（今库伦旗芒罕苏木）和八仙筒南他拉土等地公开叛变。两个叛变连队在洛布等、宝根代、嘎斯拉的胁迫下，伙同宾图旗高山等叛匪武装包围了八仙筒，枪口指向了我旗大队。在这场战斗中，我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等人壮烈牺牲。在此之后，叛匪的一部分人跑到阜新投靠了国民党七十一军；一部分在奈曼、开鲁一带搞反革命破坏活动。三连的一个排既不跟叛匪走，也不听从十五团的调动，后来在阿布得台被十五团马团长缴了械。

三、四连的叛变，是洛布等等人阴谋策划的结果。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被迫的，有些人是不跟着走的。如三连长巴力吉尼玛就不从叛变，带领十多个战士返回其家乡科左中旗；三连指导员肖顺嘎竟只身跑出，回到了十五团；四连副连长旺沁扎布等三十余人，虽被叛匪挟持，但在打完八仙筒的第二天，借追旗大队之机，回到了十五团的怀抱。

三、四连的叛变尽管给革命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暴露了坏人，纯洁了队伍，从而给以后的扩员整编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整训整编、成长壮大

三、四连叛变后，一、二连和警卫连的部分人也曾发生过动摇。因此，政治思想工作便被提到首要的日程上来。

形势的变化，各种各样的谣言也曾传到了驻守在衙门营子（今青龙山镇）的二连。当时，任二连指导员的赵旭配合其他连干部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了用事实揭穿“八路军要缴十五团的武器”的谣言，他在二连选派了那德木都等三人带了一个排和一封亲笔信送到第五军分区驻福兴地的路西支队司令部，并命令第二天返回。这个排当天就到了福兴地，受到了路西支队司令员（姓孙）的热情接待，用大米饭，炖羊肉予以款待，不仅没有缴他们的武器，而且，回来时还给这个排每个战士按枪支种类赠送子弹七百余发。该排回到连队以后，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开展了宣传。使战士切实感受到八路军和十五团是鱼水相和，亲如手足，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军要缴十五团武器”这样的事。谣言被揭穿了，战士们思想也稳定了。一致表示要跟赵指导员干到底。

十五团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通过整训和改造清理，清除了民愤较大或有血债的坏人，扩充了兵员。一九四六年冬，又调整了团的领导。团长马占峰，付团长希力巴拉、阿生嘎。各连队也配备了新的力量。经过整顿，十五团的战斗力增强了，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配合路西支队，潢水部队和白水部队辗转开鲁、天山、阜新、库伦、彰武和康平等地开展武装斗争，并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四七年二月，解放军的大反攻开始了。通辽、开鲁、库伦等地已相继收复，这时，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阿斯根第二次南下，用他带来的部分政工干部充实了十五团。团政

委是特吉苏，参谋长白音都冷，连指导员分别是王宝、高海清、常岁等。接着十五团就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在务欢池，哈尔滨，新岳，冯家等地作战，不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还接受了敌人整班整排的投降。这时，各连的人员增多了，武器装备也好起来。为搞好政治工作，加强连队的组织纪律教育，一九四七年六月，把全国各连纪律不好的及部分投诚人员共一百余人集中在一起，成立教育连，在奈曼的大沁庙进行集训。政治工作由指导员王宝负责，行政工作由连长旺钦扎布及那德木都负责。经过一个月的纪律教育和军政训练，部队进行了一次清理，把屡教不改、目无组织纪律和年令较大的放回去和精简一部分。八月，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扩军，从沙日浩来、章古台、大歹、白音塔拉等区补充了新兵八十多人，同时，又从旗大队抽调了一百二十名战士充实了十五团。新编的十五团仍是一、二、三、四连和警卫连建制。这时，连里已经发展了党员，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提高了一大步。扩充整编以后，团长是马占峰，付团长是阿生嘎，政治委员特吉苏，政治部主任彦明，参谋长高力套，组织干事常岁，宣教干事财音勿力塔，作战教育参谋那德木都，侦察参谋德木尔勒，通讯参谋巴图白音，财会杜学增，供给处主任王国荣，现金管理员苏斯图。连队干部也相应的做了调整。全团计五百余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五军分区为培养干部，以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从蒙骑二师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和十五团抽调了正副团长、政委、连长和有培养前途的班排长到第五军分区教导队学习。通过五个月的集训，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质。

一九四八年二月，蒙骑二师全面展开了诉苦运动。十五

团通过对团、连、排、班共五十余名干部交权审干，清查阶级出身，纯洁了队伍。三月，十五团在第五军分区学习的干部全回到原部队，由蒙骑二师统一调配。蒙骑二师把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十五团、阜新县的独立团和前郭旗的独立团混合编成四个团，番号为四团、五团、六团和警卫团。从此，十五团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序列。

十五团的战绩

蒙骑二师十五团自成立以来，其宗旨就很明确，除了保卫奈曼外，还要保卫内蒙古以至全东北。在第五军分区的领导下，两年多这支部队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对保卫奈曼、保卫友邻旗县以及配合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解放全东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主要战役、战绩有：

在奈曼旗境内

一九四六年二月，该团配合东北独立旅保安二团攻打被国民党张念祖匪部占领的大沁他拉，打死打伤敌人二百余名。在追击逃敌到石匠沟时，又打死打伤敌数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团二连在沙口沿来西北同北票黑城子王爷的残匪交战，将其赶出奈曼；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团二连在青龙山东南的卧龙泉子和土匪“大庄稼人”打了一仗，打得土匪狼狈逃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团和路西支队同国民党七十一军十六团在八仙筒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名，打破了国民党占领八仙筒的美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团一连、二连和警卫连在石匠沟围堵了土匪，打死敌人三十余名；

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战略

的需要，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五军分区后勤部转移到奈曼，连同二十一军分区在内，三个军分区的伤病员也在奈曼治疗休养。包括通辽、开鲁和库伦等地来奈曼的人数达三万余。这期间十五团在保卫奈曼运送伤病员中做出了贡献。

在奈曼以外的地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团二连在阜新县的木匠沟严厉打击了地主武装红枪会，并把地主武装头子就地枪决；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团的一、二连在库伦境内的黄土岭攻破了地主武装的一个据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全团配合路西支队在开鲁的牛家窑歼灭国民党张念祖残部一百余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全团和路西支队在开鲁重创了国民党七十一军宋万里支队，毙敌四、五十人。接着围剿了张念祖残部和在开鲁境内的其他匪徒，为解放开鲁创造了条件。开鲁解放后，又挥师南下，参加了解放库伦、哈尔套、务欢池、后新丘、冯家等地的战斗。在节节胜利中，十五团又返回哲盟，首先解放了吉尔嘎郎，全歼了溥王的保安队。以后，又参加了解放余粮堡的战斗；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团配合第五军分区的潢水部队、白水部队和长江支队在彰武、法库、康平、阜新、北镇等地活动，打了一次又一次大仗，并取得了很大胜利。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团番号取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二师四、五、六团。这支部队为解放东北和全中国继续努力奋战，拼搏！

附记：笔者在整理那德木都（曾任十五团排长）同志的口述资料时，也参考了十五团的吉雅嘎图、梁根德加卜以及其他同志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在此，谨致以谢意。

旗 大 队

布和朝老口述

刘兴华 整理

“九·三”光复后，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了中国，奈曼人民也结束了凌受亡国之苦的生涯。一九四六年一月，从开鲁南下的八路军某部十七旅在大沁他拉地区一举击溃了张念祖匪部，取缔了伪绥东县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奈曼旗政府。哈斯通力嘎任政府旗长，云戒三为副旗长。当时，原保安队已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九团。为了消灭残匪，维持社会治安，巩固胜利成果，保卫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在奈曼组织建立了人民武装——旗大队。

旗大队的编制和装备

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旗大队在组建初期，克服了装备简陋、武器缺乏、经费不足等各种困难。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地成长壮大，战斗力日趋增强。

组建初期旗大队的编制情况为：

大队长由旗长哈斯通力嘎兼任，副大队长罗云彪（江苏人），政委由旗委书记赵任远兼任。当时，旗大队是三连建制，分三处驻防，即一连在大沁他拉，二连在八仙筒，三连在衙门营子（今青龙山镇）。连长和指导员均是八路军留下建立地方武装的人员。其中，一连连长杨振山；二连连长耿振刚，指导员何明鼎；三连连长杨××，副连长肖××。

旗大队建立初期，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只有一支手枪，其余都是套筒子。后来从科左后旗的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二团运来了三十余支枪和部分子弹，武器装备才有所改善。为了扩大武装，加强武器装备，这年四月，旗大队派出米其格拉布丹和额等朝老为正副团长到十一区（今明仁）扩充兵源，组建“大团”（即十一区区中队的前身）。动员人们把收藏的枪支拿出来，支援保家卫国的斗争。五月，旗大队又派布和朝老、布和白音、宁布等人前往老哈河一带征募战马。号召各族人民为建设地方武装、保卫新生政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迷信思想的影响，乡间每年都有“舍善”之举：当时，赛汗庙的“舍善”之马成群，这些马一旦到了庙上，就成了无人敢触犯的“神马”，任其驰骋田野、糟蹋庄稼。旗大队就将这些“神马”收归己有，从而加强了部队的装备。

随着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时间的推移，旗大队这支地方武装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到一九四七年，队伍已扩大到三百四十余人。当时旗大队的编制情况是：

大队长王均；大队副忠乃；副政委欧阳新；总支书记赵桓。

当时仍是三个连：

一连，副连长杨景林；二连，连长杨占山，政治指导员何明晶；三连，连长绰力加布，副连长嘎力达，政治指导员沙力卜。

此外，各努图克（区）也都建立了地方武装——区中队：

一区——王府（大沁他拉），区中队共有十五人，队长田贵、程殿富、张振江；

二区——西地（义隆永），区中队四十人，队长赵和银；

三区——土城子，区中队二十人，队长耿振刚；

四区——衙门营子（青龙山），区中队三十人，队长张贵田；

五区——沙口浩来，区中队二十人，队长田仓、阿力巴、包顶柱、黑虎；

六区——大歹（马家洼子，现名新镇），区中队共三十人，队长李振方；

七区——章古台，区中队共十五人，队长巴力丹；

八区——白音塔拉，区中队共三十五人，队长王风仪、官保；

九区——八仙筒，区中队五十人，队长滕江、崔保平；

十区——浩沁苏木（东明），区中队五十人，队长刘俊轩；

十一区——敖包营子（明仁），区中队十六人，队长吕振武。

旗大队、区中队，上下配合，共同为保卫新生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旗大队的战斗历程

旗大队是应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平叛剿匪之运而生的，她一诞生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一九四六年二月，为了打开全旗土地改革斗争的局面，控制大沁他拉至开鲁、通辽的交通要塞八仙筒，副大队长罗云彪亲自带人到八仙筒扩大队伍，护送来往工作的干部，开辟了八仙筒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旗政府召开青年大会，积极响应“推翻三座大山，争取全内蒙古的民主自治”的口号，选出了以

小喇嘛额尔得木图为主任的青年联合会，并以联合会为主体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青年宣传队。旗大队派员参加宣传队，先后在沙日浩来、太山本头、白音塔拉等地巡回演出节目，同时动员扩大武装，当时又有一批青年参加了旗大队。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旗减租减息运动（称“二五”减租）开始，全旗组建了三个工作队，每队有队员三、四十人，旗大队人员随同减租减息工作队到各努图克（区）开展工作。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团的叛变连队三、四连勾结阜新、库伦、后旗、哈拉哈旗、宾图旗的小海山、大海山、野狼、满天红、西力布、敖特根、勿力吉巴图等匪徒，并同海州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十七团、七十七团纠集在一起，共一千五百余人，向八仙筒逼进。当时，我方在八仙筒的武装部队主要是罗云彪率领的旗大队共六十多人，还有十五团的三十多人以及路经八仙筒的八路军后勤人员（当时称生产车），共计一百五十余人。

八月二十六日，敌人包围了八仙筒。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方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确保百姓的安全，实行了“避实就虚、趁机突围”的战术。在激战中，罗云彪同志壮烈牺牲。

一九四六年九月，洛布等匪帮重返奈曼与旗大队在章古台区额驸营子西交战。匪徒被旗大队击败后，绕道北逃。旗大队配合八路军路西支队追击匪寇，大胜而归。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旗大队会同十五团在石匠沟消灭了“大庄稼人”匪帮三十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匪首洛布等与国民党中央军勾结再次入侵奈曼，在八仙筒修筑工事，重建炮楼。旗大队会同主

力部队在向匪军发起第一次进攻时误入敌埋伏，未能取胜。我方便将驻在大沁他拉的后方人员转移到了青龙山一带，由专员赵明下令将这些人编为潢水部队集结待命。之后，我方组成重兵再举进攻八仙筒，彻底击溃了洛布等匪帮和中央军残部，使土匪在奈曼绝迹。

一九四七年，旗大队开始整训。在整训中，调整了部分领导干部，有的调离，有的免职，同时为了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提升沙力布为一连指导员；白嘎达和杨井林分别为二连和三连连长。从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调工均任大队长，赵桓任政委。在整训练兵的同时，旗大队还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旗大队在保卫新生政权的同时，担负起了收容、输送俘虏的任务。沈阳解放时，国民党保安司令兼警察局长带领其全部人马起义投诚。旗大队奉命将他们的连排级以上军官护送到大后方的白城子。

一九四八年，旗大队完成了在奈曼旗开辟工作、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历史使命，被编入正规部队开赴前线，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八仙筒突围战

汪克

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一九四六年春，组织上把我从辽宁黑山支队调到奈曼旗八仙筒北部办事处工作。与我同来的有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罗的警卫员小刘、勤务员官兴等同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清算汉奸恶霸和建立旗大队第三连。旗委强调指出，旗大队的组成人员，必须以在减租减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有觉悟的青年农牧民为主要对象，要靠缴获地主、伪官吏、伪军官等人的枪支来解决武器问题，尽快地武装自己、开展斗争。

旗大队发展得很快。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大批青年农牧民积极分子参加了旗大队第三连或八路军前方军队。到六月份，这个连队已发展到五、六十人，但枪支很少。后来，上级调拨给我们一部分枪支和二十箱子弹、手榴弹。调拨的枪支都是“九九”式，而子弹却是“九二”型，只有磨了“膛”才能使用。到八月初，第三连已发展到一百三十来人。我们建立的是骑兵，但实际只有三十来匹马，七、八条枪。部分战士只好手持大刀、长矛进行军事训练。

随着部队的发展，旗委又给我们派来连长、指导员、班长等骨干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背信弃义地调重兵向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军占领了四平、郑家屯、保康、茂林、彰武、法库、康平等城镇

以后，便派遣大批特务进入哲盟的库伦、后旗、奈曼等地。他们拉拢、勾结反动地主、王爷、伪军官、地痞流氓、土匪等反动势力进行破坏骚扰活动。当时活动在奈曼旗境内和附近旗县的有名的反动武装有土匪头子洛不等、嘎斯拉、金宝苍、黄士忠、野狼等，其人数约有一千五、六百人。他们同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大肆破坏我减租减息运动，杀害、逮捕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八月十四日，刘家茶馆（现东明镇）区政府被破坏，区农会主任于德水、区武工队长刘俊轩被杀害；三天后，白音塔拉恶霸地主耿广辉又组织了暴乱，下了我白音塔拉区武工队的枪支；七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军骑兵第二师十五团驻在八仙筒附近的两个连队，有部分人叛变投敌。

八仙筒处在众敌包围之中，正在酝酿着一场恶战。是走是守，等待决定。根据旗委的意见，我们几位领导同志作了研究，认为不能轻易撤出。因为八仙筒是通辽、开鲁通向大沁他拉（旗所在地）的咽喉，军家必争之地；这里有一批军需物资一时还难以运出；同时，群众也刚刚发动起来，如果轻易撤出，对我们极为不利，我方兵力虽少，但分区二十六团即将来奈曼清除这些反动武装。据此，坚守八仙筒，等待二十六团到来，击溃敌人的包围是有把握的。接着我们几位领导同志作了具体分工，做战前的必要准备工作。加固工事，对战士进行战备动员，在群众中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战士和群众经过教育斗志很高，都磨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在几天之内就有上百名群众积极分子拿起长矛、大刀配合我们站岗放哨，侦察敌人的行动。

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早晨，据我侦察人员报告，八仙筒北四十多里的扣卜车勒和东南方的他不冷等地均发现了敌人。

为了弄清敌人情况，我和罗云彪带领三十名骑兵到扣卜车勒进行侦察，如果得手就袭击一下。当我们了解到敌人大约有八、九百人，敌众我寡，袭击对我不利，便立即返回八仙筒，继续加强战备工作。

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拂晓，敌人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八仙筒进发。东方发亮，我带几名战士到西北角去查哨，听见远处传来战马嘶鸣，田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突然几颗子弹飞过我们头顶，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战士立刻还击，敌人遇到了阻击，暂时停止了进攻。我立即返回大队部，同罗云彪、梁东明同志研究对策，而后我又带一个班去南门，发现敌人正匍匐前进，同时东面、北面也响起了枪声。根据既定战斗部署，我们迅速把兵力全部撤回大队部院内，进入工事，准备同敌人决战。罗云彪同志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

我们刚进入工事，敌人便徒步冲上来，刹时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有几个敌人狂妄地冲进南大门，战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敌人被打了出去。

这时，罗云彪、梁东明和我在东南炮楼同战士们并肩作战。敌人来势很凶，手榴弹在炮楼的四周和顶上爆炸，罗云彪同志端起冲锋枪向冲上来的敌人狠狠地射击，敌人在炮楼底下留下了一具具死尸。突然一颗子弹从枪眼射进来，罗云彪同志不幸中弹牺牲。罗云彪同志的牺牲，更激起了战士们复仇的怒火，有的跳出工事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向骤雨一般投向敌人。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敌人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了。

罗云彪同志牺牲后，总指挥的责任便落在梁东明我俩的身上。我过去在游击区工作时虽然同敌人较量过，但象这样的自卫战还是第一次，然而我深信，一定能够顶住敌人和击溃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数量多（约一千五、六百人），但他

他们是乌合之众，多数人怕死，只要杀伤其一部分，就能粉碎敌人企图消灭我们的美梦。我们人数虽少，又多数是新兵、首次参加作战，但绝大多数是有觉悟的群众，对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有了这些，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九时许，敌人向我们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在攻击之前，他们用火点着了西城门，刹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一股敌人凭着烟雾的掩护，又冲进了南大门，战士们同敌人在门口打开了拉锯战，冲进来，打出去，混战一团。在我身旁的蒙族区工作人员王庆平同志，也跳出炮楼参加了拉锯战，他站着准确地射击，一连打死好几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经过几个回合，敌人看攻不进来，便换了花招，他们把战斗一开始俘虏去的我方人员，用铁丝绊上腿，用枪逼着来挖墙。被俘的同志到墙跟前一跃跳进了护墙沟，趴在里面对我们喊道：

“同志们请放心，我们至死也不为敌人出力，你们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啊！”我们鼓励他们要耐心等待，一定会想办法去营救他们。他们的这种英勇行动，给战士们增添了无限力量。

中午时分，敌人又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这次攻击的方法很特别，采取地上地下同时进攻的战术，一面集中火力轰炸我东南炮楼（因为东南炮楼是我们的支撑点，它控制中心大街，同时可以打击南面和东面的敌人，我们的主要火力也集中在这里）；一面挖地下洞，企图从地下攻破我们。敌人的这一阴谋及时被我们发觉了，我们立即把战士划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实行分片包干，如果有敌人从地下“冒”出来，就地消灭。不一会，东墙被挖开一个窟窿，钻进来一个敌人，警卫员那再廷同志一枪就结果了他，随即把窟窿堵死。这时，东北墙角又被挖开一个缺口，几个敌人窜进来，手疾眼快的苏永太副排长发挥了英勇顽强、机智果断的精神，他带领几个

战士急速扑过去，一顿手榴弹打死了两个敌人，剩下的抱头退了回去。

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看地下进攻失败了，便集中火力企图摧毁我东南炮楼。手榴弹在炮楼上下响成一片，炮楼顶上一尺多厚的土被炸光，檩木炸得象被狗啃了似的。炮楼四周被打开好几个窟窿，敌人就从这窟窿往里扔手榴弹，几次都被我们飞快地扔了出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我想起了做简易掩体的办法，我们把棉衣、毡子等搬出来，沾上水堵在被炸开的洞口继续向敌人射击。打了一会，抬头一看，炮楼有倒塌的危险，于是我们就撤出炮楼在院中心同战士一起继续用棉衣、毡子等作掩体同敌人打，敌人看攻不进，就撤了回去。

在往炮楼搬运棉衣时，战士小喇嘛光荣牺牲了。小喇嘛是哪个庙的人我已记不清了，他真实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他是为了反抗大喇嘛的压迫而参军的。前几次他参加了别的部队都被大喇嘛找了回去，每次都挨一顿毒打。最后一次，他把大喇嘛的马偷出来，参加了我们旗大队。虽然他第一次参加这样激烈的战斗，表现得却很勇敢，在炮火硝烟中跑来跑去，毫无惧色，直至献出生命。

第三次攻击之后，间歇的时间较长。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召开了党员大会。会议决定：一是等援军到来（前几天旗委已派十三团政委陈玉良去开鲁接二十六团来奈曼清剿这些反动武装，预计近两天能到。事后了解，二十六团因去开鲁双合兴剿匪未能按时赶来），内外夹攻消灭敌人；二是如果天黑前援军仍不到，就组织突围。根据战势的发展，二者可取其—。会上根据党员汇报，我们了解到，部分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他们主张分散突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对战士进

行了坚定必胜信念的教育；并对党员提出了宁可牺牲，不做敌人俘虏的要求。战士们经过简短的教育，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他们表示，虽不同生，但愿同死，不当俘虏，不辜负党的培养；我们都是穷人，敌人是喝我们血汗的，地主坏蛋与我们势不两立，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大家的斗志又高涨起来了。

就在我们开党员会之际，内部出现了变故。有人预谋投降。散会后，副排长杨景林带领几个战士到后院去找饭吃，发现战士周荣等三人在开秘密会议、做白旗和袖章，准备投降。杨景林同志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我作了汇报，我们随即下了他们的枪支，并派人把他们看管起来。后来他们偷跑了。经事后了解，这三个人都是伪警察出身，在清洗中漏了网，一遇风吹草动，便原形毕露了。

下午三点多钟，敌人发起了第四次攻击。正在双方交战中，敌人突然“炸了窝子”，回马逃去。我们当时判断，可能是援军到了。我大喊：“同志们，援军来啦！马上反击，消灭敌人！”战士们一跃而起，迅速冲出了大门。敌人见我们冲出来了，马上又折了回来，把我们压进了院内。这以后，敌人再没敢往里猛攻，只是密切注视着我们的行动。

夜幕慢慢地垂了下来。枪声稀落了。敌人仍然紧紧地围困着我们，也没有我援军到来的征候（敌人所以“炸窝子”，我们到大沁他拉后才知道，是我们旗大队大沁他拉连队一个班在巡逻时听见枪声赶来，牵制敌人一下，因人少，打几枪便撤走了）。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困，我和梁东明等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率众突围。根据白天侦察的情况，选择两个突围点：一是从北面突围，这是敌薄弱点，可轻取；一是西面，因冲出西门就进入高粱地，敌人骑兵不便于行动。同时还确

定了突围后集合点。决定下达后，战士们开始做突围准备。毁坏不能带走的物资：尤其是多余的枪支，有的扔进井里，有的毁坏枪机部件。我和梁东明等十几人从西面突围，耿振刚、何明品等二十多人从北面突围。为了麻痹敌人，吸引敌火力，在突围前，我们用枪筒、木棍子顶着帽子，举过墙头，敌人紧一阵、松一阵向帽子射击。经过几次诱惑，敌人才发现上了当，有人破口大骂：“别他妈的打啦，那是帽子，不是人！”我们趁敌人射击间歇的机会，一跃跳出院墙。跳墙的时候，勤务员小官兴的腿跌坏了，不能行动。我要背他走，他不肯，非自己走不可。小官兴是山东人，有一股犟脾气，他要是不同意的事情，别人一时半会很难说服他。他的父母是在日本鬼子扫荡时被打死的，他也被抓劳工到辽宁省的八道壕煤矿当苦力，当时，他才十六岁。后来，他参加了游击队，作战很勇敢。正在我俩争执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从四面拢来，我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把他背起来一面还击敌人，一面向外冲。就在这时，我看见白天被俘的同志也从沟里跃起来同我们一起往外冲。我们的战士多是当地人，对地形十分熟悉，由他们领路，我们很快绕出了敌人的包围。敌人追了一阵子，没看到我们的影，乱放一阵枪，就停下来了。我们辗转奔波，直到夜间十二点多钟才到达突围的联络点，这里有我们的“耳目”。

天明时分，杨景林带着十四个人也赶到了联络点。杨景林告诉我们，在我们跳墙突围后，敌人的火力封锁了四周的墙头，一部分敌人冲进院内，大喊抓活的。他们看跳墙不行，便从西北角挖开一个洞钻出来。刚拐进一个小巷，见有一伙敌人在吸烟唠嗑。他们趁敌人不备扔出几颗手榴弹，从人堆里冲了过去。在夜里转了向，走了三个多小时，没走出

三里地，最后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这里。同志们听了他的叙述，都欣慰地笑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天之后，突围出来的有三十多名同志回到大沁他拉（其余途中回家了）。这次战斗，因我二十六团外出剿匪未能及时赶到，使我们受了很大损失。有六名同志牺牲，还有几位同志挂了彩。但是，通过这次战斗，进一步考验了干部，锻炼了队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敌人企图一举消灭我们的阴谋（后了解，打死打伤敌人三十多名）。从此，他们再也没敢轻举妄动。这对当地的群众是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这些同志在大沁他拉经过短期体整以后，重新组织起来，又回到了八仙筒。乡亲们看到我们都十分惊喜，称我们是“神八路”。同时，也更信赖我们了。他们纷纷控诉敌人进占八仙筒后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从八仙筒突围后，敌人杀害了同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自卫队长王福祿同志的两个小孩，打死了给梁东明同志看小孩的老黄。一些战士的家属和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惨遭敌人迫害。通过对比，群众对我党有了进一步认识，不少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突围后回家的同志又重新归队，一支更坚强的连队出现在八仙筒。

附记：本文是已故哲里木盟副盟长王克同志于一九六一年一月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曾发表在当时的《哲里木报》，现经编者略加修订、予以转载，以饗读者。

石匠沟歼匪记

涂献庭 那德木都

石匠沟，位于奈曼旗南部山区，是个有山有沟、沟壑交错的小村庄。村北面是一片开阔地，南、东、西三面群峰环绕，似簸箕形谷地。因多年洪水冲击，谷底形成一条十丈多宽、三里多长的干河沟。沟两岸的住户人家，傍山而居。沟东岸是漫长的山梁。东南面有老道山，是石匠沟附近山岭的最高峰。沟南端有一条约一丈宽、一里长人工开凿的石道，叫石匠沟大梁，这里地势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九四〇年前后，一些土匪，如“扫北”、“仁义”、“野狼”、“九江”、“路字”、“大庄稼人”等曾在这里横行无忌、明抢暗夺，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惨无人道的土匪暴行，仅从以下两例即可略见一斑。一九四六年春节，石匠沟村办大秧歌，正月十六晚上，十多名匪徒闯入该村大秧歌操办者刘存水老汉家里，要钱、要粮、要衣物。穷庄稼人能有什么呢？没有，土匪就把刘老汉的儿子打得死去活来，还“蹲了锅腔子”（即用火烤灯）。最后，土匪把办大秧歌借来的衣服以及刘家的物品抢劫一空，扬长而去。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天，“仁义”一伙土匪窜到石匠沟村来抢掠财物。突然，村外枪声大作，匪徒们慌忙夺路而逃，住在本村王荣家的一个土匪，逃跑时把所带的一把警察刀掉在了粪堆上，吓得没顾上拣，事后土匪派人给王家送信，限三天内把警察

刀送到瓦盆窑，否则就来“翻他肋条”。王荣何偿得到过刀？真是天大的冤枉。夫妇二人吓得东藏西躲。无奈，王家只好卖了三千斤干草，买了一把刀送去才算了事。类似这样的暴行，简直是数不胜数。惨遭土匪蹂躏的石匠沟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清除土匪，过上安稳日子。

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十五团不负奈曼人民的厚望，经过先后两次石匠沟战斗，重创了流窜在石匠沟附近的土匪。那激烈的战斗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石匠沟战斗是一场遭遇战，发生在四六年农历十月的一天。这一天，“野狼”那伙土匪共五十多人，在石匠沟宿营。因为沟南住户较少，土匪大部分都住在沟北头。天将放亮之际，为剿匪而路经此地的十五团飞驰而来。瞭水的（站岗的）匪徒发现了骑兵队，鸣枪报警，大部分匪徒从被窝中爬起来，匆忙与我骑兵队接上了火。“野狼”这伙土匪装备精良，对这里的地形较为熟悉。而十五团的士兵当时伏在沟里，对沟外土匪看不清楚，站起来打又无法掩蔽，这些都给土匪的逃跑造成了可乘之机。大部分匪徒顺着沟沟岔岔溜出去后，以沟帮沟沿为掩体，向十五团猛烈开火，欲接应他们尚留在村中的同伙。人喊马嘶，枪声如爆豆。在一户老乡家的院内，有三个土匪带四匹马，逃不出来，大门已被十五团的火力封锁。骑兵战士在外边喊：“快投降，不投降就扔手榴弹啦！”院内侍候土匪的老乡连声呼喊：“可别扔，我们是老百姓啊。”骑兵战士怕伤着老乡，才没扔手榴弹。有一个土匪的下巴被打穿，另外两个土匪逼着院内老乡在北大墙扒了个豁子，在外边土匪的接应下，这三个匪徒窜出院子逃到了村子北边。其中一个土匪的狐狸皮围脖掉在地上，另一个下马拣起来，刚要上马，胳膊被我骑兵打断，上不去马钻

进小沟里被活捉。在北大道旁还打死一个土匪，其余全跑了。

第二次战斗发生在同年农历十一月初四，这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初三中午，以“大庄家人”为首的几股土匪又窜到了石匠沟。傍晚，他们派本村的两个老乡（一名姓张，一名姓王）去山南打探有无军队的消息。张、王二人刚到小窝铺村，就遇见了住在该村的我骑兵部队。原来，是蒙骑二师十五团由衙门营子（今青龙山镇）奉命北调去开鲁县途经此地。于是，两位老乡把土匪的情况向部队一五一十地作了介绍。十五团听他俩介绍的情况与当时所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毅然决定与旗大队相配合，歼灭这股土匪，为民除害。

这次战斗，由十五团团长旺哈尔（马占峰）亲自指挥。共分兵三路：一连和警卫连埋伏于东南面的老道山，控制石匠沟的最高点；二连绕道瓦盆窑，集结于乔家杖子西山（即石匠沟东北山）设伏，同时还派出一小部分出击，引蛇出洞；旗大队扼守西边，以防土匪逃窜。三面夹击，敞开北面，布成“口袋”形阵式。

初四早晨，十五团与旗大队早已部署就绪，以逸待劳，而土匪还都蒙在鼓里。村中的土匪有的若无其事地睡大觉，有的剃头，有的闯入农民家中抢东西，有的忙着杀猪、宰鸡……

首先，诱敌出洞的十五团士兵拉开了战斗的序幕，他们向土匪开枪射击，土匪在村中摸不着头脑，不知来了多少兵马，顿时乱作一团。抢东西的、杀猪的、睡觉的、剃头的都匆忙摸枪拉马，急忙外逃。为了保佑平安，他们的军师“八门先生”（即算卦先生）还占了一卦，根据卦相，命令土匪：“往东挑（跑）”！

这伙土匪乱麻麻地奔向了东南山梁，正好钻进了十五团的伏击圈，成了网中鱼，瓮中鳖。东北方向的骑兵风驰电掣般地杀将过来，打得土匪掉头转向，不知所措。这时，土匪头子高喊：“上山！上山！快！快！”他们企图抢占老道山，以便居高临下打退十五团的追兵。哪知老道山早有埋伏。当他们狂奔到山腰时，埋伏于山顶上的十五团士兵猛烈开火，手榴弹、排子枪顿时响成一片，打得土匪人仰马翻。他们急忙又往回撤，东北方向的追兵业已迫近，山顶上的伏兵也冲了下来，前后夹击，打得土匪东奔西窜，溃不成军。匪徒中有个叫温德路的，对这里地形较熟，由他带路，逃往西北沟，绕过西山，逃脱了二十儿人。十五团在北去并鲁途中，继续追歼溃逃的匪徒，于初六中午，在固日班花的图莫套斯又打死了三名匪徒，并活捉了温德路。

这次战斗历时一个小时，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激战中，我方只牺牲一名战士，共击毙土匪二十九名，在打扫战场时活捉土匪两名。

战斗过后，沟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死尸；战马、枪支、子弹随处可见。后来，当地人们便把这条沟称为死“胡子”（土匪）沟。

两次歼匪战，打击了“野狼”、“大庄稼人”等土匪的嚣张气焰，特别是第二次歼匪战后，这一带再也没有来过土匪。一九四七年春天，来了土改工作队，建立了农民协会，从此石匠沟人民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夜袭“高山”

那德木都

“高山”，原名叫尼木德，高山是他在伪满时期当土匪的匪号。他曾一度混迹于我革命队伍，当过宾图旗蒙骑二师十三团团团长。一九四六年五月，高山率全团人马叛变投敌，成为国民党中央军骑兵某部先遣军上校团长。一九四六年秋，他同奈曼旗洛布等（原内蒙自治军九团付团长，后来在部队整编中被解职回家）勾结在一起，率其部与十五团三、四连（叛变部队），攻打八路军驻奈曼旗北部办事处所在地八仙筒，致使我旗大队遭受重大伤亡，付大队长罗云彪同志就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高山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奈曼人民对他无不恨之入骨。

高山是库伦旗人，家住额勒顺苏木沙格吐嘎查。他自从当上国民党部队的上校团长以后，经常在奈曼、库伦、彰武一代猖獗活动，偶而回去与家中的三个老婆相聚。我十五团一直想趁其回家之际将其处死。但高山狡诈异常，我方一直未逢良机。

一九四六年冬，蒙骑二师十五团在距高山家不远的查干朝老、哈拉朝老（奈曼与库伦交界处）一带活动。一天，部队接到当地群众的报告，说牧民们在围场中发现了三名持枪的士兵也参加打围，可能是高山回家带来的兵。听到这个消息，十五团立即派人赶到围场，将三名士兵抓获。经审讯，他们供认是高山手下的人，这次回乡探家，归途中参加打

固；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高山的部队虽然开过来了，但他只带了六名警卫人员回家，现在正在家里寻欢作乐。得知这一重要情况后，十五团的马团长等领导同志当即决定：派兵出击，夜袭高山，生擒匪首，为民除害。

当天下午，团部对这次行动就做出了具体安排：由一连连长阿生嘎担任总指挥，带队负责。从一连、二连选拔了具有夜战经验的四十名战士，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每人携带四颗手榴弹和较为充足的子弹，左臂缠上白手巾，作为夜间相互识别的标志。为缩小目标，均不骑马，步行奔袭。

阿生嘎带着生龙活虎的四十名战士，于晚间七点钟从哈拉朝老出发。在荒漠中奔袭了二个多小时，将近十点便到了高山的居住地——沙格吐嘎查。

沙格吐户数不多，居住较为分散，大都散居在沙坑之中。屯后是个大沙坨子，沙包上长满了黄柳条。我们刚摸到沙包下，不慎被高山在柳条林子里站岗的哨兵发现。哨兵一拉枪栓，大声喝问：“谁？干什么的？”阿生嘎当即回答：“我们是从阿旗来的，走迷山了，想找人问一下路。”两个站岗的哨兵警惕性很高，平端着枪说：“你们先站住，举起手来！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啦！”阿生嘎双手一摊——这是约好的进攻信号——低沉有力地命令：“散开！上！”按事先的安排，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尽量不开枪，以免打草惊蛇，吓跑匪首高山。战士们一看连长的行动信号，一跃而起，向前猛冲，呈半圆形将沙坨子包围起来。两个站岗的哨兵一看这么多人包围上来，吓得掉头就跑，慌忙中毫无目标地打了两枪，并声嘶力竭地呼喊：“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我们立刻冲上了沙包，控制了制高点，封锁了土匪的退路。

高山的家就座落在沙包脚下。五间正房，还有用柳条编的三个“细细房”（形似蒙古包式样的小屋），四周是用柳条架的篱笆。我方战士一阵猛烈射击，凭借硝烟的掩护，蹑开篱笆，冲入院内，将五间正房和“细细房”包围起来。这时，敌人也从正房的门窗猛烈向外射击。“快向两边闪！”阿生嘎大声命令。战士们迅速地撤到窗户两旁，拧开手榴弹向屋内投去。但木质小格窗棂很结实，两颗吱吱冒烟的手榴弹都被反弹回来，“轰轰”两声巨响，手榴弹在窗外爆炸，没有击中敌人。这时，有的战士匍匐前进，想爬到窗底下，用枪托砸开窗户，然后向屋内投手榴弹，但也没有成功。敌人从门窗不断向外打枪，我们无法接近。战斗一时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屋内的一个土匪把连珠枪顺着东窗口探出向外射击，十分疯狂。我方一名战士顺着墙根猛地窜上去，伸手拽住了灼热的枪管。敌人慌了，拼命往里拽。只听哗啦一声，连枪带人同窗户均被扯到院中。两个人摔打在一起。敌人用子弹带抽中了我战士的眼睛，就地一滚，窜到“细细房”的后面，随即钻进柳条林子深处。我方虽然一阵猛射，但没有击中逃敌。

阿生嘎担心逃跑的敌人会引来土匪的大队人马，使我方处在敌人的内外夹击之中，于是他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叫战士们把靠在西山墙的犁杖踢断，用犁铧、犁把猛砸西窗，几下，西窗就被砸开，接着几颗手榴弹几乎同时飞进屋中。“轰隆隆”一阵巨响，手榴弹在屋内爆炸开花。顿时，步枪的射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的哭喊声连成一片。“别打啦！我们投降！”屋内的土匪停止了射击。阿生嘎命令他们从门口一个个爬出来。高山的警卫员、两个弟弟、三个老婆依次爬出。只有顽匪高山拒不投降，还不时地向外打枪，

我方一名战士被打中，身负重伤。

这时，远处响起了枪声，是高山增援人马上来了。因为他带的八百多人的部队均驻扎在附近村屯，离他家八里路就是其团部，仅警卫连就有二百多人。更何况我方是徒步而来，又没骑战马，撤退时还得抬着受伤的战士，这样势必影响行军的速度。情况万分紧急，战斗再拖延下去对我十分不利。在这关键时刻，阿生嘎果断提出：即使抓不住活的，也要死的。并决定用火攻来迅速结束战斗。我们把成捆的条子点燃扔到窗下，大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房前屋后照得如同白昼。在乱枪中，高山从西山墙小窗跳出窜入草栏子。我们举枪向草栏子一阵猛射……

将近十一点，我们抬着受伤的战士，押着俘虏撤离了沙格吐。当我们走出有三里多地时，借着火光，只见敌人的大队人马拥到了沙格吐。

事后得知，匪首高山因多处受伤，等到他的援军赶到，把他从乱草堆中抬出时，已是奄奄一息。在去彰武抢救途中死去，从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夜袭匪首高山的战斗，严惩了叛匪，为民除了大害，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建国前夕的两期妇女训练班

旗妇联供稿

涂献春整理

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奈曼旗委（当时对外统称为民运部）先后举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

当时奈曼旗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已经完成，大规模的土地工作业已开始。全旗十个区除部分边远偏僻村屯外，大多数村屯妇女会组织已经建立，并在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但是，由于历史及社会的原因，妇女工作干部十分缺乏，妇运工作仍然是当时群众运动中的薄弱一环。由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来我旗开辟工作的老干部中仅有的几位妇女同志正在陆续调往新区，为保证全旗妇运工作的深入开展，迫切需 要从当地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旗委开办了两期妇训班。

两期妇训班，每期参加的人员有五、六十人。学员来自全旗当时十个区的蒙、汉、满三个民族。她们是基层妇女会的骨干，部分人年龄较大，并已结婚成家；多数是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妇女积极分子；还有女学生以及年龄较小、政治素质较好的年轻姑娘。这些学员都是由当地农会认真挑选、经区委严格审查批准后入学的。每期妇训班的时间为一个月。

妇训班由旗委秘书（旗委委员）、奈曼旗第一任妇委书记王端负责。具体负责并兼教员的有张俊英、刘毅茹、刘建

英。这三位女同志都是从关内来的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第一期妇训班只有两名具体工作人员，是舍布扎布和周淑兰同志。舍布扎布同志担任伙食管理和记录工作。第一期妇训班结束后，张俊英同志调往外地工作。第二期妇训班由刘毅茹、刘建英任教，工作人员除舍布扎布和周淑兰外，又从第一期妇训班中挑选出四名骨干加以充实。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条件十分艰苦。旗所在地大沁他拉连妇训班的住所都难以解决，只好安排到王府区乌根包冷去办。妇训班办在该村农会的一个大院内（没收地主的院套），有五间正房，三间西厢房。东西屋是两间一明的大炕。

夜间，一部分学员还住宿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到老乡家里住。没有桌椅板凳，只有几张吃饭用的炕桌。妇训班每期只给每个学习小组发两支铅笔、三张大白纸，以备记录。每日两餐吃的全是高粱米饭，喝的是不见油星的冻白菜或冻萝卜汤。第一期妇训班六十多人，一个月只吃了二斤小麻籽油。

不仅学习、生活条件艰苦，而且还不时地受到土匪的骚扰。一九四七年十月间，一伙土匪窜到距妇训班所在地不远的西北一带活动，形势十分紧张。妇训班里几位同志的小孩及保姆都转移到大沁他拉街里去了。为保证全体学员的安全，旗委正式通知妇训班做转移的准备，大家便一边学习，白天照常坚持上课讨论；一边做好了战斗准备。夜间，年轻的学员站岗放哨。没有钟表便用点香计时，燃尽两柱香换一次岗。等到旗队把那伙顽敌全歼之后，才撤了岗哨。事后，妇训班受到了旗委的表扬。

两期妇训班的学习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阶级教育、形

势教育和妇女解放的教育。鉴于大多数学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状况，妇训班采取了正面灌输和启发诱导相结合的讲授方法。每段学习开始，首先由妇训班负责人上大课，然后分组讨论。旗委书记薛光军、公安局长狄云猷和王端同志都给妇训班学员作过报告。那时，讲课、作报告都是“大众化”，很少有高深的理论，学员听起来通俗易懂，感到语意谆谆，激人奋进。

在两期妇训班中，都专门安排一段时间，开展群众性的“诉苦”、“挖根”和“查三代”的活动。即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王公贵族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诉说劳动妇女遭受政权、神权、夫权和封建礼教、旧婚姻制度迫害的悲惨经历；挖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受剥削压迫、男女不平等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这些活动既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群众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就是有计划地教唱歌曲。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配合阶级教育学唱了“穷人为什么穷，打了粮食归地东，吃粮还要五分利……”等歌曲；进行形势教育，学唱“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共产党实在好”、“母送子，妻送郎，欢送青年上战场”；进行妇女解放教育时，就学唱《我们的红司令》等歌曲。通过学唱革命歌曲，既活跃了训练班的气氛，又鼓舞了学员们的斗志，使大家加深了对革命基本道理的理解，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

第二期妇训班开始，时逢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结束，学员们听取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主要内容是：深入开展反封建斗争，进行全面土地改革，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建立巩固的贫雇农优势。还认真地学习了《土地法大纲》。这些活动

的开展，为训练班的广大妇女参加土改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第二期妇训班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的党组织尚未公开，只能秘密地开展工作。刘风云、臧淑珍、姜彩云、张桂芝、李凤珍等同志，都是由刘毅娟、刘健英介绍，在妇训班填写入党志愿书，经当地区委批准入党的。在训练班即将结束之际，王端同志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旗委关于支前劳军、慰问伤员的指示。当场学员和工作人员就纷纷报名，要求去前线慰问亲人解放军。有十名学员被批准为慰问团成员。慰问团几经磨难，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支前劳军和慰问任务。

这两期训练班，虽然时间较短，但由于全体学员刻苦认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学员中的姜彩云、张桂芝两位同志，原来都没有上过学，参加妇训班后才开始学文化、练写字，她们拿柳条当笔，把大地作黑板，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学习，达到了粗通文墨的程度，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基础。蒙古族学员那仁通拉嘎、李金才刚入妇训班时连汉语都不会讲，结业时基本上能用汉语讲话了。

两期妇训班的举办，在奈曼旗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学员中发展了第一批女党员，培育出了我旗第一代女干部。大多数学员结业后，回到原地都成了基层的骨干；有三十多名学员被分配到全旗当时的十个区担任妇女干部。这对当时发动全旗各族妇女参加土改斗争，保证土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全旗妇女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我旗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各区、公社的妇联主任和旗妇联的两任主任以及全盟妇联主任臧淑珍（现已离休）都是这两期妇训班的学员。这些妇女干部，为党为人民、为奈曼的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次难忘的劳军活动

臧淑珍

一九四七年冬，我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奉命参加了一次由奈曼旗委和人民政府组织的劳军活动。光阴如梭，弹指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了。当时去慰问的部队番号和首长姓名已记不清了，但那些亲身经历过的情景，却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那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发起的秋季攻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了鼓舞我军的斗志，进一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全东北，奈曼旗委和人民政府按照辽吉省委五地委的指示，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支前劳军、慰问伤病员的活动。翻身解放了的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全旗十个区很快就出动了十多辆大车和几峰骆驼，送来了猪肉、羊肉、荞面、粉条等慰问品一万多斤。为了把这些慰问品尽快送到前线，旗委委派浩沁苏木区区长席玉章和衙门营子区副区长冯作范（整顿后任旗政府财政科长）为团长，组织由二十多人参加的慰问团，赶赴前线慰问亲人。

当时正好赶上奈曼旗第二期妇女训练班即将结束。一天下午，旗委委员、旗委秘书王端同志为我们妇训班作报告，他讲述了前线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同时传达了旗委关于开展支前劳军活动的意见。听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场就有不少学员和工作人员主动报名，要

求去前线慰问亲人解放军。王端同志看到我们女同志这样高昂的情绪，非常高兴，表示支持大家的行动。会后，他和妇训班负责人刘毅茹、刘健英共同研究决定，批准我和刘凤云、张桂芝、张希冰、李振玉、曾淑云、刘文英、郝仙荣等（还有位同志名字已记不清）十名同志为慰问团成员。我们这十名女团员，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才十六岁。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当姐妹们得知已被批准参加慰问团时，兴奋的心情真难以抑制，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慰问团大都是年轻人，除团长、车夫和几位农会干部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我们妇训班的女同志。

慰问团出发的前夜，刘毅茹带我去旗民运部参加会议。王端同志见到我们就风趣地说：“我们奈曼旗的慰问团简直成了娘子军了！”“娘子军”这个词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因此印象很深。会上，王秘书向我们讲了慰问团的任务和注意事项，并让我和刘凤云同志协助团长照顾好女同志，王府区农会干部朱文山同志负责车夫等工作。

翌日清晨，慰问团的全体同志满载着全旗各族人民对解放军的深情厚意，向目的地——务欢池进发。务欢池在阜新市东北方向，距阜新市约70余华里，从大沁他拉到务欢池约250余华里。

时值隆冬，北方的天气更是凉风刺骨，寒冷异常。我们十名女同志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虽然天气冷，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作为慰问团的一个成员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似乎驱逐了严寒。出发前冬装尚未发下，我们穿的棉袍、皮袍都是从农会借来的。那时还没有围巾，也不习惯戴口罩，长时间坐车，大家的头发都挂了一层白霜，脸也冻起了泡，手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听使唤。在车上冻得实在挺

不住了，就下车跑一会儿，身子暖和点了，再坐上车；又挺不住了，再下来跑……虽然路途艰辛异常，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的情绪一直很饱满。

从奈曼旗到务欢池要经过库伦旗和阜新县境内的一些地方。当时那一带刚刚解放，还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因此马车时而爬山越岭，时而辗转于崎岖小路。为了赶时间，还要起早贪黑赶路。在我们出发后的第三天早晨，因天色尚暗，道路难行，在马车经过一座山岗时，一位农会干部从车上摔了下来，被后面的车从身上压了过去，受了重伤。天亮后，我们才赶到一个屯子。偏僻的山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只好把伤员安置在老乡家里，留下一位同志照料。这天黄昏时分，慰问团到了阜新境内的小五家子村。因为天气酷冷，旅途颠簸，同志们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团长决定就地休息，并为大家安排了住处。谁知我们刚要入睡，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原来是村里老乡报告，附近发现了土匪。为使慰问品免遭损失，团长决定慰问团连夜行动，绕道赶出危险区。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避开土匪，那一夜竟舍近求远，多走了四十多里路。

就这样，我们冒着严寒，终于在第四天下午到达了务欢池。务欢池是距离前线不远的一个小镇，驻扎许多部队。当我们临近务欢池时，就隐约听到了从前线传来的隆隆炮声，不时地看到运送弹药的大车和抬送伤员的担架队。慰问团的到来，在务欢池的驻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指战员们看到我们这些年青同志，穿着单薄的衣服，长途而来，有的冻伤了手脚，但都有说有笑，情绪饱满，很受感动。接待我们的部队首长说：妇女同志参加慰问团奔赴前线，是奈曼支前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你们这种革命精神，对部队的战士

和伤员是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多打胜仗，早日解放全中国。请你们回去后转告父老乡亲。我们在务欢池停留的一天时间里，受到了驻军和野战医院的热情接待。让我们派代表参观野战医院，了解前线的情况，给我们介绍战斗英雄的事迹。大家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席团长、刘凤云、李振玉我们几人到野战医院参观时，目睹了伤员为消灭蒋匪军、保卫人民英勇作战受的伤以及他们同伤病顽强斗争的情景，都感动得哭了起来，以至席团长把后方人民翻身解放的喜讯都忘记了介绍……

经过近十天的艰苦行程，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胜利归来。

支前劳军，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算不上惊人之举，只能说是一次平凡的经历，但这平凡的经历却使我受益很深，使我对人民解放军更加崇敬，更加热爱了，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革命的胜利和妇女的解放来之不易，从而也激发起我更高的革命热情，它启迪我在以后的生涯中，时刻不忘过去的艰辛。

奈曼王府

张宇

奈曼王府是内蒙古自治区现存的一座较为完整的清代王府。为清代奈曼最高的统治机关。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奈曼为内扎萨克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之一。奈曼为一部一旗。奈曼王统治奈曼的三百余年里，曾四次兴建搬迁王府。

崇德元年（1636年），第一任郡王衮楚克建王府于现太山木头苏木巴彦放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六任郡王却经，为显示王府的尊严豪华，于现在的新镇乡扣根村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较大，形制与故宫相仿、极其豪华的新王府。被清庭发现后，认为是图谋不轨，削掉了却经的王位；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阿萨拉任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他在当年又将王府迁回巴彦放包（往返二迁）；嘉庆八年（1803年），第九任郡王巴拉楚克因感地势不利，把王府迁到叫来河北岸的五福堂（三迁）；同治二年（1863年），第十一任郡王德木楚克扎布，才在大沁他拉镇内兴建王府（即现王府）。后经第十三任郡王玛什巴图尔正式建成使用，距今一百二十余年。

奈曼王府的全部建筑规模较大，有房屋一百四十余间，为一方形大院。占地面积约为二万二千五百平方米。四周为夯土板筑梯形围墙，底宽二米，顶宽一米，高四米。四角设

角楼，大院显得非常威严。

大院东侧设正门一座（现已无存），为王府卫队（旧时称小队子）驻地，王府大院的西北（现食品加工厂）为王府的办事机关（当时称档子房），左武右文藩屏王府。这些建筑早已破坏毁掉。现唯一幸存的仅台榭回廊式四合建筑一座，家庙佛堂三间，二道串堂门三间。

二道串堂门前廊后厦，大红明柱，丹青彩绘，雕梁画栋，龙头燕尾。木雕花墩与矗立门前的一对近二米高的石雕狮子相陪衬，显得王府更加庄严肃穆。后栋为内院（旧时称内宫），是台榭回廊式四合院建筑。正面是富丽堂皇的两扇珠红大门，门镶金钉，轧铁角，门悬两珠（亦称垂珠门），珠子上方木雕四季花卉，中间木雕蝙蝠，口衔金钱，象征“福在眼前”。门上亮子绘“福、禄、寿”三星。内院是彩绘清新的五间正殿和东西各三间的配殿，一色的大屋脊的青砖瓦房。兽头瓦当，叶脉纹滴水。檐下均为丹青彩绘。正殿格扇门上画“八仙庆寿”；两配殿门的两侧绘出水、青竹、菊花，中间绘张衡、屈原、孔子、李时珍四大杰出人物；东配殿两翼为山水花草；中间绘的是《红楼梦》中的人物：探春、林黛玉、王熙凤、妙玉等。台榭回廊内耸立着五十二根珠红明柱。木雕彩绘的龙头、燕尾、花墩，卡口，配以丹青彩绘，雕梁画栋，衬托庭院中的苍松翠柏，显得王府院内是古香古色，清静幽雅。大院左侧二十多米处有三间大屋脊青砖瓦房，矗立于半米高的台阶上。磨砖对缝，建筑细腻精巧，是王府的家庙佛堂。室内正面供奉高大的释迦牟尼贴金佛像，两侧陈列铜铸的三世佛和观音菩萨。佛堂内香炉缭绕，肃穆庄严。

现在的奈曼王府，又复建了一座大门，二个便门，近二

百米长的古代围墙。门前左右一对高大的石雕狮子，衬出古老王府的威严气派。

王府是清代王权统治势力的聚点，它集中封建特权于一身，曾对奈曼人民实行过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然而王府的精湛建筑艺术又是奈曼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奈曼旗历史文物简介

张 宇

据史书记载，自春秋战国以来，东胡、山戎、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就生息在奈曼旗这块土地上。

解放以来，通过历史文物普查，发现全旗境内大约有三百多处历史文物遗迹。其中有史前自然文物——古生物化石；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战国、秦汉时期的燕长城、古城、城堡、关隘、烽燧、居住址；辽、金时期的城址、居住址、墓葬；元、明、清代的遗物、遗迹。真可谓源远流长，奇丽多彩。

一、史前自然文物——古生物化石

古生物化石多出于牐牛河流域。

牐牛河流经奈曼的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它由两条主要支流汇集而成。一条从敖汉流入，横跨土城子乡，向南折经土城子乡与青龙山镇、南湾子乡交界，进入辽宁省后，注入大凌河；另一条在沙日浩来苏木和白音昌乡境内。它平时涓涓细流，常年不息。每当雨季，河水暴涨，湍湍急流，气势磅礴，啸声有如牛吼，故有牐牛河之称。

牐牛河两岸多为台地，土地富饶，人口稠密。台地高出河床二十米，现为耕地和牧地，地表古遗迹、古墓葬均有发现。台地横断面地景清晰可见。但古生物化石属哪部分地层，终究不详。

一九五九年，国家自然博物馆从白音昌乡的牐牛河畔拾

到一枚长轴为十八厘米，短轴为十五厘米的鸵鸟蛋化石（现藏国家自然博物馆）。一九七六年，吉林省考古队又在其附近发现一枚大小、形状与其相同的鸵鸟蛋化石。

一九五六年，在沙日浩来苏木牦牛河畔的水泉村拾到原始野牛角化石二件、颞骨一件。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在牦牛河畔的附近村点，征集到原始野牛角化石一件；野牛上颞骨化石一件；披毛犀骨化石一件；猛马象牙化石一件（现藏哲里木盟博物馆）；野生动物化石四件。

近年来，旗上产公司收购门市部收购兽骨，在白音昌乡前店、红石沟收集到野牛动物化石四件。

在土城子乡桃山北麓，从大量的石灰岩层中发现了三尾丝蠕虫化石，几乎片片岩石都有。它属侏罗纪，距今四、五千万年，当时约为海底。

牦牛河畔大量野生动物化石的出土表明，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肥美、森林茂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鸵鸟蛋化石的出土，象征从前此地气温高而炎热，大概属亚热带气候，适合鸵鸟栖息。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分布地域较广，多以依山傍水为条件。据现存文物考证，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叫来河以北辽河以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的细石器文化。从这三种类型可以看出，我旗的新石器文化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一）细石器文化

我旗现存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大多出土于先锋乡北老

柜村和鄂布根包冷村等北部沙丘。其中有石斧二件，石凿一件，石铲一件，石铤一件，石叶五件，石核二件，研磨器一件，切割器四件，石镞五件，骨镞三条，扁足六件，陶片三十五件（其中彩陶片十件），网坠一件，陶纺轮三件，深腹罐三件，穿孔石刀一件。

一九七四年，吉林省考古队在治安镇满得图村清理出属于红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一处。遗址位于已经干涸的池沼边缘、沙丘地带的底部。出土文物有大量的细石器、打制石器、琢制石器、骨器、蚌饰和陶器等。打制石器有敲砸器、石铤、石铲和石刀；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镞、石铤、穿孔石刀和弹丸；琢制石器有石耜、磨盘、磨棒和有孔重石等；陶器多夹砂褐陶和泥质红陶。褐陶有瓮、罐、碗、斜石器、带流器和善器，多以划压、椎刺或堆贴的方法制成，饰以“之”字纹、线纹、波纹、指爪纹和附加堆纹。红陶有罐、盆、碗、铤和圈足器，多施黑色彩绘，有平行斜线纹、弧线三角纹、菱形纹、勾叶纹、条叶纹等。彩陶的质地、器形，彩绘的布局、图案和风格，都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息息相通。

一九七五年文物普查期间，明仁苏木在其所在地南沼（此地座落辽河南岸，系西喇木伦河与老哈河汇集的下段）沙丘地带的黑黄土坎间，拾到一部分石器、陶片等遗物。石器有石镞一件，石凿一件，骨镞一件；陶片有器底、器物口沿、器耳、器腹片等数十件。石器以磨制为主。陶片多是褐陶片，同样以划压、椎刺、堆贴等手法，饰以“之”字纹，指爪纹、附加堆纹、线纹和波纹，少许绳纹。

诸如此类的细石器文化遗址、遗迹，我旗的固日班花、章古台、图勒恩塔拉、巴嘎波日合、奈林、浩特、苇莲苏和平安地等苏木（乡）均有发现。

从使用打制石器发展到磨制石器，从石镞、骨镞到使用弓箭，从狩猎发展到畜牧业，从使用石耜到雏型农业的出现，表明远古时期中原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为我们揭示细石器时代奈曼居民劳动生息的情景，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

经文物普查，在我旗南部山区和牻牛河流域，叫来河畔，发现数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有大量遗址、遗物和墓葬。标志着这一时期这些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并不晚。

此期文物我旗的出土情况为：

白音昌乡上石碑村出土的石斧五件。一处古墓群（上下六列，每列数十人，墓葬均为直体仰卧土坑墓，殉葬品多为陶鬲、陶甗、罐，质地为夹砂褐陶，多以手制，饰以绳纹或素面）。新镇乡出土陶杯二件；青铜小刀一件；陶鬲四件。沙日浩来苏木出土陶壶一件；陶鬲三件。义隆永乡出土陶鬲一件。青龙山镇下地村位于村落的台地上发现一处古墓群（为直身仰卧葬，四壁用石板垒砌，上盖石板，殉葬品有陶罐、陶鬲、陶甗，质地为夹砂或泥质褐陶，饰以绳纹或素面）。莫家湾子东南，牻牛河北岸，发现一处古墓群，从居民手中征集到陶鬲一件；拾到鬲足数件。土城子乡杏树园子村北小山，出土陶鬲二件；陶豆一件；鬲足数件；陶片数件。质地为夹砂褐陶，多饰以绳纹。

现在吉林省博物馆和哲里木盟博物馆尚有不少奈曼旗出土文物存展。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三千五百多件。

我旗出土的石制品生产工具，如：石耜、梳形穿孔石刀、石铲、石斧、石凿、石铤等生产工具，多为磨制石器，还有细石器。这些遗存石器的出土，不仅表明这里是以农业经济

为主，而且生产技术水平也不低于黄河流域，成为我旗农业文明的见证。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中，多为陶器，其中也采集到石器。有打制的束腰石斧、石镐、手镰；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铲、手镰和石镰；偶尔出现铜器小件；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和磨光黑陶。夹砂褐陶常见有绳纹的甗、鬲、壶罐和罍等；磨光黑陶制作精致，多侈口袋足下接实心足的鬲，折腹盆和杯等。有的器物用红、白两种颜色绘以大片云纹或雷纹等图案，鲜明而强烈的彩色对比，繁缛而严谨的花纹组织，构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白音昌乡出土的彩陶鬲就是一例。

此外，还有常见的装饰品—磨制细腻的玉玦。遗址中出土的甗、鬲、罍等器形都与中原早商的遗物十分相象，彩绘图案多与商代铜器上的纹饰非常接近，卧力图清理的墓葬均竖穴式，并有“二层台”，型制也与商代墓葬相同。

（三）夏家店上层文化

我旗现存此期的文物有：青龙山镇下洼村出土红陶罐一件；土城子乡出土双孔石刀一件，靴形石器一件，玉玦二件；新镇乡扣根村出土折腹罐二件，四耳红陶罐二件，石斧一件；南湾子乡出土石刀二件，石斧一件；白音昌乡椴木沟村出土红陶罐一件；义隆永乡出土石环二件；征集旗土产公司收购的铜牌饰件二件。现王府博物馆存展石斧十件，石铲二件，石核一件，石镞二件，骨镞三件。陶器多为细泥红陶，泥质红陶火候高，但多数为小型容器。有壶、罐、勺、碗等。夹砂陶器火候低，多为炊具。有鬲、甗、豆、罐、钵、盆；铜器有铜戈二件；青铜小刀一件。

从出土文物表明，铜器虽然出土数量少，但已有一定数量的铜制武器。在陶制品技术上虽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

青铜器的出现，逐渐代替了石器。铜制武器的出现，为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少数部落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战国、秦汉时期

(一) 燕国北长城

燕筑长城以防东胡。今赤峰发现的燕长城，西接围场，起自化德以东，经正蓝旗、多伦县，再折入河北省围场县境内，东进赤峰县，经敖汉旗宝国吐乡荷叶花村之西延伸入奈曼旗土城子乡高和村西岗岗后（在沙口浩来苏木新丘村以南二华里处），经塘坊、苇塘沟、七家子、杏树园子等村，直抵牯牛河畔。以牯牛河为天然屏障，向北沿河约四十华里，在牯牛河东的砬石沟，又向东延伸，经蛤蟆山北麓，穿入新镇乡大榆树村，经扣根、哈日干图、双和兴，进入库伦旗平安地乡西北下洼，再蜿蜒东进到先进乡，然后跨入辽宁省阜新县境内。燕长城在我旗境内总长约二百五十华里，长城均以夯土板筑。现今底宽约六米，残高一至二米。虽经两千余年的风吹雨淋，水土流失，仍未被夷为平地。随着山势的起伏，犹如长龙在卧。沿长城设有城堡、烽燧、关隘等。遗迹清晰可见，其当年巍巍耸立的雄姿犹在目前。

(二) 城堡、古城、关隘、烽燧

在奈曼旗境内的南部山区土城子乡，发现战国、秦、汉的古城、城堡、关隘、烽燧等遗迹以及数以千计出土的同期历史文物。有生活用具、建筑构件、货币、兵器、官印等，这些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与出土，部分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奈曼旗这一地区自战国至秦汉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1、善保营子古城

善保营子古城位于奈曼旗南湾子乡三一村善保营子自然屯东南约一华里处。北距燕长城约六十华里，南与辽宁接壤。

古城北为起伏不平的山岭、沟壑，城址向阳。城近方形，城垣四角正处在东、西、南、北方位线上，城墙夯土板筑，今高四米左右。周长约一千三百五十米，城内布局井然。北部居中有一高台建筑址，西南是从事制陶等手工业的作坊区。东北墙垣上有两座望楼址。北望楼原来是一木结构的高耸建筑，底层储放粮食。城内文化堆积可分战国、西汉前期、西汉后期等三个时期。出土瓦件、陶器、兵器、铁器与货币等二千余件文物。质地、形制、工艺都与中原同期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趋向一致的历史进程。

2、土城子古城

土城子古城位于我旗土城子乡西土城子村的西南约一华里处。南距善保营子古城近四十华里，西与赤峰的敖汉旗接壤，城内西南约占城内土地面积三分之一，为敖汉旗所有。城四周，东西多沟壑，南北多台地。古城近四方形，较为完整。四门址清晰可见。每边城墙长四百余米。现城高处可达四至六米，横断面底宽十至十四米，均为夯土板筑。古城设内城，位于西北角呈正方形。每边城墙长近四十米，高处可达三至四米，底宽五米（居民称之为马圈）。城内拾到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陶片、货币、兵器、建筑构件等。

根据出土文物表明，此古城与善保营子古城可为同时期城址。

初步判断，燕长城南侧为燕国秦、汉时期辽西郡领地。上述两座古城，可能为辽西郡十四个县份中的两个县的治所。

3、五间房城堡、桃山关隘、新营子烽燧及其它

五间房城堡，在上城子乡古城东南八华里处的一个四面

环山的土岗上，东距五间房村约半华里远。城堡呈正方形，东、西、北三面为夯土板筑墙，南接烽燧。烽燧的南、东面临深谷。此地战国、秦、汉时期的遗物极易发现。

桃山关隘，在土城子乡关家杖子村东南四华里的桃山北坡和西坡。这两处各有一块用石头垒筑的遗址。当地居民将西北坡石垒遗址称为“金马圈”。桃山北、西、南三面深谷环抱，东面有一平坦台地，中间孤峰耸立，挺拔且险峻，乃天然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新营子烽燧，在南湾子乡寒山皋村新营子东面。此遗址东距善保营子古城十二华里。当遇敌靠拢时以点燃烽火为号，予做准备，遥相呼应。

关家杖子沟蛤蟆山，南与桃山相对，散布着战国、秦、汉时期的遗物。据初步判定，当为燕、秦、汉居民的居住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忙牛河条条支流从千沟万壑中流过。燕长城翻山越岭，跨沟壑涉浅滩蜿蜒向东延伸，五间房城堡、烽燧、桃山关隘，新营子烽燧与善保营子、土城子两座古城遥相呼应，这些，构成了一幅壁垒森严的画卷。

可以想象出，二千多年前，这里是山峦起伏、烽燧相望、村落相连、人丁熙攘的一派繁荣景象，是塞外边陲各族人民社会交际和经济交往的场所。它不仅沟通了塞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经济贸易，也是中原文化向北渗透与北方民族文化融汇的象征。

（三）秦陶量，军司马印

秦陶量是在一九七三年吉林省考古队发掘善保营子古城时出土的。从西汉文化层中出土五件陶量，其中三件的容量

恰好相当于商鞅方升的十倍，可以认定为秦斗。有一件器形较大、只剩腹部和底部的残片，腹壁上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文，字体为秦代隶书。原诏书为四十个字，但这块陶量的残片仅存有十三个字，为“廿六年皇帝并兼有天下诸侯黔首大安”。“廿”、“皇”、“安”，三字均已毁掉。其余“立号为皇帝，仍召丞相状统法度量测不壹，兼疑者，皆明壹之”业已失掉。

载有秦始皇诏书铭文的陶量残片虽不完整，但它是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政府颁发的标准量器，生动地表明了秦代封建帝国的形制，规模和全国政令划一的情况。善保营子古城的形制、规模以及这批珍贵陶量器文物的出土，表明我旗南部山区（以燕长城为界）在秦、汉时期可能属辽西郡某县治地，已划入了秦代封建帝国的版图。

八仙筒镇乌兰章古村的北沼，出土一枚铜质瓦纽，约二厘米见方、系阳文隶书的“军司马印”。据《史书》记载，军司马是汉代的军衔，其职位可能相当于校尉。它的出土，对了解东汉政权在奈曼设立的军事体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我旗现存的此期文物有：土城子乡西土城子村出土青铜短剑一件，铭文“8”字；铜戈一件；铁镞八件；一字镞一件，铜镞二十余件；青铜小刀一件，铜镜三件；铁削一件，五铢钱二十件。清河苏木公益村南沼出土陶壶二件，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其中一件大的为侈口鼓腹平底，体高五十公分。以划压的手法，在腹部饰以群马、犹如在草原上奔腾。另一件体高近二十公分，圆唇侈口鼓腹平底的泥质灰陶，比第一件造型小，无纹饰。泥质灰褐陶壶四件，体高均

在二十公分左右，为圆唇侈口，鼓腹平底，无纹饰；还有陶片数件，铜戈一件，铜剑一件，铜削刀一件，铜镞三十件。

这些出土文物表明，东胡、乌桓、鲜卑，他们以畜牧为主，兼事农耕，是以骠悍为长、骑射为快的游牧部族。

五、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

我旗经过一九七五年的文物普查，初步找到的辽代古城共三处，即：平安地乡西孟家段古城；太和乡舍力虎古城；白音昌乡半拉城子古城。另据《中国历史地图册》载，辽代的龙化州、龙化县应在白音塔拉苏木或昂乃乡境内。估计被流动的风沙所覆盖，故至今未被发现。契丹族在我旗居住时间久，分布范围广，同时又经历了辽代的由盛到衰整个历史过程，所以其历史遗迹在奈曼亦有所发现。如苇莲苏乡西奈曼营子村南发现冶铁址一处，约占面积十亩左右。窑址也有所发现。居住址、古墓群之密集，几乎和现代相比。

辽、金时期，奈曼的遗迹，遗物颇多，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品，以至随葬物，可以说应有尽有。生产工具有，犁铧、锄、镰；生活用具有，锅（六耳）、碗、勺、盆、盘、瓮、盂、钵、壶、瓶、酒器、鸡腿罐、鸡冠壶、盅；兵器有刀、镞、剑、铁蒺藜、马具；葬品有，铜丝网络、铜面具及各种金银饰件。

一九七三年，白音昌乡大营子村出土通体施绿釉的鸡冠壶一对；白釉大碗二件；南湾子乡广富营子出土通体施绿釉的大瓮二件；小城子村出土黑釉葫芦瓶一件，体高二十五公分，空芯；土城子东龙沟村出土铁器、铁刀二件，铁镞四件，犁铧、犁镜各一件；义隆永乡小东甸子出土六耳铁锅一件，瓮罐十四件，其中一件大瓮通体施黑釉，体高九十五公分，胎薄、敛口，可装七挑子水，米一石；太和乡四合村辽

墓出土黄、白釉大碗各一件，绿釉长颈瓶一件，黄釉唾盂一件，三釉印花盘一件，铜面具一件，银质骨灰罇一件，铁锄二件，石狮子一对和其他建筑物件等。一九八四年，得胜乡大包力皋村墓出土提式鸡冠壶二件，铁刀一件，绿釉大盘大碗各一件，绿釉唾盂一件；章古台苏木出土六耳铁锅一件；先锋乡出土绿釉瓮一件，鸡腿罇二件；白音塔拉苏木出土冰裂纹瓶一件；苇莲苏乡出土陶壶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白音昌乡椴木沟出土一处窑藏瓷器，计四十四件，有碗、盘、钵，均为芝口定瓷，多白色，质地细腻精制。其中有三件酱紫釉印花碗，碗内印折枝花卉六组，通体施釉。这种酱紫釉的宝窑制品称“紫定”或“黑定”，是定窑中非常少见的稀世珍品。

六、元、明、清时期

铁木真统一了草原各部落以后，于一二〇六年在斡难河畔召开了库里尔台大会，被推为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开始拒绝向金朝纳贡。继而率兵南征，先灭金后天南宋。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奈曼旗纳入元朝版图。先是属辽东宣慰司管辖，乃为辽王乃颜（别里古台的后裔）的领地。

一二八七年，忽必烈亲征以乃颜为首的东部叛乱诸王后，奈曼就归中书省宁昌路管辖，直至元朝结束。

明代，奈曼属兀哈良领地，后属京师考哈河卫管辖。奈曼部出现后，于明末后金初归附皇太极（后金于一六三六年改为清）。

元、明、清三朝，一二七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奈曼旗主要以蒙古人为主，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奈曼地区的文化，为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献。

此期文物分布既广泛，又丰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饰件，货币样样俱全。

现存有，南湾子乡寒山皋出土黑釉蒜头瓶一件，蓝地黑花罐、双系黑釉瓶各一件；太和乡出土白地铁花罐一件（原件藏哲里木盟博物馆，现展为复制品）白釉铁花瓷壶一件，鸡腿罐一件，铜饰件三件；土城子乡出土铁花罐一件；章古台苏木出土的元代龙凤铁花罐二件；平安地乡出土元代铜印三件，封记二件，铜币一枚，瓜形罐一件，从旗土产公司征集收购来的元代铜镜四件（其中圆的二件，方的一件，带柄圆镜一件）。

从旗土产公司收购门市部征集到大明宣德炉三件，从个人手中征集一件。铜镜三面，景泰兰瓷瓶一件，铜犁铧一件，铜锭一件，铜钱二枚，铜币五件。

八仙筒镇出土清代舍利塔一件；先锋乡出土清代的仙山洞府一座，瓷狮（装饰品）一对，香炉一件；明仁苏木征集到瓷墩四件，两大两小均为赭石釉；平安地乡征集到圆镜一件，上绘山水花卉和八仙图案；昂乃乡出土清代的瓷罐一件；白音昌乡出土清代的瓷罐一件；先锋乡征集圆镜一面，上绘刘备东吴招亲景物；太和乡出土兰花碟一件；义隆永乡征集到兰花甌瓶一对，兰花茶坛一对，豆青兰花（瓦子夺魁）甌瓶一对，铜佛一尊，酒壶一件；王府博物馆收藏鱼缸一件，豆青兰花甌瓶一对，深绿釉大象筒一件；从土产公司征集到铜佛十一尊，朝古台苏木征集到铜佛八尊，太和乡西甸子村征集到玉带头一件，在得胜乡从一个社员手里征集保存下来的清康熙字典三十一本。

纵观奈曼地区的自然文物和历史文物，反映了奈曼地区漫长而悠久历史。从原始社会的晚期绵延至中华民国前夕，众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相继为奈曼旗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人，而又和汉族紧密相连，频频往来，进而融合。为共同开发、繁荣和发展奈曼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大量的出土文物，是长期以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既是生产、生活逐步发展的标志，又是悠久、灿烂文化艺术的再现。

大沁庙的建筑艺术

宝石拉口述

王占山整理

在奈曼旗叫来河东岸，太山木头苏木乌兰尔格村西二华里、敖包嘎查南一华里处，有一片依稀可辨的庙宇残垣，这就是奈曼旗历史上著名的庙宇——大沁庙（寿宁寺）遗址。几经沧桑，庙宇早已荡然无存了，如今遗址上只剩下了片片瓦砾。

大沁庙曾两次兴建。第一次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是奈曼旗萨格拉王爷迁走了七丈高的石塔后，在奈曼境内建起的规模最大的喇嘛庙。其主体建筑大经堂共八十一间，殿堂内供奉着如来佛。整个建筑结构美观、奇伟。此庙一八九一年毁于战火。

大沁庙第二次建于一九三九年。这次建筑的总设计师是第六代佛爷喇嘛扎木样却道尔。他在赴西藏朝拜的归途中，在沙漠中遇到一河泡子。远远望去，水上矗立着一座宝塔，宝塔在白云缭绕中飘浮着，神奇雄伟，富丽堂皇，犹如仙境中的楼阁。这千载难逢的奇遇——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使扎木样却道尔欣喜若狂，他立即描绘出了塔的外观。回到奈曼后，便以此为“样板”，设计制图，聘请雇用工匠以及庙内喇嘛，着手兴建大沁庙。我就是被聘的一员，并由我担任指导，同丹巴仁沁、哈苏荣扎布以及古儒扎布等十多位绘画师一道，承担雕塑、描绘壁画图案以及着色等项任务。从一九

二二年开始筹备，到一九三九年竣工，历时十七年，大沁庙第二次建成了。

这次重建的大沁庙，在规模上小于原大沁庙，但高超的建筑艺术却是原大沁庙无法比拟的。它布局严谨，具有汉、藏、蒙、满等民族的建筑风格和特色。其主体建筑座落在中轴线上。大经堂前十八米是山门。距山门正南二华里是得博古，三华里处是走运庙。大经堂后三米处是一座二十五米高的四层白塔。白塔后两米处是青砖五塔寺。青砖五塔寺北五十米处有座人工修建的假山，大经堂左右二十米处是钟鼓二楼。庙院东墙下建有大厨房。

大沁庙主体建筑大经堂为两层楼建筑，共六十三间。造型庄严雄浑。大经堂为汉式歇山顶式屋顶，即硬山式和庑殿式的结合，四面斜坡的屋面上部转折成垂直的三角形墙面。有一条正脊，四边垂脊和垂脊下端处折向的戗脊四条，故又称九脊式。屋顶上扣灰色筒瓦，顶端饰以鸱头，显得巍峨壮观。大经堂下部是藏式白墙。白墙东、西、南三面上部接有一米高红墙，红墙外墙面的中间安装十五个铜镜。正面门前一排明柱，雕梁画栋，纹饰精美。正门上面的平台上，中间建有一“经轮”，在轮的东西两方有铜铸鎏金的鹿和盖。均是相互对衬。大经堂的后檐墙的外墙皮上，镶嵌着一块九米多高的菱形浮雕，上面雕刻着大肚弥勒佛佛像，造形栩栩如生，刀法简洁有力，线条优美流畅。大经堂的东面有一影壁墙，距影壁墙一米的大经堂东山墙下开有一个别致的小门，可通入大经堂殿内。从正门进入大经堂，堂内有东西六排雕琢着精细图案的三十六根方形石柱，石柱子上支撑着三十三根木梁。大经堂顶部正中开一方形天井，通天柱一貫到顶，气势雄伟。木梁和檩子之间安装着一千多个泥佛。天井

与大经堂墙壁相接的屋顶上吊挂着二十九个精致的宫灯。石柱之间的木梁下挂着手工扎花、工艺极细的三十五个其木格（装饰品）。四面墙壁的上边写有五行贴金藏文艺术字。字下挂着三尺高、二尺半宽勾画细腻反映释迦牟尼和宗喀巴传教的历史画卷，前四十幅，后十五幅。门窗的墙边上绘制着八思巴文六字真言装饰图案。大经堂的后半部是大佛殿，中间隔一壁子墙。佛殿内供奉十米多高的铜铸鎏金迈达拉大佛。佛身和头部装饰着贵重的珊瑚、乌釉、宝石、珍珠。大佛东西两旁各塑制四尊站立式的女佛像。迈达拉大佛前是供桌，供桌上摆放着铜铸的香炉、佛钟、七珍、八宝、鎏金花瓶等。佛桌前的左右两侧，各摆放着一对沥粉贴金的大佛树，树上摆放着一个佛龕，做工精巧。佛殿的东西两侧（即迈达拉佛的两侧），分上下两层楼。下层东西分别是绿度母、白度母五尺高铜铸鎏金女菩萨，凸凹起伏，很有立体感。上层各有一个佛城，城内有泥佛，木雕佛，金、银、铜、铁、锡铸的佛，面部表情有的恭顺，有的横眉怒目，千姿百态，神色各异。

大经堂后是麦积塔。塔身下部呈方形，上部呈圆锥形，中间空心。最低层开一石门。一、二层内有石雕佛释迦牟尼。三层内是喇嘛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鎏金铜佛。此塔在修建时，福胜嘎喇嘛搭成蜘蛛网形的脚手架，工匠们才顺利地完成了此塔的建筑工程。

麦积塔后是青砖五塔寺，与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结构造形相仿，艺术风格相似，因用青砖建成，故称青砖五塔寺。塔内二十一个菩萨像，还放有九尊塔，中间一铜塔，其余八尊是木雕塔。青砖五塔寺内四壁挂班禅额尔德尼传教历史画十五张。中间塑制一尊五尺高扎木样却道尔泥像。青砖

五塔寺外壁贴制二千多个释迦牟尼浮雕水泥佛。山顶建九米高石塔一座。石塔四周安放着释迦牟尼、宗喀巴、十八罗汉石雕像。

大沁庙山门共有十二间，是利用被毁的奈曼庙砖石建成。山门的正面开一大门，大门的左右各开一个圆形窗户。此山门是建筑大经堂时临时使用的念经厅。大经堂建成后，大沁庙内的法器皆收藏于此处。

离山门正南二华里处建有得博占（即佛爷喇嘛得道成仙登天堂之处）。此处建有石头的印度释迦牟尼佛一尊。石佛的前面建亭子一间。亭子底下修有两间暗室，以便在冬天保存庙内各种花草。亭子东边建有一明一暗两间的嘛呢经房。得博占的院墙平面图是南宽北窄，东西墙呈对称台阶形，墙顶建一百二十座小塔。远看得博占，佛像、石塔林立，庄严肃穆。

在得博占南一华里处，建有藏式走运庙。露天台阶上建有六米多高的迈达拉石佛。走运庙内保存有十米高、六米宽用墨汁画在黄布上的迈达拉佛像。

与大经堂东西平行的钟鼓楼，是按蒙古族习俗建筑而成，西为钟楼，东为鼓楼，共十八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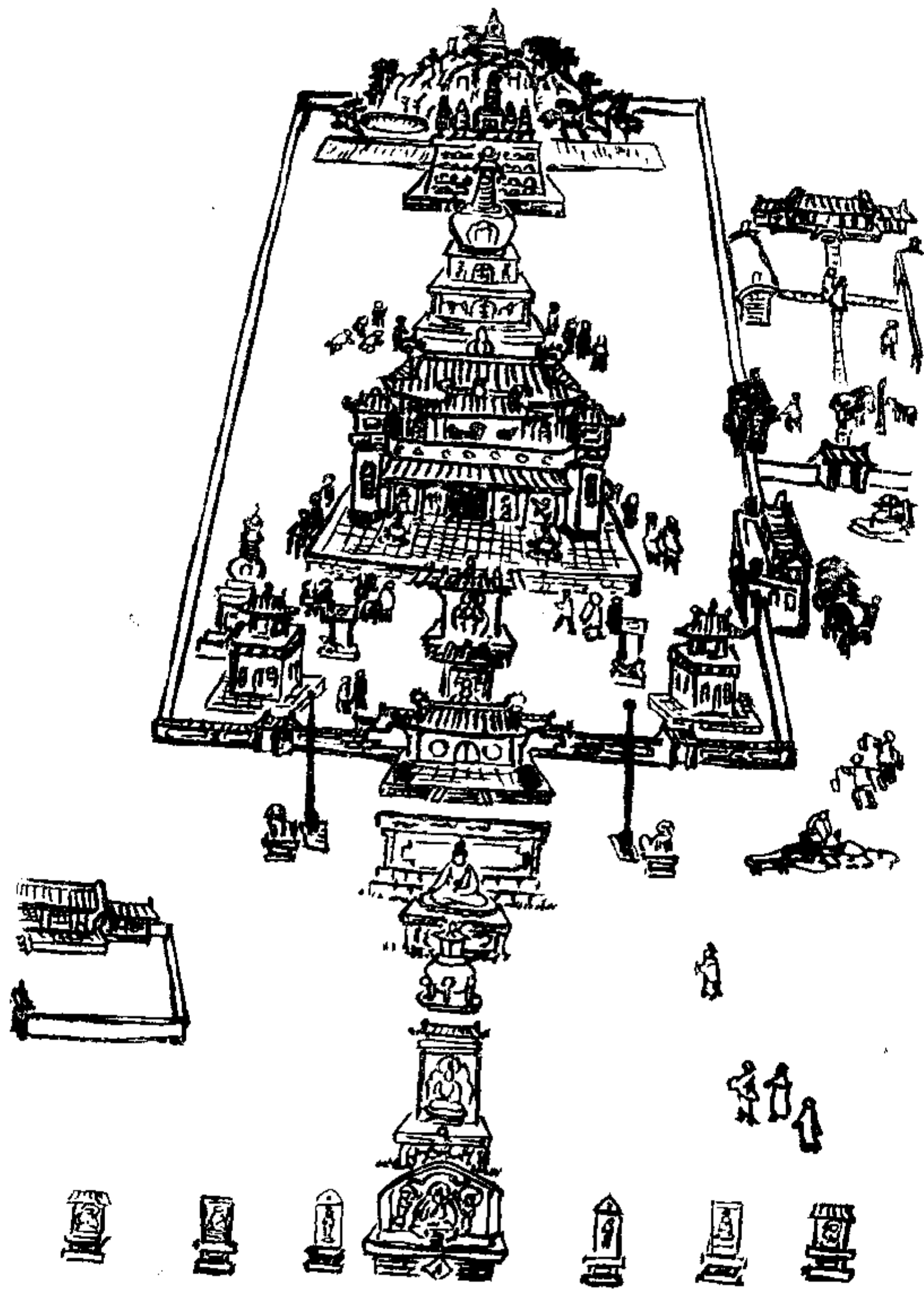
庙院的东墙下，建有二层楼式的大厨房，底面积是方形五间，房内安放大小锅六口。

综上所述，从大沁庙的设计制图、建筑施工、雕梁画栋、着色涂金以及石柱、石佛、石塔和庙内器具等，从工艺、造型的巧妙构思以及纹饰细致入微的雕琢和刻画，无不反映出蒙古民族在创造自己文化艺术的过程中，对我国历代汉、藏、回、满等其他民族的艺术格调善于兼收并蓄的特长，充分发挥了本民族固有的聪明才智。在建筑的规模和形

式方面，可以看出大沁庙是清代喇嘛教在奈曼旗传播的一个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奈曼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附：

大沁庙俯瞰图——宝石柱绘制



大沁庙及其他庙宇概述

希儒博 吴宝林

奈曼二十四庙

据历史记载，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喇嘛教^①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带，其影响不断扩大。到明末清初，包括今喀尔喀在内的广大蒙古地区开始兴建喇嘛庙，相继流传三百余年。

奈曼旗何时有了喇嘛传教，又何时何地兴建第一个喇嘛庙，尚无文字记载。据传，奈曼旗最早建的喇嘛庙是德勒特如特庙（亦叫奈曼庙）。该庙始建于奈曼旗西南方，因庙得名，其村名也叫奈曼庙。现属土城子乡哈日干图村。作为奈曼旗的第一座庙宇，奈曼庙享受着极高的声誉；以后凡是在奈曼地区建庙，其奠基所用砖石必须是奈曼庙内的。据说，只有这样，新建的庙宇才能吉祥如意，千秋永固。康熙年间奈曼庙移址于今沙日浩来苏木半拉庙嘎查。从这时起到中华民国年间，奈曼旗共建喇嘛庙二十四座。其中葫芦苏台、舍唐、回恩这三座庙之所在地，在解放后调整行政区域时，划入库伦旗境内；其余二十一座庙之原址皆在我旗境内。

据有关资料记载，经考究，现将奈曼旗二十四座庙宇情况概述如下：

太宗庙，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四月。庙址在白音塔拉村色沁化（现苇连苏乡）。庙属户数三十一，僧数三十一人；

绰尔吉庙，法名光法寺，亦叫“喇嘛庙”。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一月。庙址在沙日浩来村喇嘛塔拉（现太山木尖苏木）。庙主号“查干葛根”，庙内供释迦牟尼塑像。庙属户数七十八，僧数一百五十一人；

曼楚庙，法名法祿寺，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庙址在八仙筒村曼楚塔拉（现平安地乡）。庙主号“胡图克图葛根”，庙内供“三官佛”塑像。庙属户数四十三，僧数九十九人；

和硕庙，法名经缘寺，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和硕庙辖盖根庙、衙门庙、哈他海庙和乌力吉庙，由王府直接管理，又是旗王爷下来处理民事纠纷、裁决各类官司的地方。庙的活佛封号是“道格新席力图葛根”，史料记载的就有阿旺毛拉木、官其嘎沙他日布、业喜宁布和仁钦宁布四世葛根。庙址在扎苏台村包替音塔拉（现章古台苏木）。庙属户数九十，僧数二百二十二；

章古台庙，法名寿经寺，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庙址在沙日浩来村的章古台（现沙日浩来苏木）。庙内供奉如来佛（释迦牟尼）塑像。庙属户数十六，僧数三十七人；

博尔梯庙，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八月。庙址在八仙筒村博尔梯（现属明仁苏木）。庙属户数一百零三，僧数三百零九人；

哈他海庙，法名靖安寺，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庙址在八仙筒村哈他海西荒（现属衙门营子苏木）。庙内供奉宗喀巴佛五尺铜像。庙属户数五十三，僧数一百四十五人；

大沁庙，法名寿宁寺，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三

月。为旗扎萨克所建。庙内供奉美岱尔佛（如来佛）一丈五尺鎏金铜像。该庙活佛封号为“扎尔札克音葛根”，转生②六世。庙址在沙日浩来村亚日乃蒿（现属太山木头苏木）。庙属户数六十九，僧数一百七十四人；

回思庙，法名福济寺。由达喇嘛图古苏建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庙内供奉释迦牟尼铜像。庙址在扎苏台村回思他拉（现属库伦旗芒罕苏木）。庙属户数十九，僧数六十九人。

包日胡硕庙，法名安乐寺。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月。旗扎萨克苏珠克图巴图尔之兄长曾是该庙的活佛，人称之为“大爷葛根”。庙内供奉如来佛铜像。舍唐庙、葫芦苏台庙、回思庙、博尔梯庙均由该庙管辖。庙址在浩沁苏木村包日胡硕甸子（现属治安镇）。庙属户数一百零三，僧数三百零五人；

图萨拉嘎齐庙，奈曼旗第十任扎萨克阿旺都瓦底扎布时期的助理——图萨拉嘎齐于道光二年（1882年）三月所建。庙内供奉释迦牟尼塑像。庙址在白音塔拉村道力毛都（现属白音塔拉苏木）。庙属户数十五，僧数五十三人；

新庙，法名成善寺，亦叫“赛罕庙”，归曼楚庙所辖。达喇嘛那木巴拉于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所建。庙内供奉千手千眼佛。庙址在白音塔拉包门德勒苏（现属巴嘎波日合苏木）。庙属户数十六，僧数五十五人；

舍唐庙，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八月。庙内供奉释迦牟尼铜像。庙址在扎苏台村舍唐甸子（现属库伦旗芒罕苏木）。庙属户数二十九，僧数八十三人；

葫芦苏台庙，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庙内供奉如来佛塑像。庙址在扎苏台村的葫芦苏台（现属库伦旗芒罕

苏木)。庙属户数十四，僧数十四人；

孟根庙，法名功成寺。旗扎萨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庙内供奉释迦牟尼塑像。此庙为祭奠旗王爷坟陵之家庙，归胡硕庙管辖。庙址在王府村塔尔根泡子（现属先锋乡）。庙属户数二十八，僧数六十人；

癩喇嘛庙，法名法诚寺，亦叫“敖来哈日盖拉庙”，由旗民公建。庙内供奉关圣大帝塑像。此庙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庙址在大歹村敖来哈日盖拉（现属朝古台苏木）庙属户数四十九，僧数一百人；

乌力吉庙，亦叫“乌力吉忙石庙”。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由旗民公建。庙内供奉释迦牟尼塑像，此庙与“衙门庙”为一个会，念同一经文。庙址在八仙筒村忙石他拉（现属衙门营子苏木）。庙属户数十五，僧数六十四人；

塔子庙，法名尚经寺，亦叫“索布日根苏莫”。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由旗民公建。庙内供奉千手千眼佛。庙址在大歹村（现属新镇乡）。庙属户数二十六，僧数四十八人；

衙门庙，法名寿开寺，建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由旗民公建。庙内供奉玛哈嘎拉佛铜像。庙址在沙日浩来村的喇嘛哈拉（现属太山木头苏木）。庙属户数为九，僧数二十五人；

杜贵庙，中乃那木吉拉建于大同元年（1932年）四月。庙内供奉“二爷太恩”肖像。该庙还祭祀呼和格尔音王（即第六任旗扎萨克却经）及其夫人的陵墓。它和癩喇嘛庙是一个会，念一个经。庙址在大歹村杜贵甸子（现属朝古台苏木）。庙属户数十八，僧数五十人；

固日班宝力皋庙、舍力虎庙、白音塔拉庙，其庙址分别在今新镇乡、太和乡、白音塔拉苏木，详情待考。

因凡喇嘛庙皆遵循嘛喇教的宗旨和一系列法规戒律，故其组织形式、行政职权、经济来源以及各种庙会和仪式等基本上大同小异、相差无几。这里仅以大沁庙为例作一简要介绍，从中可对嘛喇庙窥其一斑。

大沁庙的来历

相传十八世纪初，我旗很少有庙宇和嘛喇。有一天，一个名叫优格岱的僧人，自称是“西召嘛喇”云游到今章古台苏木伊和大沁（过去亦叫五爷大沁）嘎查定居。然后就开始四处游说，鼓吹嘛喇教学说。此事被当时任奈曼旗扎萨克郡王班第得知后，就下令为这个嘛喇修了一座三间庙房安身，以便专心传教。同时准许蒙古族青少年出家为僧，到该庙习修藏文佛典。从此，先后竟有三十余人成为优格岱嘛喇的忠实徒弟。

后来，优格岱嘛喇去世，其门徒嘎巴奇嘛喇从西藏来到这里，继承了师付的衣钵，继续传授嘛喇教经典。当时，因这座庙所在地叫“大沁”，故取名为“大沁庙”。

大沁庙葛根

葛根亦叫活佛。是嘛喇中学识较深并拥有最高职权的统治者。大沁庙葛根转生六世。

随着嘛喇教在本地影响益深，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第六任奈曼旗扎萨克郡王却经，与旗内王公台吉联名奏请朝廷，要求把转生于西藏的佛祖化身——图布丹嘛喇请到大沁庙，立为博克达因扎尔礼克音葛根，世世崇拜。

康熙帝准奏后，却经先把图布丹请至北京的奈曼王府第供奉。与此同时，在大沁庙原址（今伊和大沁嘎查东边榆树

林处)新建了砖木结构的庙殿。随后择选黄道吉日把图布丹喇嘛请到大沁庙,正式立为大沁庙第一世葛根。称号为“扎尔礼克音葛根”。这位葛根在其四十四岁上圆寂。

扎尔礼克音葛根二世虽已转生于西藏,但尚未请到大沁庙前就夭折,年十一岁,名叫海日布多尔济。从此大沁庙葛根的继承人便间断了一个时期。

奈曼旗第八任扎萨克郡王拉旺喇布丹在其任职期间,亲自选中了王府(当时王府设于太山木头苏木巴彦敖包嘎查)以东约二里处叫亚日奈嵩的一片“向阳宝地”修建了庙殿和僧房,工程竣工后就将大沁庙迁移到新址。虽然庙址变迁,但仍继续沿用“大沁庙”之称,此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三月。

第三世葛根,正逢此时转生于本旗郡王族一个叫品布的台吉长家里。三世葛根十一岁入庙,其名叫业喜巴拉仓。

翌年,清乾隆皇帝御笔题词“寿宁寺”的匾额赐于大沁庙,蒙语意为“乌力吉呼尔特奇苏莫。”并赐该庙活佛为“呼图克图葛根”之最高封号,喇嘛也都获得了度牒与奖赏,甚受关怀。

到第九任旗扎萨克巴拉楚克时期,大沁庙已发展到拥有三百名喇嘛的大庙。当时,因殿堂僧房日显不足,巴拉楚克郡王即奏请朝廷,要求扩建。朝廷批准后,遂从北京请来各种工匠进行兴建。扩建后的大沁庙,正殿为八十一间。这项工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竣工。

大沁庙第三世葛根业喜巴拉仓是在其四十九岁时去世的。

第四世扎尔礼克音葛根乃是“驸马王”德木楚克扎布时期请到庙里的。此人名叫洛来尼玛。五十六岁时去世。

第五世葛根那时业已转生。但未等确立之前，其父母把他用狼肉汤洗浴，愿他日后成为著名的摔跤手。所以就以“触犯教规，玷污了活佛神灵”为由，取消了他活佛继承人的资格。

后来，这第五世活佛出在今太山木头苏木毛浩尔嘎查一个名叫图木热的穷人家，名叫敖斯尔，但又以“贫寒家境，焉生活佛”为由不予承认。敖斯尔一直在家务业，几经周折，在他三十几岁时才被请到庙里立为葛根。此人后来视力衰退，五十四岁上去世了。

第六世活佛，也就是末代扎尔礼克音葛根转生于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一带），名叫扎木样却道尔。奈曼旗第十三任扎萨克玛什巴图尔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将其请到大沁庙为葛根。进庙时六世活佛才十一岁，一直主持大沁庙五十余载，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去世。年六十八岁。此人在任期间，曾去过印度、西藏等地。相传，他自大连乘轮船抵印度加尔各答，后进藏学习经文佛典及庙宇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等专业知识，第十八个年头才回到奈曼。民国初年，重建大沁庙发挥了惊人的才华。

至此，自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起，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止，先后有六世扎尔礼克音葛根主持大沁庙二百四十余年。

组织机构与庙会活动

大沁庙是奈曼王之家庙。所以该庙的扎尔礼克音葛根不但主持本寺，而且还管理着旗内所有喇嘛庙的大事。如聘请葛根或呼毕烈罕、喇嘛评职晋级、举办大型庙会活动等无不请示大沁庙葛根批准。在宗教方面，他的权利是至高无上

的。

葛根以下的高级喇嘛，有管理行政事物的“达喇嘛”和管理奉经事物的“奈丹喇嘛”。达喇嘛的助手依次有“德木齐”和“格斯贵”。奈丹喇嘛的助手依次有“翁斯达”和“嘎日巴”。还有“尚斯达”，是葛根的主要辅佐者，同时独揽葛根仓的一切事务，其地位也不下于达喇嘛。

下级喇嘛中有管理佛殿事物的“盖尼尔”，庙仓保管员“尼日巴”，用米面塑制各种神鬼像的“朝伊格”，做文书工作的“笔切齐”以及吹鼓手“希热齐”等等很多专职喇嘛。再就是普通喇嘛了，他们一般是各负其责，逐级管理。这里不一一介绍。

此外，庙中尚有二名特殊身份的喇嘛。其一为“丹曼确精”，另一个为“博克达音古日图木”，简称“古日图木”。他们本来为普通喇嘛，如果一旦“逢缘显神通”，则与葛根平起平坐了。诵经念咒、封官许愿或“驱鬼逐魔”、发号施令如此等等，同样受到崇拜者们的磕头礼拜和祈祷。中华民国初年时，大沁庙的丹曼确精名叫僧格嘎日布，古日图木的喇嘛名叫敖斯来，他们都在每月初二、十六两天诵经“显灵”，前去祷告者也络绎不绝。

还有一点也应提到：在日伪时期，伪满政府于康德七年发布“整顿喇嘛教法案”，直接派出日本喇嘛进驻较大寺庙，通过宗教信仰对蒙古族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当时大沁庙是拥有二百多名喇嘛的较大寺庙，又是奈曼王室家庙，日本人当然是不能放过的。一九四〇年，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日本喇嘛进驻了大沁庙。驻寺一年之后，据说服役期满而回国了。后来又来了一名拉哈日姆学位的中年日本喇嘛，但只住了一宿就走了。是路过还是负有其他使命就不得而知了。此后

大沁庙再没有来过日本喇嘛。

至于庙规和喇嘛戒律是相当严格的。起居、诵经、就餐等均有信号，统一行动；平素喇嘛们不得乱串、嬉闹；普通喇嘛遇到高级喇嘛时要立于一旁，低头让过才可走开；严禁淫欲饮酒和结婚，更不准女性留宿庙内。特别是庙内有“格楞”喇嘛组织，要求加入者必须忠实虔诚、经文水平较高、自觉遵守庙规戒律者，年满二十岁时方能被接受。该组织的戒律更严。如：不吸烟、不喝酒、不骂人、不打人、不杀生、不欺骗、不偷盗、不赌博、不淫欲、不诬罔，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等等纷繁复杂的清规戒律。据说，竟有二百五十三条之多，可谓严密至极。

喇嘛中比较大型活动就是“诵经会”了。诵经会亦叫庙会，是庙里每月一次的例行活动。其主要形式是合诵佛经和跳“查玛”。大沁庙的活动有：正月初四至十二为优热力会；二月为美岱尔会；三月为东哈拉会；四月为米格森会；五月为桑济德会；六月为亚日奈会；七月为祭水会；八月为美岱尔会；九月为优热力会；十月为米格森会；十一月为尼日德格会；十二月为年关会。自从一九一二年大沁庙出现了丹曼确精和博克达音吉日图木之后，每逢初二、十六两天为二位显灵下神的日子。另外，每年都有几次“查玛”。正月十五和六月十五跳弥勒佛查玛；五月二十五跳朝德华拉姆查玛；八月十五为十大赫灵图查玛。“查玛”就是喇嘛们戴着神、龙、鸟、兽各种假面具扮成各种神龙角色跳舞诵经，意在驱魔逐鬼，保佑百姓。因为查玛带有表演艺术，所以每逢跳查玛时，有求神拜佛者，祷告许愿者以及买卖交易者比比皆是。农工士商，男女老少，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庙会观看查玛，确实热

闻非凡。

大沁庙的经济来源

大沁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收入。

一、庙属农场收入。大沁庙所属农场上地面积为二百四十亩，分摊给八十户农民种植。地铺设在黄花筒、哈特海荒（今衙门营子苏木）、乌龙台、图吉日格等地。公开名义为六爷庙仓地铺。每年上缴庙仓一千多石粮食，此外还有数百头牲畜。

二、旗扎萨克利用职权以修建维护庙宇为由，从全旗各地征收钱粮及牲畜，做为庙仓收入。

三、每逢举行庙会，求神拜佛者都要奉献牛羊或粮食等，同时，请喇嘛诵经治病除灾者，都给喇嘛以报酬。富者多奉献，穷者也要适当奉献。这也是一项很可观的收入。

四、喇嘛们在其领地内“讨巴达尔”（化缘）。这项活动虽说是零打碎敲，但天长日久也能积少成多。其他各庙的经济来源也不外乎上述几个方面。

重建大沁庙

大沁庙扩建工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竣工，当时已初具规模。

过了七十余年，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大沁庙被金丹道教徒（亦叫“学好队”）烧毁，财产被抢劫一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以后的十几年，大沁庙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之中。

正在这时，大沁庙末代活佛——扎木样却道尔已完成赴西藏学习的任务，第十二年上回到了大沁庙。他不但精通佛经，而且是个颇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师。他决定重建大沁庙。

遂亲自动手设计图纸，制做模型，组织喇嘛工匠及广大村民开始重建，首先设计建造的是大沁庙塔。

大沁庙塔始建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竣工。塔高七丈五尺（25米），方圆几十里都可以看到。塔身共四层，楼房式建筑，砖木结构，基础全是条石。每层都有名称。基层叫“韶都”，塑有杰喇嘛佛像；第二层叫“巴日古尔”，有七十五尊玛哈嘎喇嘛佛像；顶层叫“本巴”，有东哈尔佛像，内部是螺旋型阶梯。大塔的法名叫“巴拉丹毕日帮”。

建造大沁庙塔的著名工匠有：木匠，希日布喇嘛、衮楚克毛伦诺木、敖其尔扎布、扎木萨；石铁匠，希日布喇嘛；画匠，王殿儒；架子工，福兴嘎。

大沁庙塔建成十年后，一九二二年才开始修建庙殿。正殿一座，周围副庙八座。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全部建成。其中正殿长（南北走向）七丈，宽（东西走向）五丈。八个副庙，距离不等地座落在正殿周围。其中有德瓦古庙、玛恩庙、葛喇丹庙、门楼庙、钟楼庙（二座）、乌塔寺和膳食房等。

建庙所用木料伐自翁牛特旗，石头也是从外地运来的，砖瓦则是在附近烧制，现太山木头苏木窑营子就是由此得名。按照佛典规定，砖瓦皆由喇嘛们搬运，只许人背，不许用车运，而且在施工时每人每天只准砌三块砖，不许超过。所以，施工期之长便可想而知了。

那时，筑庙殿的主要负责人有：总工程师，扎木样却道尔葛根；砖瓦总管，阿力布其嘎达喇嘛；制砖工匠，桑布扎布；木匠工头，卓日克图喇嘛；瓦匠工头，业喜浩日老喇嘛；铁匠工头，业喜浩日老喇嘛；画匠工头，宝石柱。

建庙一切费用由六爷庙仓支付。六爷即奈曼旗等十四任

扎萨克苏珠克图巴图尔之六弟，当时为大沁庙葛根。按现在叫法，他就是庙仓“总经理”。

大沁庙共有一百五十余间庙殿。除正殿八十一间外，有六个仓。葛根仓——大沁庙扎尔礼克音葛根之殿，也是百姓磕头、告状、打官司的地方；丁合尔仓——磕头拜佛的地方；丹曼仓——丹曼确精下神的地方；博克达因仓——是博克达因古日图木下神的地方；庙仓——舍膳之地；六爷仓——六爷葛根住处，也是管理庙属农场等经济事物的地方。

除上述庙殿外，还有供喇嘛们住宿的僧房二百余间（土房）。整个庙内有各种佛像上千尊，较大的雕塑像也有三、五十尊。其中一尊镀金铜雕的美岱尔佛像，有五米高，并附有银碗、铜碗各八个。这尊佛像据说是花费一万多块大洋从北京运进来的。

此外，这个庙收藏为数甚多的藏文经卷。其中有佛典名著《甘珠尔》经，共一百零八卷；《松迪苏达尔》经二卷等等。

大沁庙的结局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饱尝了封建迷信之蒙骗和王公贵族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获得了新生。

遗憾的是当时当地的人民群众并不了解这座古建筑物的艺术价值，他们以最朴素的阶级感情高喊着：“砸碎封建枷锁”、“破除宗教迷信”的口号，在处理庙宇问题上采取了“驱僧毁庙、平分庙产”的过头行动。虽然喇嘛们大都还俗成家，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寺庙却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全旗各庙皆无一幸免。

大沁庙毁于丁亥年（1947年）。当时仅三天时间，人们就

砸碎了石雕泥塑的各种神像，火烧了大塔和各类经卷，整个庙殿被毁，庙属土地、牲畜及财产被分到各村各户，一座凝结着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建筑物竟变成了残垣断壁、零砖碎瓦的一片废墟。

时过境迁，世事沧桑。今天，此处已是一马平川的大甸子，大沁庙这座别具一格的古建筑在这片土地上已无迹可寻了。

文中注释：

①喇嘛教亦叫黄教，是佛教的一支，源于西藏。“喇嘛”是藏语“帕喇嘛”的简称，意即佛法渊博的“上师”。喇嘛教初创时派系庞杂，有宁玛、葛当、萨迦、葛举等。十五世纪初，西藏僧人宗喀巴在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创建了格鲁派，又称“黄教”。内蒙古地区的喇嘛皆属黄教。

②即佛爷喇嘛，通常叫“葛根”。他是由西召（青藏一带）达赖喇嘛或班禅博克达选定。一般是在前世葛根死后，由庙中达喇嘛到西召请示转生喇嘛的出生方位和时间，然后把这个方位的婴幼儿登记造册，并注明其父母身世，送到西藏，由达赖或班禅选定一名打上印鉴，那么这个孩子便是转生的活佛了。但后来也用其他方法选定。如哪个孩子能说准前世葛根的法器，袈裟及生活用品等遗物者为转生葛根了。或者由扎萨克出面召集本旗王公贵族代表以及庙中主事喇嘛，共同协商认定某某为转生葛根即可确立。

癩喇嘛庙与杜贵庙

博彦图

癩喇嘛庙

癩喇嘛庙原址在衙门营子村（即现在的青龙山镇）。何时始建不详。

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当时任奈曼旗扎萨克的玛什巴图尔，将这座庙移建到现在的朝古台苏木查布干钦塔拉嘎查。该地的东北处有一座较大的高包，上面长满了杏树，因此这一带的蒙古人就叫这座庙为“敖来哈日盖拉苏莫”（汉文意为杏树梁庙）。敖来哈日盖拉苏莫的主持喇嘛，据说是奈曼王爷的儿子，脚有残疾、行走不便，因此，人们就将该庙称之为“癩喇嘛庙”。

癩喇嘛庙建成后，光绪皇帝曾亲笔题“法诚寺”的匾额，蒙语即“沙新依乌黑莫勒克齐苏莫”，藏语称谓“丹毕熟登灵”。这三种文字的匾额均悬挂在正殿门上方。清帝又赐该庙一百个度牒①。庙中主要法器、设施等大部分是由“北京达喇嘛”供给的。北京达喇嘛，其名叫乌力吉巴雅尔，曾是皇帝的沐浴喇嘛②。皇帝很赏识他，任命他为“御前翁斯达”，管理雍和宫事宜。乌力吉巴雅尔与奈曼旗的王爷交情很深，为癩喇嘛庙赠送了精制的大钹十对，高级法衣二十件，大鼓、精制地毯以及庙殿的其他装饰品和多种比较名贵的物品。

癩喇嘛庙有一个重要施主叫赛音格日勒，无儿无女。家

住朝古台苏木瓦房嘎查。因为他的房舍都是砖瓦结构，“瓦房”嘎查也就以此而得名。赛音格日勒既是喇嘛教的忠实信徒，又是家置万贯的台吉诺彦，有牛一千多头，新镇乡的泊勒策尔村就是他家的牧场。朝古台苏木扎兰井子嘎查是他饮牲畜的水井所在地，这两处都是由此而得名，流传至今。这个富户为喇嘛庙提供为数不少的费用，当然，这仅是该庙经济来源的一个方面而已。

喇嘛庙历经五十余年，于一九四七年“铲庙”时被拆毁。

杜贵庙

历史上，杜贵庙曾先后三次修建，庙地在朝古台苏木杜贵嘎查。开始建庙时，这个地方叫杜贵塔拉（汉文意为圆形甸子），杜贵庙也因此而得名。

杜贵庙前两次修建时间不详。首建庙地在杜贵嘎查以西的大沙坨子西边。第二次改建在村南。最后一次修建是在伪满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年），庙址在现在的杜贵供销社后面，遗迹仍清晰可见。

杜贵庙是在一九四七年秋末铲掉的，庙的正殿被保留，一九六三年被杜贵河洪水冲毁。

据传，杜贵庙的始建人是旗王爷的二兄弟。当时人们皆称他“二爷”，不知其姓名。有一次，二爷见到一个“犯人”被绑在马桩上活活冻死的惨状很是可怜，他说当王爷纯属造孽，因此，就再也不愿当什么王公贵族了，遂打点行装扔下妻室儿女离家出走，徒步进西藏学习佛典。在那里他学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佛经创作。他所创作的藏文经书《查纳力勒》至今还流传在青藏地区。

二爷在从西藏回奈曼的归途中，又在山西五台山留住几

年才回到奈曼。回来后，开始建杜贵庙，但始建的规模不大。

杜贵庙建成后，二爷就当为首任住持。所以人们叫他为“二爷太恩”，意思是“二爷僧”。后来，他的妻子得知他在杜贵庙，便前来相会。僧俗焉能复婚？为了避嫌，二爷太恩不得不连夜出走，一直下落不明。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太恩”，又重建了杜贵庙，将“太恩”的塑像立在杜贵庙中予以供奉。后来又把“呼和浩特王”即奈曼旗第六任扎萨克郡王却经及其夫人（据说是康熙帝的公主）的陵坟起移到杜贵庙后边。此坟现已被流沙埋没。

第二次修建杜贵庙是遵照大沁庙扎尔礼克音葛根之命，由五爷大沁（现章古台苏木伊和大沁）阿哥诺彦所建。“五爷”乃指毛依罕的牧场土井所在地，所以叫“五爷大沁”。毛依罕和二爷太恩是亲兄弟，阿哥诺彦是他们的后裔。其家族曾两次修建杜贵庙。阿哥诺彦承袭祖制，第三次修建杜贵庙，竣工于一九三二年春。

杜贵庙有五十余名喇嘛，其中获得“度牒”者仅二十四人，所以，每逢大型庙会时，就从其他庙里聘请一部分喇嘛来庙进行诵经会。这个庙的“古口图木”喇嘛，现仍健在，住固日班花苏木图木套斯嘎查。

注释：

①度牒：中国封建时代度僧（即准许出家）归政府掌握，经审查合格得度后，政府所发给的证明文件，称为“度牒”。有度牒可免除赋税、劳役。

②沐浴喇嘛：主持以喇嘛教仪式洗漱的执行喇嘛。

吉祥寺

王家驥

在奈曼旗义隆永乡小东沟村的西梁岗上，有一片颓垣断壁、野草丛生、狐兔出没的荒丘，这便是过去名噪一时的吉祥寺。

清朝乾隆六年迁民戍边，一大批农民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诸省，迁至奈曼旗境内的波力束塔拉（下洼，现属敖汉旗管辖）。那时，这地方是个大泡子，迁来的人家便环水而居，住在四周的梁岗上。其中，东北角地势较低，有个村落叫小东沟。后来住户增多，人们便商议建庙，以图保佑地方兴旺发达。于是公推村中颇孚众望的居民庞德聚资监修，在村北的梁岗上修建了三间砖瓦结构的娘娘庙。供奉三霄娘娘（云霄、琼霄、碧霄）的塑像，未设僧道。每月初一、十五百姓群聚，烧香祭祀。平时庙门紧锁；丰收年景，搭台唱戏。赶庙的，作买卖的，开馆子的，行行都有，车水马龙，人烟茵聚，出现了一年一度盛极一时的娘娘庙会。

有一年四月十八日庙会，唱三国水淹庞德的故事戏，时遇天气骤变，乌云笼罩，大雨瓢泼，水势很大，由西南直奔东北。小东沟地势低洼，雨水全聚在庙前的平地上。戏台倒塌，檩木炕席、家俱什物、日用百货、药杂果品随水飘荡，士农工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事件发生后，人们认为这是大不吉利，失去了赶庙会、唱大戏的兴趣。庙宇便逐渐荒凉冷落，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了。

时隔多年，大城子（现在的凌源县）城东二十多里的牛耳河梁，有座关帝庙，住持戒纳僧法名月林，有徒弟数人，但无庙产，靠化缘讨斋度日。月林朝山拜岭，云游四方。有一天走到小东沟，见有三间破娘娘庙，地方开阔，周围村屯也比较富庶，便有重建庙宇之意。于是月林四处游说，化缘聚资，在当地名门望族的帮助下，将旧庙挪到西梁岗上，重修了三间庙宇，将云霄娘娘神像挪到新殿，并在两旁供塑了子孙娘娘和痘疹娘娘。又新建了三间东厢偏殿，供奉风神、雨神、雪公、电母、量天尺等诸神。月林僧不回牛耳河梁庙，留在这里当了方丈。

月林僧极善理财，数年间庙产大增。又收了两个徒弟，大弟子法名通典，二弟子法名通惠。通典亦善经管，师徒三人以农耕为主，招榜青三十余人。几年后，又增修了关帝庙三间，正中塑关帝像，两侧塑王甫、赵累、关平、周仓的站像，并建钟、鼓二楼，东钟西鼓，每日晨钟暮鼓，响彻四方。对着正殿是三间山门，中间是人行道，东间塑黄骠马，西间塑赤兔马，都塑有马童牵引。后来传说每年夏季，有黄赤二马吃庙前地里的谷子，有人早上看地赶马，跑进山门内的马殿，看见泥马口里含有谷草。于是在马殿里又增设了栏杆，说是防止神马糟蹋庄稼。庙殿的东边是园子和场院，西边是师徒居住的禅堂。整个大院修上围墙，东西两院又建了二个大门楼，平时正面庙门关闭，由东西两门来往出入。

月林僧交游甚广，与当地人家多有往来，在百姓中颇有声望。庙产富足，每年唱戏庆贺，很是兴旺。月林僧将娘娘庙改为吉祥寺。

月林死后，通典当了住持僧。因为寺院富足，很多人愿

意出家，住持通典便收了很多徒弟。其中良莠不齐，许多人不守清规，闹得通典无法可使。几年后通典和通惠便相继去世，剩下的僧人靠庙产维持生活。数传到法名悟聪的僧人时，因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将庙产败尽花光，最后悟聪喝酒喝死了。他的徒弟墨守清规，软弱无能，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吉祥寺又开始破落。

这时从山东来了个戒纳僧人，法名晓春，被地方豪门富户看中，留他当了吉祥寺的住持。晓春社会经验丰富，广交地方的粮绅大户和名门望族，在他们的支持下，吉祥寺又有了起色。晓春招了大徒弟法名普灵，二徒弟法名普印，过几年又招了两个小徒，法名普从、普海。这时牛耳河梁庙的住持晓祥也经常来往。两庙一家，都是月林老僧创建的。晓祥老而无徒，要普印普从去经营寺事，晓春应允，二人便被晓祥僧领去了。时隔不久，晓春山东俗家的侄儿小董兽医来了，长住在庙内。以后庙东营子发生了一起不名誉事件，小董也失踪了。不多日子，在叫来河里发现了被杀的小董尸体，并牵涉到寺内的普灵。普灵闻风逃跑，不知去向。吉祥寺一时声名狼籍。

地方人见吉祥寺又要破落，一些有名望的人便起来组织庙会，公推崔海为会首，并帮助料理寺事。吉祥寺又开始繁华，庙会一年比一年兴盛。每年唱戏开山，庙内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庙外京戏高唱，锣鼓喧天。周围商埠的富商巨贾都来赶庙，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赶会的男公女妇，烧香的，看戏的，耍钱卖艺的，人山人海，你推我拥，很是红火。庙会借机出租房屋和地产，寺院收香火钱，都很可观。后经会首崔海提议，将东面的风神殿改为飞房，西面增修祖师庙三间，中塑观音菩萨像，两旁塑老君和孔子像，前

设木牌写上祖师名位。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祭祀日期，到时各祭各的祖师，不仅添增了庙会的壮观景象，而且也增加了庙会的收入。为了省去每年搭台唱戏的麻烦，又在山门南面修了一座美观漂亮的戏楼。中挂“高唱入云”的大匾，上下场门挂“出将入相”小匾。正面的对联是：“文武生净似见梨园子弟，管弦幽雅如闻蓬岛楼台”，两边的对联是：“戈戟森严确是将军武烈，衣冠华彩居然学士风流”。这是吉祥寺的鼎盛时期。不久，外逃的普灵在北京柏林寺受戒归来，成了戒纳僧，事事争权。晓春看到他骄横放肆，便从牛耳河梁庙将普印要回来经管寺事。没几年晓春去世，普灵和普印诸事不和，庙会的人也很不喜欢普灵，遂将普灵驱逐出庙。寺里就剩下普印和普海，二人诵经拜神，安份度日，数年无事。普印病死后，庙会会首崔海年逾古稀，老死家中，庙会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普海经管寺事数年后也因病去世，从此吉祥寺就完全没落了。庙殿失修，神像倒塌。自一九五〇年以来，被附近农民逐渐拆毁，只剩下片片瓦砾。一度香火不绝、繁华热闹的吉祥寺便销声匿迹、成为历史陈迹了。

胡硕庙佛塔

艾迪之

胡硕庙佛塔，是奈曼旗清代喇嘛教重要建筑遗迹之一。

该塔位于章古台苏木所在地以东百余米的高地上，远距数十里可见，颇为壮观。塔前是被拆毁的胡硕庙遗迹，方圆一平方市里，布局至今依稀可辨。塔身高四丈余，底宽两丈

多，共分五阶。上两阶呈圆状，有铜顶箍，十三天、佛眼等。佛眼分东、西、南、北四向，内有四尊佛像，为首者乃喇嘛教鼻祖宗喀巴。佛眼四向还挂四个响铃，风吹铃鸣，轻风微响，疾风骤鸣。下三阶呈方型，次第积迭，构成坚固的塔基。第二阶四面刻有该塔的募捐和设计者的名单，现今已驳落不全。每阶都有若干神像浮雕，四面对应，工整美观。

该塔上圆下方，浑然一体。上圆不显轻细，而有劲秀之感；下方不觉臃肿，却含稳固之意，又在高地上座落，巍巍屹立，更显庄重大方，实可谓藏式喇嘛塔的代表作。

据考证，该塔及胡硕庙均系清朝中叶所建，至一九四九年已传七世，约二百余年。塔与庙为一组建筑，同是佛门标志，当年香火颇盛，为奈曼旗四大庙之一。土改时，胡硕庙被拆除，喇嘛走散，仅余此塔。

据传，此塔亦非原塔，乃是移址重建之物。原塔位于现塔以西三百米处，高两丈多，宽丈余。因距庙偏远，四庙喇嘛多次集议重建，均未实施。时至一九三七年，恰逢一个通晓建筑的喇嘛去五台山朝拜，途经奈曼，经大沁庙喇嘛推荐，来胡硕庙负重建监修之责。塔址选在大庙后。他奔走于东蒙古二十四旗募建塔资金。经年后完工。新建之塔与原塔在结构上毫无二致，只是高大一倍，因此更为神奇壮观。

喇嘛塔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但也反映出清代蒙古族人民建筑艺术方面的聪明才智。



胡碩廟塔

周 鈺 攝

二十七春 光照千秋

——梁东明烈士传记

张 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梁东明在刘家茶馆的突围激战中，英勇战死，鲜血洒在奈曼大地上。

光阴荏苒，转瞬四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在科尔沁草原，在奈曼一带，梁东明的名字，象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在人们心头；又象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每逢清明节，奈曼人民总要到梁东明的墓碑前祭扫、致哀，表示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也许人们要问：梁东明为什么会受到千百万群众如此的崇敬、爱戴和赞颂呢？让我们循着烈士的革命征途寻求这个答案吧……

—

一九一九年，丹桂飘香的金秋九月，梁东明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祖籍广东省顺德县平步乡。先祖为谋生计，世居广州市。父亲梁荣长，职业教员，就聘于外县的学校任教，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母亲做家务劳动。

梁东明六岁入小学读书。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广州市市立

第二十四小学毕业后，报考岭南大学附设的实验中学。当时家中有弟妹四人，东明居长，小弟五岁时患病无钱医治死去。他当时读书除了靠祖母东求西借补助一部分学费外，其余全由自己在假日里做零工挣钱来解决。岭南实验中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无力供他继续升学，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老师非常喜欢他，便介绍他在学校内作生物标本的助手工作，这样赚得一部分钱后，一九三七年他又考入知用中学高中读书。

少年时代的梁东明不仅聪明伶俐，才思过人，而且性格活跃，敢闯风浪。读小学时，由于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游戏，两次跌断手骨，以至停学医治。读初中高中时，他被政治形势的风云所卷，就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了。他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期间（即1931年至1937年），正是日寇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时，全国抗日声势风起云涌，抗日救亡运动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广州市也直接遭受到日本飞机残酷不停的轰炸。风华正茂的梁东明，满怀一腔热血，经常思念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发动、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社会宣传工作，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晚上，还经常把一伙同伴召集在祖母家里，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研究如何从事革命运动，这样常常到深夜。

那时，梁东明心里已经明确地懂得，当芦沟桥头炮声隆隆，祖国命运濒临危亡之际，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延安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燃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烽火；他更懂得，当“亡国论”、“速胜论”以及形形色色的论调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之时，是毛主席在延安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持久战》等一系列的伟大著作，犹如旭日当空，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光辉灿烂的前程。

于是，延安对梁东明产生了无比巨大的魅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如饥似渴地想往延安。“好男儿志在四方”，他默默地下定决心！

从小就树立远大革命抱负的梁东明，在家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多么渴望奔向陕北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啊！偏偏就在这个时候，1938年夏，广州市实行人口疏散，东明父母逼迫他和全家一起去香港避难。东明不依。父亲气怒，骂他是“不孝之子”，是“叛逆”。梁东明忍痛舍弃父母之爱，于七月四日下午，偷偷离开了家，离开了广州，毅然北上，投奔他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陕西延安。

八月十五日，梁东明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情调高昂，激情奔放，充分表现了梁东明崇高的革命思想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信中这样写到：

“……在你们万分盼望我落港、望不到而挂心的时候，火车已载着我走出了广东，走出了数省广阔的原野、山川，而到了中华民族祖先发祥之地，今日我们团结在一块的陕西了。……这封信，对万分焦急的二老，也许能带给一点安慰吧，但是切勿伤心啊。本来我是不想骗家的，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太爱喜我了，舍不得我离开家，舍不得我去干今日每个青年应做的事，应尽的责任。你们逼我到香港，这使我不得不这样，不通知你们就走了。我以做儿子应有的态度接受和感谢你们给我的爱，可是我不能以你们的话去做，因为我还应该接受祖国的爱，听祖国的呼唤啊！……”

什么是真正的爱？梁东明用革命的实际行动做了真正的回答。

四十年前的交通是相当落后的，不象现在这样四通八达。从广州到陕北，梁东明足足走了二十天。途中他结伴求

师，办理入学手续，不断辗转迂回，时乘火车，时坐汽车，更多的路程是徒步跋涉。二十天昼行夜宿（有时是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在七月二十三日到达陕北公学分校。

二

梁东明从祖国南方来到陕北，生活是不习惯的。当时，陕北公学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窑洞，穿粗布，吃小米。但是，他说：“这里物质条件虽然落后，但我生活得很快活。因为这里没有空闲，没有死板和苦闷……这是中国前进的优秀青年的营垒，从这里要培养出千万为祖国而奋斗的青年。”他深知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和远大的。他满怀乐观，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

陕北公学毕业后，梁东明就分配在陕西关中一带，任八路军特务连二排排长，号称“水牛”。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战功。

一九四〇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二年和刘玉春（重庆人）在延安结婚。次年得一子，名叫小红。

一九四六年春，他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决然从命，横刀立马，由延安到内蒙古大青山，而后到科尔沁草原，任中共奈曼旗委宣传部长。

梁东明个子不高，胖敦敦的，体格健壮，气宇轩昂。他善于演讲，声音宏亮，说话时好打手势。他威武又洒脱，军人和学者的气度兼备。来到奈曼后，他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老百姓说他没有“官”架子，是人民的八路军。

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他配备一名警卫员，他物色了一

位贫农的儿子陈瑞。他没有下令强求，而是耐心地动员陈瑞的母亲，要求把她的儿子交给他带领。因为陈瑞是孤儿，他母亲舍不得，梁东明就多次找到陈大娘家，往炕头上一坐，象自家人一样，实实在在，亲亲热热，不强迫，不命令，不发脾气，那和和气气的劲儿，深深地感动了陈大娘。就为这个，给人的印象特别好。

梁东明的爱人刘玉春带着四岁的小红一起从陕北来到塞外草原，协助东明共同开展革命斗争。来奈曼不久，她在大沁他拉得了一场重病。当时梁东明正在八仙筒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因工作任务繁重，未能及时脱身，他说：“我不是医生，回去也只是看看而已，这里的工作刚刚有点眉目……”梁东明不肯放下紧张的工作，但是又惦念妻子的病，自言自语地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延安时就常常闹病。”

梁东明心情矛盾，但迟迟未动身。次日告急，妻子已经躺在太平间了，他这才匆忙返回旗里。刚强的梁东明站在妻子遗体前默哀许久，心情极其伤痛，但他没掉下一滴眼泪。他对旗委的领导说：“刘玉春从关内来到塞外，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她死了，我要继续战斗！”

妻子一死，身边只有四岁的小红是唯一的亲人了。为了工作方便，梁东明把不懂事的小红交给贫农老黄看管。他东征西战，经常下乡，有时十天半月见不到孩子。他向战友开玩笑说：“工作一忙，斗争一紧，就把我那心爱的小宝贝忘到脑后了，我都不配做孩子的爸爸了。”

梁东明说的是真情话。他脑子里只装有革命工作，很少有儿女情长。在激烈的八仙筒突围战中，心爱的小红失散了，他当时心急如焚，眼里直冒金星，但马上就镇静下来，若无其事似的继续指挥作战，丝毫没有影响战斗情绪（后来

得知，是老黄用麻袋将小红背到避静的地方，躲离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为了革命事业，梁东明十八岁毅然决然远离亲人父母，投进了革命的熔炉，经过在延安的革命理论武装和七年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无疑地证明了他是刀刃上的一块好钢。如果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如果他不把党的事业当做自己的终生事业，要让他具有这种失掉亲人还能保持旺盛斗志的革命精神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

其实，梁东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祖国和人民，他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在八仙筒和刘家茶馆的两次突围战中，他表现了一个大智大勇的指挥员应有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和忘我牺牲的可贵精神。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进入奈曼，勾结拉拢地方反动武装，疯狂地破坏减租减息运动，破坏新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地处战略要地的八仙筒，是众敌围攻的主要目标。入秋以来，一场恶战就酝酿着。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一千五、六百敌军从四面八方朝八仙筒围攻，妄图将八仙筒一举扫光。我军奋起阻击。正在血战方酣的关头，总指挥员罗云彪同志饮弹身亡。他的牺牲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复仇怒火。梁东明担起了总指挥的责任。只见他一挥手，“跟我来！”二话没说，箭步跳上炮楼，端着冲锋枪，拚命朝敌人射击。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手榴弹把炮楼顶上一尺多厚的土层炸光了，檩本已快被炸断，楼墙也被炸出大窟窿，敌人的手榴弹从窟窿里投进来，梁东明毫无惧色，面对哧哧冒烟的手榴弹，拣起来，又从窟窿投向敌

人。在梁东明视死如归的风范下，战士们争抢着向炮楼外投掷欲爆未炸的手榴弹。尽管如此，情况仍然十分险恶，炮楼有失守的危险。梁东明急中生智，命令战士们从仓库里把毡子和棉大衣搬出来，浸上水堵住窟窿，顽强抗击，终于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

午后，在敌人暂时停止进攻的间隙，梁东明主持召开战地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天黑以前要坚守阵地，如果援军不到，就乘夜色突围。随后，梁东明慷慨激昂地向全体指战员作了简短的战地动员，增强了干部战士必胜的信心。这时，头脑清醒、眼光敏锐的梁东明，发现队伍中有三个人神志反常，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梁东明判断他们可能要秘密策划投敌。梁东明及时下令缴了他们的枪，并看管起来。这三个家伙，都是清洗中漏了网的混进武装队伍里的日伪警察，他们终于在战斗激烈之机逃跑投敌了。

夜晚逼近，援军未到，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突围。突围之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梁东明胸有成竹地作了战术安排：突围方位选择，既是敌人火力的薄弱处，又不利于敌人追击的青纱帐；突围时采取越墙和挖沟墙上墙下两个方案，越墙前先麻痹诱惑敌人，用木棍和枪筒顶起帽子举过墙头。当敌人集中火力向帽子射击一阵，发现上当停火时，迅速跳墙突围，借此机会在墙基挖通地道，一部分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地沟闯进墙外的青纱帐。由于梁东明绝妙高超的战术，突围时伤亡不大，等到二天清晨，全体指战员较顺利地汇集到集合点。梁东明是第一个从地沟闯出去的。谁先钻出去，谁的危险性最大。对此，战士们敬仰梁东明大智大勇的忘我牺牲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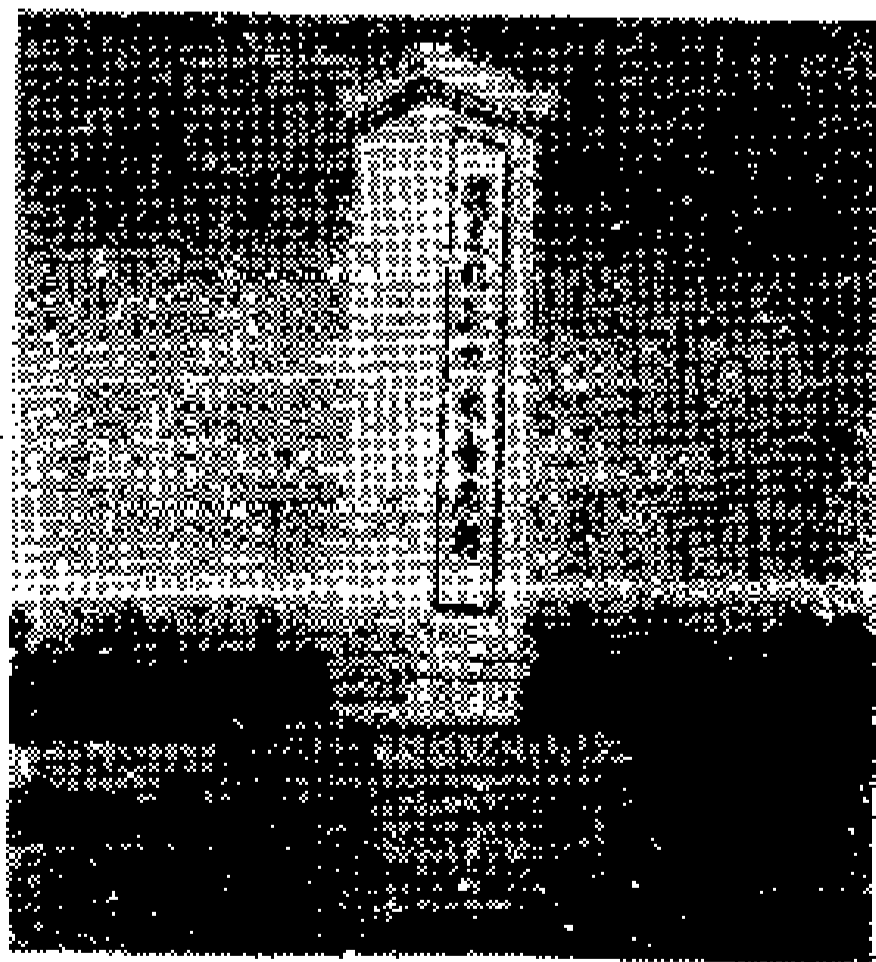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东明领着五十三名干部

战士来到刘家茶馆调集支前物资。夜里，坏人暗中去申乃甸子给大土匪头子梁洛布等通风报信。罪魁祸首梁洛布等集结了他的全部爪牙，第二天早晨，将刘家茶馆团团围住。梁东明同志还没吃早饭，就遭到这突如其来的围困。他当时果断地决定“突围！”听说东明同志要突围，老乡们很替他不甘心：“土匪太多，梁部长，你们恐怕冲不出去呀！”东明同志的回答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损失，必须突围！”

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话，不能和旗里联系，援兵不能很快赶到；因为那次土匪太多，如果坚持下去，有血染刘家茶馆的可能。所以，东明同志决定突围，打算把敌人引入沙海。这是个两全之策，他这样决定后，立刻拉起队伍奔向西门，谁料，遭到土匪两挺轻机枪的阻击，难以冲出去。于是，他又挥戈东指，从东门冲了出去。但土匪逼得很紧，东明同志为了不让队伍受损失，他单枪匹马压住后阵，顶住敌人，不顾子弹在头顶呼啸，且战且退。同志们劝他先走，他严厉地命令道：“赶快退，不要管我！”不幸，坐骑受伤，东明同志英勇地战死了。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七岁，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用热血谱写了我们民族的正气篇，光照日月，与山河共存。

编者注：

梁东明烈士的照片系由奈曼旗烈士陵园所提供。



我所知道的布和格什格

王家骅



布和格什格，汉名梁玉岚，字萃轩，奈曼旗太山木头苏木泊和乌苏人。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李殿清先生在义隆永乡大营子创办了私立初、高等小学校。李殿清当校长，聘请张锦，张光大为教员。学制是春季始业，初等四年，高等三

年。我和布和格什格同岁同班，十七岁小学毕业，十八岁考入朝阳中学，二十一岁中学毕业，二十二岁同去北平考大学。我考入了民国大学经济系，布和格什格考入私立俄文大学法专系。

那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时期。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战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了北平。由于战火连年，政府对教育无暇顾及，学校纪律松弛。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革命斗争在北平城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军阀政府一方面大打内战，一方面加紧镇压共产党的活动。俄文大学校长徐谦是共产党人，因此当局就认为这个学校是共产党的活动基地，下令查封。将该校学生全部并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布和格什格也随着进入该校。

布和格什格和我同住一室，他经常数日不归，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也不告诉我实情。他早就结识了科左后旗的蒙古族包悦卿，此人当时是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据说，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后来听说，由包悦卿联系，经蒙藏专门学校教师汪子瑞介绍，布和格什格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卜海涛。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六日，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同时还抄获了一份发展党员名册，上面有包悦卿的名字。布和格什格得知此事后便让我夜间去雍和宫向喜喇嘛借黄绸袍和紫背心各一件，将包悦卿化装成喇嘛，又让我到西直门车站买了去绥远的车票。将包悦卿秘密送走。以后，布和格什格有些事也就不背着我了。但是，因为事关秘密，我也不便多问。他仍然是上课时少，不回公寓时多。

同年十二月初，布和格什格同我商量，叫我去汉口送封信，我觉得太危险，不愿去。他说：“不用怕，没什么危险。走时给你一件学生单上衣穿上，在左肩胛下有一针长的白线，到站时有个学生模样的人接你，他的左肩胛下也有同样的白线，这是我们的人，你把信交给他就行了”。

我冒险去了汉口，按他所说的地点，下车以后到小馆吃饭，果然有个学生模样的人来到我跟前，并故意地向我露出接头的信物，我就按布和格什格的嘱咐，把信交给了他。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不要乱走，吃完饭后马上回小馆休息，夜间有北行车，马上坐车回去。我忐忑不安地熬到发车时间，匆忙乘车返回北平。

从那以后，布和格什格所收到的信件大都是写我的通信处——宣武门内太平湖民国大学，名字是卜海涛。我把信拿

回公寓交给他，他看后立即烧掉，我也不过问信的内容。

民国十五年（1926年），学校放暑假，布和格什格回家后把家中的男女家奴全部遣散。他父亲叫乌冷阿，是管旗章京，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把他抓去押在旗警防营，将家奴都找了回来。他被关押了一个星期。以后，经人说情才放出来，又返回北平继续上学。

这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绥东县在北平读书的八个人，全来到我们住的公寓，谈起了教育事业，布和格什格说：“我早就想成立一个‘蒙文学会’，奈曼、库伦两旗是一个绥东县，在北平的学生只有八人，真是落后到极点，太丢人了。从在北平的学生看，蒙古族学生七人，比汉族学生多，其实汉族的教育比蒙古族强多了。咱们组织个蒙文学会，研究蒙古语言文字，提高蒙古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蒙古民族的教育事业。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算成立”。大家都很赞同，于是蒙文学会便正式成立。第一批会员有库伦的赵连科、王世济、赵文儒，奈曼旗的布和文都苏（梁玉岗）、吉莫（陈树堂）、恩和宝老（鲍庆章）、布和格什格（梁玉岚），一共七人。我是会外帮忙。也没会址，就着热劲出了一期《乌兰巴尔苏》（《丙寅》）月刊，以后就没再集中研究有关蒙文学会的事情。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我们从学校毕业，布和格什格回到家中。十月，绥东县财政局改选局长，蒙古族推举布和格什格，汉族推选张熔。县里叫他两人到热河省财政厅听候任命。结果选中张熔为绥东县财政局长，布和格什格落选。他便从承德直接到北平，被聘为蒙藏专门学校教员。不久，也把妻子儿女接到北平，靠薪金度日，心中很郁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成立了伪满

洲同。大寶县那木海（陈封），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在伪满政府工作，很有权势。他在北平求学时和布和格什格很要好，这时便邀布和格什格回来，并推荐到兴安西省当了文教科长。布和格什格到任不久，就创立了兴安西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并兼任第一任校长。

布和格什格在兴安西省期间，仍然致力于发展蒙古文学，在省长诺勒格尔扎布的支持下，他多方集资，在开鲁北街租了房尾，购置了石印机器，重新组建了蒙文学会。那时，蒙文学会属于民办性质，会员大都是蒙古族上层人士，还有少数日本人。学会每年召开一次会员会，布和格什格用蒙、汉、日三种语言讲话。蒙文学会的宗旨一是出版书刊，二是办学，培养各种人材。学会成立后，聘请额尔敦陶克陶、赛生阿为编辑，继续出版《乌兰巴尔苏》（《丙寅》）月刊。同时聘请阅历较为丰富、精通蒙文的翁牛特旗的巴图先生，整理《一层楼》、《泣红亭》，并请奈曼人希冷阿帮助翻译新名词。会员赵连科翻译了《猫探》，还有其他人翻译的著作。又专门请来了能用毛笔书写蒙文印刷体的赛生阿先生，雇用了石印工人潘师付，开始印刷出版蒙文书籍。这时听说辽宁省北票县的尹湛纳希写了一部《清史演义》，于是派希冷阿先生去取，可是尹湛纳希已死，后人没有很好保存，结尾部分没有了，找了数次也没有找到。经过修补，终于使这部书得以问世。此书内容深邃，结构严谨，出版数量较大，每部售价二十五元，销路很大，是当时蒙文学会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

学会的收入增多以后，在开鲁西街购置了很大一所院子，遂将蒙文学会搬到新会址。同时增设了附属小学，蒙古族儿童入学的很多。奈曼王爷的大哥，包日胡硕庙活佛和他

的六弟以及大沁庙的活佛，在老哈河北岸捐给学会三顷熟地，雇用农民耕种，小学学生也抽时间到农田参加劳动，年终收入归学会和学校所有。喀喇沁旗的汪荫侯又捐了一部铅印机和蒙文铸字炉，学会雇用了蒙古族工人王师付，开始铅字印刷。这时的蒙文学会的规模已经很可观了，大约有会员五百多人，各旗都有，还有日本学者。

省长诺勒格尔扎布病故后，继任省长是扎鲁特旗的王爷旺沁丕尔，提升布和格什格为实业厅厅长。因王爷和一些喇嘛比较守旧，对蒙文学会不大支持，布和格什格的抱负不能充分施展，因而郁闷成疾，经常请病假，在家喝闷酒。我去开鲁开会经常到他家。他对我说：“我死以后，你帮我清理一下蒙文学会吧。”后来他病势加重，治疗无效，于一九四二年旧历腊月中旬病故，享年四十二岁。用汽车将灵柩运回老家泊和乌苏的祖坟地埋葬。我遵照他的遗嘱，用一年的时间将蒙文学会的土地、房屋、资金、帐目和书刊清理完毕，交给了奈曼旗的哈斯通力嘎管理，我又回到库伦旗继续教书。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布和格什格的情况。

编注：

王家驥先生，现年八十五岁，奈曼旗义隆永五家子村人，和布和格什格是同窗好友，毕业于民国大学经济系，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九四八年回乡。

布和格什格的照片系吉格木都同志提供。

驸马王——德木楚克扎布

希儒博

德木楚克扎布，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家族），系第十一任奈曼旗扎萨克郡王^①，又是清朝道光皇帝之乘龙快婿——驸马。

据史书记载，明朝末期，以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为首的满州人崛起东北，施行武力加怀柔的政策，征服了漠南^②蒙古中较强者科尔沁部，于公元1616年建国，定都盛京（今沈阳），国号为“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其子皇太极即位，很快又征服了奈曼、敖汉等部。最后于天聪九年（1635年）消灭了漠南蒙古最强者——察哈尔林丹汗部，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清”。

清朝的建立及后来巩固它对北部边疆二百多年的统治是与其施行武力加怀柔的政策分不开的。武力且不论，就怀柔方面而言，其方法之一是“联姻”、“和亲”。而清朝的和亲政策也有别于历史上汉唐诸朝。汉、唐是以单方下嫁，而清朝则是互相娶嫁。历史上清朝蒙古族“皇后”、“皇妃”就出了九人之多，而清皇室先后也有二十九位“公主”（指皇帝女儿）下嫁到蒙古部。这种通婚关系，从清朝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朝统治者，为拢络蒙古民族而把“北不断亲”作为一项国策。为此清廷特为科尔沁等十三旗定立了备指“额駙”

（即驸马）制度。就是从这些旗的王公贝勒^③嫡系子弟及公主所生子女中，挑选十五至二十岁的聪明俊秀者，带进京城，以备皇家选为公主的额驸。奈曼旗第十一任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德木楚克扎布就是在道光年间入选进京的。

德木楚克扎布是与其始祖——奈曼旗首任扎萨克郡王衮楚克并称英髦的人物。他进京以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皇帝赏戴花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任御前行走；四月，赐寿安固伦公主^④，成为固伦额驸；九月，又赏戴宝石顶柱玉眼花翎及赐穿御衣等，待遇则与贝子^⑤等同；十月，同寿安固伦公主成婚；十二月，准紫禁城内骑马（此为特殊待遇）。接着，在御前赛弓箭，连中六箭，赐赤金紫垂纒的恩赏。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月，德木楚克扎布之父，时任昭乌达盟各兵扎萨克兼奈曼旗扎萨克郡王阿旺都瓦底扎布逝世。德木楚克扎布即位，承袭了旗扎萨克职务。

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德木楚克扎布任御前大臣。此后直到他逝世历任清廷管旗都统、镇抚北部大臣、管理火器营大臣、管理中正殿奉经事务大臣、管理步魁壮丁院大臣、押马大臣、内务大臣等职务。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德木楚克扎布为朝廷献银五百两，供助军费，升位一级；次年二月，献银七千两，补助国库，升位五级；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宫城内神武门、顺正门、御华院、千秋亭等发生火灾，因救火之功升位一级；同治元年（1862年）献军服五百套，记载第三次功劳记录（第一次衮楚克、第二次为第四任旗扎萨克鄂其尔），同时升位三级；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又献战马百匹，升位一级。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德木楚克扎布逝世。皇帝赐下优渥的诏恤，同时赐陀罗经。又派贝子德木其扎布、内公楚克林沁二人下赐御茶、御酒、穿考（祭葬用的白花）等，追认亲王爵位。又赐可与固伦公主合葬〔寿安固伦公主于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薨〕。并且专拨内帑二千两为祭葬费。可见清廷对德木楚克扎布是相当器重的。

另外，在奈曼旗历代王爷统治奈曼三百余年里曾五易其王府。而现在的“奈曼王府”正是德木楚克扎布于同治二年（1863年），从叫来河北岸的五福堂移址大沁他拉所始建的第五座王府。是仿照科尔沁卓里克图王之府第设计建造的四合院住宅。但尚未落成，德木楚克扎布就已去世。后经几年，在玛什巴图尔任旗扎萨克时期才正式建成使用，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德木楚克扎布无论是本人之才干或其在朝廷中的地位都是奈曼旗历代扎萨克中的佼佼者，而且是唯一的固伦额駙。所以后人一直称他为“駙马王”。

注释：

①③⑤：指爵位。清宗室及蒙古王公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台吉。

②：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自汉代以后常称之为漠南。

④：亦称固伦格格。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有汉族“小姐”之意。皇帝的女儿封公主称固伦格格；亲王女儿封郡主称和硕格格；郡王女儿封县主称多罗格格；贝勒女儿封郡君亦称多罗格格；贝子女儿封县君称固山格格；镇国公，辅国公女儿封乡君称格格。寿安固伦公主系清道光皇帝之第四女。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奈曼旗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3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